



胡繩全書

第三卷（下）

人 民 出 版 社



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

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或者“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想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存在的,现在也还有,这并不奇怪。10年动乱,把马克思主义糟踏得一塌糊涂,难免在一些人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和想法。在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每当革命发生严重挫折时,在社会上以至党内都曾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在实践中反复受到考验,既经受过成功的考验,又经受过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证明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搞上去了。事实证明:说“马克思主义不灵”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把僵化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改变过来。这种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难免遇到一些曲折,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在由旧体制转换到新体制的过



程中,难免露出许多空子,使那些一心谋私利的人有空可钻。改革的进行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这就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能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在这场深刻的革命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党员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性,以权谋私,把党的利益撇在脑后,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甚至违法乱纪。他们倒不是喊马克思主义不灵,他们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毫无意义。产生这种情形也不奇怪。我们党现在是拥有 4000 万人的党。这样一个大的党,又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不可能不在一部分党员中发生思想混乱,不可能没有掉队落伍的人。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地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党的历史,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文化大革命”歪曲了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要在党内搞一场“大革命”,把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走资派”,一概打倒。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认识党内问题。我们党是承认党内有矛盾的,否则为什么要进行整党呢?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力量是什么,主导力量是什么;能否以正气克服邪气,以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能否正确地辨明党内矛盾的性质,并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能否既用教育的方法,又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出现的消极现象,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站得稳,顶得住,要和党站在一起,同种种错误的、犯罪的行为作斗争。如果以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证明党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那实际就是跟着错误潮流跑了。

就社会科学战线来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民主革命中,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比如“一切斗争不要联合”。我们党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来克服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



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把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例如,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在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要实行公有制,但“愈大愈公就愈好”的公式是错误的。产生简单化、庸俗化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这里可以说两点:第一,我们从革命时期进入建设时期,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面临着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从指导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转变到指导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这个转变没转好,或者说没有认真地转。整个国家工作没有转好这个弯,社会科学战线也没有转好。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实现了这个转变。没转好这个弯是产生简单化、庸俗化的重要根源。第二,在建国以后新的条件下,大量的群众涌进了革命队伍。他们有革命积极性,有革命热情,但是绝大多数文化偏低,还来不及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而很容易接受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东西。以社会科学战线来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是真心的,学习是认真的。但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把它作为指导,更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不免产生一些生吞活剥的现象,就不免容易接受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接受那种靠几条引文来解答问题的方式。

我们现在一定要克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怎样来克服呢?不能用一种简单化、庸俗化来反对另一种简单化、庸俗化,不能用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例如,我们党批判了“文革”期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因为阶级



斗争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还要研究旧社会和它对现在社会的影响，研究时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观点。实行开放政策，使我们面向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没有斗争，但这个斗争不是以简单的而是以很复杂的方式进行的。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国家，要搞外交，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搞国际文化交流，这中间都是有斗争的。人家想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我们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长期的斗争。在这些方面的斗争中，至少有一部分明显地带有阶级的烙印。当然，讲斗争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时的看法和做法，不能用幼稚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认识。历史地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前者才能过渡到后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一切社会更高的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善于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为此，甚至有必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由此可见，那种极端幼稚的、简单的“兴无灭资”的观点必须克服。但克服这种观点，并不是使我们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已不需要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需要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没有意义了。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来克服错误的观点，而不是用一个片面反对另一个片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反对了那些



“左”的、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它的原理应用于中国今天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来解决怎样按照中国的特点使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问题。越是在复杂的形势下面，越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很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弄糊涂。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得到大发展的。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种复杂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那时党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可以总结，同时也因为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复杂的形势中，会出现各种错误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是在纠正各种倾向中发展的，是由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而发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封闭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适应当代世界的形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适应我们在开放政策下参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形势，适应我们国内改革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形势。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很好地解答实际生活提出的一切新问题，这是要花苦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谈“发展”，只会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而决不是什么发展；如果不顾世界状况，不顾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教条主义式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也决不是真正的



坚持,而只能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发展呢?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各种要求、各种标准。大的发展是不容易的,要有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就社会科学战线的每个人来说,首先应该要求真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面向实际,努力解决实际中的一两个问题,解答群众目前提出的一两个问题,说出一点新话,讲出一点新意,而不让人觉得是老生常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点贡献。如果以为一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躲在家里苦思冥想,想出什么理论体系来,那实际上是发展不了的。如果我们不使马克思主义同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具体形势相结合,不能解答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也不能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不能克服那种在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名义下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倾向。要彻底废止那种教条式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决不能使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只限于注释经典著作,重复马克思主义已有定论的观点。一定要联系实际,不回避现实问题,不回避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知难而进,在困难的问题上,真正说出一点新的道理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 关于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此就要正确对待在理论探索中出现的错误理论和犯有理论性错误的人;要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真实行团结的方针。

既然要求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勇于解决实际问题,解答群众中



提出的疑难问题,那么谁都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就可能有发生错误的情况。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去解答那些最尖锐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解答这些问题容易犯错误。有人以为,离开实际远一点的问题,就是错了也不大要紧;而在最尖锐的问题上发生错误就变成政治问题,就不好办了。所以,要允许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走弯路;出现了错误,要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去解决。当然,是不是错误,也需要讨论,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没有谁能预先判断。对任何意见,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我们提倡为了人民利益服从真理,改正错误,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固执己见,门户之见,那是不可取的,是一种低风格。大家在平等的地位上讨论,确实错误的、不对的,改正重来。所以,我们的前提中有这条,允许犯错误,不能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者要有理论勇气,敢于解答疑难问题,敢于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我们要敢于探索现实生活中有争议的尖锐问题,不能绕着矛盾走,要发扬在科学基础上批判和战斗的优良传统。学术上要批判和战斗,这句话这几年好像不大敢讲了。过去所谓“大批判”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混为一谈,而且使政治庸俗化,实际上是不讲科学。我们不能重复这种错误。马克思主义向来是在同各种学派的竞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武器,不是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而是靠真正讲道理。还是要有民主精神,大家要平等地讨论问题,在是非问题上要摆个明明白白。所以我赞成这句话: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是反对你的意见。不是说,既然尊重你的发言权,就不讲是非了,大家都对,马马虎虎就算了。

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是广泛的团结。不能把学术上的错误随意上纲为政治错误。有些社会科学的问题,容易牵涉到政



治问题。但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团结党内外一切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的方针。这里说的是“有志于”,不是说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历史上,只有王明自吹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大家都有志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可能有缺点和错误,但大家是共同探索真理,共同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纠正错误。如果说“把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这听起来很好听,实际上是不行的。把一些虽然犯有理论错误而实际上是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是有害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固然要严格要求,但实际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历史上许多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失误,我们并不因为他们的失误而否定他们的功绩。除了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外,还有一些“无志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他们只想搞点学术研究,政治上赞成四项基本原则,或至少不反对,并且爱国。我们也要团结这些学者,我们同他们之间也有共同语言。如果我们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都采取这样的团结的方针,那么对待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不采取团结方针,就更没有道理了。

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凡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凡现实所需要的,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作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学者个人的研究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学术上、理论上的责任由研究者自负。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应该允许发表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宜公开发表的,可以用内部方式发表或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正确处理上面几个关系,对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很重要的。



三 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学术自由问题,是与上面两个问题相关联的。现在很多人在谈学术自由,对学术自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看待学术自由呢?

这里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使人的思想不自由?这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不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使自己不自由?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又被迫要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讲话时必须用一点语录,使用某些术语,使得自己的话像马克思主义,他当然会感到不自由。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强迫人讲马克思主义的话,不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强迫他,他就必须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编在他的言论或文章里,这有什么意义呢?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我们都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可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随便一讲,就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发表一种言论,发表一个意见,写一篇文章,到底对不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要自己反复考虑,查查书,请人家来讨论一下,提提意见,然后也许还要反复修改。这好像是不大自由。但这显然不属于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科学严肃性的问题。如果认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才叫作自由,那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这样的自由。即使对于可以说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不谨慎,不反复考虑,也可能犯错误,未必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有历史经验的。

马克思主义不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人信服,向来



不是靠强迫。在解放以前,怎么能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呢?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受压制,没有自由,谁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倒霉。马克思主义靠科学真理,靠能够最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和拥护。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才发生了是否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你说不强迫,他说我感觉到有压力,是强迫。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经验证明,任何带强迫性的形式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我们现在学校中的政治课就有这个问题。你必须上这门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考试不及格就不行,这不就带点强迫性质吗?结果怎样呢?有些学生平时上课没兴趣,考试就找些“标准”答案,背熟了应付一下。发生这种情形不能怪学生。应该检讨为什么讲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吸引学生。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有丰富的内容,是能够引起青年兴趣的。因此要改革政治课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依靠政治权威,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人的思想,不会有好的效果。我们只能提倡学习,提供学习的条件,并且我们要讲得好,讲得有道理,以理服人。如果有人虽然承认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的事是对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不相信,怎么办?那也不能勉强,只好让他不信,只好等待。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和他讨论。不能抓住某个人说,你头脑里想的不是唯物论、辩证法,所以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做法是不行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管理人们头脑里的东西。至于犯法那是另外一回事。犯法行为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如果我们都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是不是就保证我们都正确呢?实际证明,这不一定,对同一个问题仍会有不同意见。既然有不同见解,就会有是与非。不同见解之间,要互相尊重,但是在是非问题上,不容含糊。为追求真理就



学术自由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我们对外来思潮的态度。我们的学者要有勇气有能力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为了参与,就要充分了解和认真研究世界各个学派。参与世界范围各学派的争鸣有一个好处,可以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内也不能简单地说,你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因为这种办法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我们必须学会讲道理。在世界范围的争鸣中,当然不可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正好像过去在革命还没有胜利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跟一个唯心主义者辩论,不能只说你是唯心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这不解决问题。他说,我就是唯心主义者,我就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你要说清楚,为什么唯心主义是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得说出点道理,纵然不能说服对方,但要让很多读者认为你是有道理的。简单地加几顶帽子,只是显出自己的浅陋。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可避免地会传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对此不是采取遏制的态度、禁止的办法,要准备认真地对待。要对世界上各个学派进行分析研究。这里面有对我们有益的可以吸取的东西,也有我们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博采众长,就可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更丰富起来。对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也要进行分析研究,讲出点道理来。马克思主义者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中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不同观点。对国外的各种学术流派,我们不采取封闭的态度。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对它们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和批评。

所以,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与此相联系,我们必须提倡严肃



的学术评论。现在很缺少严肃的学术评论。所谓严肃,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真正有研究、充分地讲道理。对我们自己的成果要给以严肃的评论,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也要给予严肃的评论。

四 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其他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当前,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任务是提高还是普及呢?总的说来,既要提高,又要普及。就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来说,我以为主要任务是提高,当然不是故弄玄虚,故作艰深。要提高,就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当然,这不是说可以轻视普及工作。普及与提高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大学问家的创造性的见解,是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普及性的,而又有深度、有创造性的著作,当然应当特别受到重视,可以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上。

使世界上听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声音,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说得很不行,说我们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和外国相差几十年,等等。我看这种说法缺少分析。要承认我们有些方面确实有弱点,也许甚至差几十年,但是完全采取自卑的态度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有些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是有我们自己的声音的。当然,我们还要努力。

第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问题。总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各个学科情况不同,有些学科和实际工作的联系极其密切。研究国际问题,就是要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这同国家的外交和外事工作有直接联系。经济研究能够直接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但是,这些学科也要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研究也是为了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脱离实际。我们还有一些学科,本身



就是理论研究,这些学科也要重视和实际结合,要用理论研究来为实践服务。例如,哲学研究是应该从多方面为改革服务的,其中包括为改革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随着改革而发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提供哲学理论。有人提出要注意应用哲学,例如法哲学、政治哲学等。这些所谓应用哲学,其实还是基本理论研究。例如法哲学,并不是直接解决一个个具体法律条文的写法,它给制定法律以理论基础。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从事历史研究。研究过去的历史好像不能直接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然而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实际,就必须懂得历史,正确地运用历史经验。历史研究也许也可以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要追溯有关的历史,例如为解决港澳问题而研究港澳历史,这可以算是应用研究。历史研究者应当有责任从事这种应用研究,但不能因此不重视基础研究。从事基础研究也可以联系实际,是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联系实际。没有基础研究做底子,应用研究也进行不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面是很广泛的,不能采取狭隘的看法。仅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有大量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对于比较年轻的同志,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第三,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上要重视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创造性,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发挥集体的作用和力量。那么集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只是给每个人安排从事研究的条件,让个人自己去努力,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是集体的作用还更多一些。我们要在集体的组织和规划下,使每个人的力量能够用到



最恰当的地方。也有些研究题目必须用集体的力量,甚至各学科合作去进行。但做好这种集体的研究,也要靠每个人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集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研究同一课题或者不同课题,以至不同学科的人进行学术讨论,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一个好的研究集体,应该是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独立工作能力,能够在需要时把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某项研究工作,并且造成一种互相讨论批评的学术空气。

在一个研究集体中,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能用某一个人的意见和主张排斥别人的主张,也不应该含糊糊糊地采取折衷的办法。有时有这种情形,集体搞一个东西,比如共同编一本书,由于大家意见不一致,结果就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平均数,把大家都能承认的意见写进去,不同的意见都撇开。像这样编的书能有什么创造性呢?这样的集体工作方法可能会压抑个人的创造性,不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前面讲到,一个研究集体不能用一个人的意见排斥别人的意见,这也要辩证地看。比如说,一个人主编一本书,那就应该以他的主张为主,当然也会有不同意见,也要进行讨论,但最后得由主编拿主意。一个好的主编,应该既有主见,又能集中大家好的意见,作出明确的结论,并对这本书负责。根本不同意主编的意见的人可以不参加。(如果是一本可以包含各种不同意见的论文集,那又是一种情况,主编就应该确定有哪些不同意见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

第四,老年与青年的问题。我们有许多老学者,他们有深厚的学历,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们的为人、治学都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也有许多年轻的同志,思想活泼,富于进取,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在老年、青年之间还有中年同志,现在是我们的骨干。许多单位都提出青黄不接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让年轻的同志更快



地健康地成长起来,帮助他们弥补不足的地方,克服某些缺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

老年和青年的关系问题,是同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有关的。要创新,就必须继承,必须把前人的积极成果继承下来。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文化成果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才超过前人的。创新不是靠灵机一动,靠搬弄几个新的术语。如果不把以往的许多学术成就,包括前人的好的治学方法接受下来,就谈不到创新。所以,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也可以体会到许多老先生的可贵。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还在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青年一代要真正赶上前一代人,创造出更高的成就,就必须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并且刻苦钻研新的问题。

1985年8月和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讲话的综合稿。原载《红旗》1986年第9期,5月1日出版。



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

— 社会科学战线的成绩和现状

近几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和探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对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途径,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都有了新的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是一重大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方法,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有见地的建议和方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在决策中起了有益的作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几年有较快的发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开放政策相适应,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对于世界的认识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文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这几年在科研机构的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这个时期,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快,思想最



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现状还不能适应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对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尚未进行应有的研究,或者研究得不深不透。理论和实际结合得还不紧密,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社会科学队伍的素质亟待提高。许多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仍然存在空白和薄弱环节。现行社会科学体制很不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封闭和分割状态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科学研究手段和科研管理现代化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信息资料工作不健全,没有形成网络,信息不灵,效率不高,严重地障碍着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研究效益的发挥。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二 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新时期。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需要有科学理论的依据,也就需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和能够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作用,也为人民群众适应新形势而进行的自我教育起作用。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极其深刻的变化,有待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过去认为已有



定论的有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这可以说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挑战。一切有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同志都会看到,国家的大好形势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我们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不辜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任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我们要认真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形势,研究当代各种思潮,认真总结和吸取 20 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包括自然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果,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研究得还很不够。现在有很多问题,例如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及其在当代世界形势下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种思潮和流派等等,都亟待深入研究。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是空前的创举。对于这一伟大的开创性的革命实践,我们应当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多种角度,深入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作出分门别类和各种层次的综合性的科学解释、观察和预测,为实践提供各种建议或方案,力求充分发挥理论的超前作用和反馈作用,提高我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举例来说,我们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社会中



的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经济管理的宏观调节和微观搞活,价格改革与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行政管理和人事制度改革,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城市管理问题,人口的数量控制和素质提高,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预测的理论、方法、模型,涉外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智力开发问题,等等。

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方面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同样是大量的。例如,9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预测和我国的对策,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研究,美、苏、日等国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对外关系发展前景研究,第三世界各国的发展研究,我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研究,苏联、东欧各国改革实践和理论比较研究,世界能源问题,世界金融问题,等等。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个决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巨大指导作用。社会科学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特别密切,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在改革、开放中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变化,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问题,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爱国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四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和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大大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不但在数量上要有大发展,而且在质量上要有大提高。教育学的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重视。

哲学、历史学、文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心理学、语言



学等学科,能够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有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提供人们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思想准则,激发人们追求高尚的理想和情操,既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和整个社会风尚,又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种社会效益,是深刻的、长远的,不能因为它们在解决当前具体问题上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实效,便予以轻视。

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加强学科的建设,尤其是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要加强研究。在许多学科中,都需要重视系统的基础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我们也不可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有些系统的基础研究一时可能并不能解答什么具体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决不能忽视。同时,在任何学科中,都要重视历史的研究。要通过历史的研究,总结中国和世界自古以来的,特别是近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发展经验。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对于历史,当然只能是按照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但是从新的时代高度出发,人们能够对历史提出新的问题,做出新的观察,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历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发展,会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现在还比较薄弱的学科,要培养人才,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还要注意建立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特别是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多学科联合研究的特点,需要大力发展。

翻译、介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进行评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应该重视这项工作,注意培养学术翻译的人才和能够进行分析评论的人才。



三 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必须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

我们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去研究客观世界。这是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解决当前各种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现成答案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或者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都不能使我们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我国和世界的实际。许多实际问题中包含着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出发,演绎式地进行推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有可能取得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高质量成果。我们要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吸收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使我们能在各方面比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有些方面还有可能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我们要为此而作长期的努力。

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当前我国社会实践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社会科学必须为这个总任务服务。对于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工作说来,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如果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说不出道理来,就会在实践中陷入盲目状态。经济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学科,如果不能针对当前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以至人们的思想状况,解决实践向社会科学提出的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研究工作就会成为空对空。只有使理论和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实际工作才能方向明确,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研究工作也才能够生气勃勃,不断地有新的创造。为此,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科学结论,用以指导我们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当然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要靠集体的努力才能真正做到。但按照这个方向做,只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就应当受到鼓励。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反对脱离新条件、新情况,发表空洞的议论;也要反对仅仅凭着搜罗到的个别的枝节性资料,不经过深入刻苦的研究,就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理论问题轻率地下感想式的断语。研究农村问题的不下农村,研究工业问题的不下工厂,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的不做社会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可能拿出具有科学价值的成果来的。当然,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联系实际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应作狭隘的理解和强求一律。

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是靠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有价值的成果。有一些学科和研究工作,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要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和尊重一切对科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并且要善于从中汲取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明确的深刻的阐述。我们所遵循的总原则,就是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坚定不移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辨明是非,探求真理。只有正确的、合乎科学的结论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在科学研究中鉴别是非,往往不是很容易的,必须慎重对待。如何正确鉴别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是非,如何正确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这是贯彻“双百”方针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并且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提倡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讨论中,道理要辩明,但人要团结,而且要广泛地团结。提出批评性意见,要立足于建设,立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而不是以“批倒”某人为快,更不能着眼于“整人”。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固然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正确的,但也要能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并且在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就加以改正。既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观点,更要注意在争论辩难中尊重对方,并且互相吸取一切有价值的内容,包括资料、方法和观点。有些问题,在辩论中一时统一不了,不必强求统一。强求统一,既不可能,也没有好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一切对国家建设和学科发



展有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学术工作者应当遵守宪法,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是独立进行的,通过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者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应由研究者自己负责。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法。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就一个民族来说,不能利用世界人类文化的总成果,就不能迅速进步,就会处于落后状态;就马克思主义来说,不能从各门学科的新发展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不能在理论上同各个学派竞争和斗争,就不能得到发展。在开放中,外国的学术文化,包括优秀的科学成果和一些非科学的甚至腐朽没落的东西,都会同时进来。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采取什么态度,是我们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在革命时期的状况。当我们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手段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那些学说传入中国,即使不是为了维护旧制度,也是鼓吹改良主义。那时,我们拒绝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也没有采取一概



抹煞的态度。在我们革命胜利并进入建设时期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和内容也要有一个转变。但是,我们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没有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因为西方传来的某些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笼罩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迷雾,而简单地取消政治学、社会学这些学科,就是没有做好这个转变的表现之一。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社会政治学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最高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学习和继承许多东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生产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政治运行以及科学文化建设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中。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照搬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分析,这些经验是可以供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我们要从各种外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中接受人类文明积累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要对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确实反科学的东西进行认真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坚决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斗争。思想领域内的这种斗争,也要通过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进行。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思想倾向,并且促进科学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四 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和队伍建设

要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本身的改革和队伍建设问题。

(1)现在科学发展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结合,而以综合为主。固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需要分门别类的研究,也不排斥学者个人从事研究;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科技力量联合攻关才能完成。我国社会科学的现行体制只适应单学科的、孤立的、分散的研究,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变。对这一点,我们长期重视不够。我们应该把社会科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组织力量进行研究。

在科学研究中,既要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又要充分发挥每个研究单位、每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对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研究课题,要组织集体攻关。

(2)要加强横向联系,改变目前互相分割和封闭的状态。不但要加强同一学科各方面研究力量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力量的联系。研究机构同实际部门间的联系也要加强。研究工作者要改变不敢研究现实问题、怕承担风险的心理状态,要勇于承担实际部门委托的研究任务。也希望实际部门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条件,在决策过程中使研究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国际学术交流也要进一步加强。

(3)要逐步改变单纯靠行政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的做法。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当多,要逐步创造条件改革体制,解决问题。

(4)要十分重视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现在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队伍老化,青黄不接,缺乏后继的学科带头人,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注意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对一些优秀的青年尖子人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速培养。



(5)为了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决策服务的能力,需要大大加强信息资料网络的建设。

1986年10月29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原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9日。



谈哲学社会科学在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通常我们说科学技术时，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很重要。自然科学中有基础科学，也有应用科学。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呢？从历史经验看，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有过重大的失误。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条，即我们不够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没有实行科学化、民主化，没有使社会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探索。可以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曾经只有某些很简单的概念，而缺乏科学的认识。靠着简单的概念，再加上照搬过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一类的经验，就不能不造成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严重失误，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比如公有化问题。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



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全民炼钢”开始了所谓“大跃进”运动。以为不惜工本,“土法上马”,就可以使钢产量一年间翻一番,以为只要钢产量翻一番,就可以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既不顾技术科学,也谈不上有什么经济科学的依据,只是简单地沿用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既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继承的过程。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经验继承下来。像大银行、大生产的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社会已准备下了,社会主义要继承它。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社会主义也必须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东西。既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又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东西,这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兴无灭资”的简单口号所能概括的。中国社会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补充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许多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东西,这更是难题。一个简单的“兴无灭资”的公式,就把这个难题掩盖掉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



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很适当,是和这个简单公式有关的。以为在原有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底子上,加上公有化,加上集中统一的管理,就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更是同这种简单公式有关。

所以,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中,这是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在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我们党也曾提倡调查研究,但那时的调查研究往往必须适合于其实并无科学依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虽然党内外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者提供了不同于既定的方针政策的调查材料,但他们被置之不理,甚至反而遭殃。党固然也曾因某些做法事实上行不通而加以改正,但是并没有对为什么发生错误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是就事论事地改正错误,而不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认识,因此错误也就还会重犯。总之,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模式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不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不能提供真正科学的依据的。

胡耀邦同志在今年10月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谈到,“从我党成立起65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这就是延安时期。这里我把建党的那段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是延安时期,确实是我们党的一次理论的大繁荣”。那次理论的大繁荣,是以毛泽东的几部主要著作为代表。但也不能不看到,从3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的党内党外许多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批驳许多错误的观点(如说中国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或



说中国仍完全是封建社会),从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等基本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许多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 and 党的斗争经验,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对于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他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作出了理论的说明。这就使党在革命中所实行的政策、策略和各种具体措施都有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的民主革命带有极大的复杂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既要坚持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不断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并与之作适当的斗争。又例如,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保护民族资本,等等。由于有正确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处理好这些复杂的问题,使全党有统一的认识。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轨道,应当说是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的结果。所以说,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胡耀邦同志还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没有理论上的大繁荣是不行的。他说:“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是互为因果的。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意愿,也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也是现在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应当说是有了新的发展。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事情。在 1957 年前后,我们曾盲目地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很容易。这好像有事实根据。在 1952、1953 年间,党开



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来认为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需要 15 年,但结果只用了 4 年就基本上完成了。于是就产生了一张白纸上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建设的。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人说,可以到一个荒岛上去建立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这是做不到的。人们只能也必须在既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新社会。1953 年到 1956 年顺利地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同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的。这些条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等等。由于这种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以为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就会引出不切实际的“大跃进”和违反客观规律的盲目行动。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曾把革命看成很容易的事情,好像只要依据书本上的几个条条,一往直前地冲锋,就能达到胜利。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同志看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于是去认真地了解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走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这才使胜利有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用了二三百年的时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花很长时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的困难。这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时期,原有的底子很薄,“一穷二白”,文化水平、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我们可



以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前进得快一些,但不能主观地想象可以一步登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采取各种过渡的形式,要经过各种必要的步骤,这些不是可以从书本里找到现成模式的。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

理论指导行动,而理论来自实践。我们既不是盲目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是对任何一个具体事情都在理论上弄得一清二楚以后才去做。我们党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针对我国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状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符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无疑对于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提出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作出理论说明的要求。为了弄清楚这样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出现某种情况是合理的,还是难以避免,但可以因势利导、加以改变的,如何解决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一般说来,改革中我们采取任何一个措施,只有利,没有一点弊,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应当选择利大弊小,而且局部的暂时的弊是承受得了的方案。利弊得失往往在事后才会充分表现出来,但事先就需要有大体的估量。说“摸着石头过河”,是说要谨慎。因为做的是新的事情,所以必须谨慎从事,反复考虑利弊、权衡得失,对有关情况做周密的调查,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怎样去做。

有这样的说法,在涉及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上,不可以做试验。这话是有道理的。在科学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失败一次、两次



以至多次,都是可以的,这和社会改革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是在做前人未做过的新事业,很难保证一点失误都没有。因此就要特别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充分研究实际的情况和已有的经验,充分研究别的国家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有些事情可以试点,对试点的经验也要做认真的科学的分析研究。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有些决策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关),使我们在行动中多一点预见性,尽可能减少和缩小失误的可能性。像过去人民公社化、“大跃进”那样没有科学依据的“试验”,是绝不可取的。

哲学社会科学的有些研究,并不直接为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具体对策,然而却是必要的。我们要重视为解决具体问题寻求对策的研究。譬如说,住房怎样商品化?我们现在对房租是采取国家补贴的政策,这样的办法不行。怎样改呢?这就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正在设计各种方案,研究这些方案在具体实行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发生什么后果。我们重视对策的研究,但并不因此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不可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譬如我们现在提出资金市场问题,为了解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就需要有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需要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中银行、证券交易所如何活动。这种基础研究对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有益的。

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研究,这是从广义上说的历史研究。已经发生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属于历史,也都成为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也就是总结经验。以为研究过去对现实没有意义,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并能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用以指导现实



的理论,就是从总结经验而得来的。在研究历史时,要有现实的时代感,否则就成了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重要作用。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必须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1949年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这场变革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念。什么事情是好?什么事情是坏?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这种价值判断,现在在有些场合下有点混乱。这不但表现在人们的头脑里,也反映在报纸、刊物上。在社会进步中,价值判断出现某些分歧和混乱,并不奇怪。人们的思想意识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克服各种陈腐的旧观念,树立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度膨胀的片面性、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仍然留下很深的烙印。这对于健康的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是极为有害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当有这个任务,来解答这类问题。不是肤浅的解答,而是深入地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要用哲学社会科学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我们的历史,还要理解世界。通过这些,来开阔人们的眼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境界,改进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能力。

1986年12月9日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原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1期,1月25日出版。



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 10 年,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
发展最快、成果最多、思想最活跃、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一个时
期。在这期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观点。
例如,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
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社
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等等。这些理论观点的
提出,是党中央依靠集体智慧总结了全党、全国人民实践经验的结果,
同时也总结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理论研究的成果。对于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成就,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在
过去的 10 年中,社会科学实现了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从过去单纯
指导阶级斗争的科学,转变为指导国家建设的科学。第二,这个时
期我们解放了思想,打破了过去束缚人们头脑的许多条条框框,在
科学研究中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
三,社会科学从封闭的状态,转变为开放的状态,不仅对内开放,对
外也开放。这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新知识
和新经验。这三方面的成就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经历这样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不免
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反对思想僵化。



虽然坚持自由化观点或僵化观点的只是极少数人,但是过去留下的那种传统的积习不是很容易就能完全克服的。由于不完全适应新的转变而产生种种认识上的偏差和片面性,也是难以避免的。有的同志对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概括,说现在是“哲学的贫困,经济学的混乱,历史学的危机,法学的幼稚”。不能说这个估计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但如果把它作为对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评价,否定这10年来社会科学的长足的进步,看来是不妥的。确实,有些学科在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能存在,这些年才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学科的建设是很不容易的,有些学科在初建阶段或过分偏重于实际应用,或暂时主要从国外引进一些东西,因而难免产生一些问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可以理解的。理论的成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就能一蹴而就。目前不论是哲学、经济学,还是其他学科,都提出了许多问题,也在探索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见解,有些问题有多种不同意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这个事实从表面看似乎是混乱,但从根本上看,则是正常的、必然的,因而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我们不是提倡百家争鸣吗?百家争鸣并不意味着互相攻击,彼此指责。百家争鸣就是各种不同意见都能发表出来。在各种意见中,有分歧,有争论,通过讨论、比较,在实践中鉴别是非,这不能说是混乱,而恰恰是通往真理道路的必经阶段。

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这些年来社会科学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缺点和弱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这是对整个理论界的批评,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社会科学界。我们的确



还有很多弱点,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近10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发展的状况,总的来说是有成就的,我们没有理由得出悲观的结论。当前,我们就是要认清形势,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下面,我想就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说几点意见。

—

要认真地、科学地总结10年来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现在的形势和10年前拨乱反正时的情况显然有很大不同。10年前,当我们提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只是有一个大体上的初步设想。我们所有的经验,主要地还是从过去二三十年中积累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促使我们认识到走过去的老路不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从实际出发,摸索出一条新路来。现在经过将近10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中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经验。这些经验证明,我们的实践总的来说是有成效的。我们所说的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已经不只是一种设想、一种可能性,而是一步步成为现实。我们要十分珍视已经得到的经验,把它加以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

现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对理论工作不很满意。因为他们现在做的一套,跟过去二三十年中已经做过的、并认定是社会主义的一套,有很大的不同。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心里不踏实,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从理论上给予解答。但是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又认为,理论不能跟着实际跑,我们的任务不是解释现行政策,也不是论证现行政策是否正确,理论工作要进行超前研究,提



出新问题,解决下一步如何发展。看来,这两方面的想法有一点矛盾,又都有点道理。怎么统一起来?照我看,统一起来的办法,就是要科学地总结经验。从总结经验中,肯定过去实践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同时也从总结经验中,提出实践的新任务,解决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这样,二者就可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总结经验必须立足于科学,依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作点说明,也不是要求不加分析地歌功颂德。党并不认为这10年的经验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我们的实践有成效,也有不少问题。为什么能取得成效,这些成效近期看和长期看有什么意义,这是需要分析研究的。我们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些措施还不配套,我们还遇到许多始料所不及的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新矛盾,这也需要进行分析,加以总结。实践正在向前发展,我们要把现实和将来结合起来,用比较长远的眼光衡量已有的经验和眼前的工作。

科学的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来。当然,我们的理论不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所谓超前的作用,就是要对未来起指导作用。指导未来的理论又从哪里来?也还是要从实践中来。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科学地总结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前人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结论。离开了科学的总结,马克思怎么能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呢?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在这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对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大体的预见。这些预见为后来的实际所证实。他是以过去10年内战经验的科学总结为基础,又研究了抗战开始后10个月的经验,所以才能作出这样科学的预见。现在有人讲“未来学”,我以为,人们是不能把未来孤立地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对



未来的研究也还得立足于现实,考察现在科学技术、社会生活发展到什么程度,根据这个事实,再大体上推测 10 年、20 年以至 50 年后,社会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掌握当前的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如何能凭空地去研究未来?所以,我们现在既已有了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 10 年实践,这 10 年的实践提供的宝贵经验,应该成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其中都包含着一些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只有通过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掌握了这些本质的、必然的因素,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预测未来。

总结经验,需要细致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研究。经济方面不用说,提出的问题已经很多。这 10 年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变化,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等等,都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变化,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明白无误地认识清楚了,往往是仅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体上的概念。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民主气氛很浓厚,代表们发表了许多意见,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家都感到这 10 年来变化很大,问题也不少。如果只看到问题,简直是困难重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积累了这么多新的经验,如果对这些经验作出恰如其分的科学总结,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这不是又成为一笔很可贵的财富吗?

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国情调查,就是要切实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首要的问题是弄清事实:10 年来社会各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哪些变化确实是好的,哪些是不健康的;这种不健康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等等。弄清这些事实,就需要调查研究。我们如果认真地调查一下这 10 年来发生的变化,就可以清醒地看到,我



们现在确实正处在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于我们所走的新的道路的认识,虽然有了个大体清楚的轮廓,但我们已有的经验毕竟还只是初步的,还要充实和完善新的道路的内容。要沿着这条新的道路走下去还是很艰难,特别是今后一二十年内,可能是最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脱离贫困,要从温饱型社会逐步发展为小康型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例如,要深化企业的改革,要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等等。随着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会不断出现。就说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可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同其他人产生差距,有差距就会有矛盾。怎样缓和这些矛盾,就是我们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再说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问题。现在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为了解决不正之风的问题,能不能干脆放弃发展商品经济,回到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老路上去?当然不能。像这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在我们这样的幅员辽阔、生产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培育和发展起完善的商品经济,在国内形成统一发达的市场,决非短时期就可以成功的。现在有许多问题正是在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几乎带有必然性。可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既要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要防止和克服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病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的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都要不断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不断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农村有的地区原来连集市贸易都没有,有的山区农民宁愿挨饿,也不愿去做生意。我们要帮助他们改变想法,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念有所变化,不再认为越穷越光荣,自觉地走上劳动致富之路。然而价值观念一变化,带来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转折关头,包括价值观念的转折,最容易出现各种认识上的偏差、各种思想问题,并造成社会问题。为什么现在出现了卖假药、卖假酒、卖假货的?就因为有些人以为既然致富是好事,那么,只要能捞到钱,什么事都干。有这样思想的人尽管是少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造成的危害却非同小可。所以,从温饱到小康的转折,步履维艰,隐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既有与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方面,又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就难免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僵化、单一的旧经济体制,转变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继之而来的政治体制的转变,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体制上的转变,会带来一些新问题,使某些不正之风抬头。如果不作科学分析,光是哀叹“世风日下”,并不表明对现实有了正确的认识,更不能解决问题。可以不可以把社会风气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呢?我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社会科学应该研究社会风气问题。

总之,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对一切已有的经验进行科学研究,对社会现状和趋势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是这个社会的成员,而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旁观者。我们是身临其境,有切肤之感。关心和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我们既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也就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矛盾之中。我们自己也会碰到住房、工资等生活问题。这就需要



提倡一种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研究态度。现在大家都热心于改革,都希望从改革中得到一些实惠。但是,如果只想得到实惠,而不想付出代价,那就成问题了。我们过去参加革命,是准备牺牲一切的。如果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参加这场革命难道仅仅是为了求得实惠,而不准备作出任何牺牲,付出任何代价吗?因此,我们要进行有科学根据的宣传教育,使大家树立起正确地看待改革的观点,要准备迎接各种严峻的挑战,承担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付出必要的代价。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通过实践的检验,使已有的方针、政策更加完善;提出新的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帮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深刻地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大家都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适应这个伟大时代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

我们不仅要认识国情,研究国情,还要认识世界,研究世界。

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必然要同世界接触,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关系。当今世界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文化上也出现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趋势,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我国。

我们现在认识世界,和革命时期认识世界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立足于批判,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合



理性进行科学论证。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世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而且为了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还需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方面,此外它们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企业经营的方式,社会化生产的管理方法,利用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手段,以及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等等,我们过去很不熟悉,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办法也不多。我们曾经简单、幼稚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优越性,但它不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不能割断历史,割断与世界的联系。它必须汲取历史的经验,并且不断地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中吸收有益于自己的营养,这样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调节社会矛盾方面采取了种种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方法。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我们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方法和它们不尽相同,但它们的经验也是可供参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地更换政府,意大利在43年中就更换了48届政府,但它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很大的影响。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有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它实行了文官制度。总理、部长换了,下面负责日常工作的文官没有变,因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我们不能仿行资本主义的议会内阁制度,但是它们的这种经验是值得重视的。我国现在准备实行公务员制度,就要参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有利于发挥它的优越性。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和研究也很不够。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我们一样,过去曾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些年来它们也在变化,有些国家发展得很快,某些方面甚至



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只作浮光掠影的观察,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要作系统的研究,充分认识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这对我们肯定也是有益处的。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对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已发达的国家)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状况和人民思想状况,收集必要的资料,对照我们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这很有意义。我们确实要对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遇到和正在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怎样去解决,进行调查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可能和我们不一样,但遇到的问题往往有共性,从它们那里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使我们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还要注意研究苏联和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从60年代以来都有相当大的变化,目前也掀起了改革的浪潮。对它们的发展状况,我们要关心,要研究。建国以后,我们对苏联,无论是在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的时期,还是在疏远的时期,研究都很不深入。我们对斯大林的问题曾经有过评论,其实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斯大林,他的很多问题我们甚至都不清楚。现在苏联提倡公开性,有些问题逐渐明朗了。最近苏共又平反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情况我们缺乏了解,也没有研究。对于苏联、东欧的研究,西方国家抓得很紧,已经积累了许多资料,也出了一些成果。我们应当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特别是苏联目前也在大力推进改革,它准备加以改革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正在进行彻底改革的体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这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必要的、有益的。

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既需要有研究机构迅速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必要的对策建议,以供有关部门选择施行;也需要有研究机构进行基础性研究,进行较长期的战略性的对



策研究。这两方面工作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社会科学院系统比较适合偏重于从事后一方面的工作,起码要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认真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对策性的研究。

三

要认真对待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对我们的冲击。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思想传入中国。在各种思想的传播、相互激荡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最后取得了胜利,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我们又面临一次经过长期封闭之后西方思想的冲击。对这种冲击,我们首先要有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既不要乱了手脚,又不要掉以轻心。西方思想,总的来说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其内在矛盾。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还需要利用前人思想理论的积累。当代西方理论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过去几代人的思想成果。它们是西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持续发展的产物。这些人类思维之树上开出的花朵,尽管其中有一些可能永远不会结出果实,但从它们那里还是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取得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的继承者。所以我们对西方的思想理论,不能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的态度。

但是,我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是要抵制的。我们



说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不是就资本主义思想整体而言,而是指其中消极的、落后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观念里有积极的一面,如讲究效率,求实精神,竞争意识等等,都是值得学习的;甚至个人奋斗,也不能全部否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体系中,确实有许多腐朽的东西。即使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期间,那里的有识之士也对他们的社会制度中隐藏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怀有一种危机感。西方学者常常说,在他们的社会中,人们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种自己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感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感到孤独、惶恐、烦恼、失望,因而怀疑一切,认为一切价值观念都是虚幻的,仿佛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存在。有些人在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追逐个人利益,不过是暂时的自我麻醉,反映到社会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酗酒、凶杀、淫乱、青少年吸毒等现象,以及朋克、嬉皮士之类玩世不恭的小群体,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破坏作用,引起那里许多人的忧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出现的一些思想倾向,有许多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流行过的那股思潮的延续。像带有唯意志论、神秘主义、绝对的相对主义、怀疑人类的文明成果、否定历史的进步等等色彩的以各种招牌出现的思想,都不是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当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带有新的特点。在这些思想中虽然不乏某些合理的论据,但它们几乎都倾向于否定理智的作用。这种现象突出地反映出资本主义世界理论的混乱。有些欧美学者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股否定理智作用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给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一层有学术根据的外衣,有助于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中,反理性主义仍有强大影响,



值得注意。但我们也不能把反理性主义简单地同政治联系起来。反理性主义倾向不一定就导致政治上反动,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做具体分析。一般地说,在人类的创造思维中,确实有某些非理性的或难以用理性作出完满解释的因素,如灵感、直觉、潜意识等在起作用。但如果把这类因素无限夸大,导致从根本上否定理性的作用,那就和科学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了。可以断言,这样的反理性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无益而有害。所以,照抄照搬西方的思想理论是很危险的。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中国介绍外国学说,五四运动是一个高潮。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做这项工作了。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就是一个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在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以客观的态度,对自己所做的传播西方思想的工作,进行了一番反省式的评论。他认为当时他主张输入世界学说,是对的,但是输入的应该是“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这样才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他认为自己当时“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虽然他又说,在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闭塞萎靡”的情况下,如果不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恐怕也不能造成新的局面,但他确是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五四运动以后的状况比起梁启超那个时代,应该说是有了进步。那么现在呢?正像有些同志讲的,在介绍西方思想的工作上还存在比较粗糙的情况,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弄懂就那么讲了,也是模模糊糊、笼笼统统,甚至存在一些错误。看来在长期封闭之后实行对外开放,对外来思想有一些囫圇吞枣的现象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不过,也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分析批判能力比五四以后的一段时期



又大为增强了。我们已经懂得,对西方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充分认识这个工作的艰巨性,努力把它做得更好。

为了使中国思想界能够更好地从外来思想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促进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要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开辟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参与国际学术界为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开展的活动,既要有独立的分析批判的能力,又要善于同各个学派、各种学术团体合作,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些课题。我们常讲,在对外事务中要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斗争,这并不是一句套话,而是我们将要长期实行的正确方针。中国社会科学界应当具有贯彻这个方针的远见和气魄,为世界的进步,为世界的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总而言之,西方思想的冲击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对待。我们既要很好地分析西方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要善于批判和屏弃那些西方经验证明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损于我们事业的不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从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四

要很好地尊重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

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其中有民主的精华,也有封建的糟粕。对封建的糟粕,当然要反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要花很大力量去消除,包括消除与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相联系着的保守观念、狭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联系的宗法观念、人身依附、长官崇拜,以及其他种种落后思想。我不赞成采取搞运动



的方式来反封建,因为现在说的反封建涉及文化思想问题。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下来,有些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方式之中,它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运动”所能恰当解决的。如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种做法,只会有害无益。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来逐步消除传统文化的封建遗毒。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长期的文化积累,到底对于我们是个累赘,还是一笔财富? 在世界上,唯独中国历史悠久,连续不断,虽然中间有过分裂,但是总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很了不起的。到了近代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中国本来也像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有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危险,但中国没有变成殖民地。后来虽然变成半殖民地,终究没有被列强瓜分掉。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当然,没有变成完全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遗憾,但是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中华民族就这样生存了下来,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过,中华民族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中华民族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鲁迅是一位最能跟中国文化传统中劣根性的东西作斗争的战士,但是鲁迅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他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话是很值得玩味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确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我们当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精华与糟粕常常混在一起,甚至是相互关联的。怎样去区分,在分析中批判地吸收,这是个很复杂



的问题。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建立在渊博知识基础上的洞察能力,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品质。我们有责任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解决好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

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容很丰富,范围很广,一些深层的东西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于一切有利于发扬民族自尊心,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人民克服困难奋发前进,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水平,尊重其他民族并向他们学习的东西,都应该保护和很好地加以利用,使之发扬光大。如何利用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待于我们作出努力,加以解决。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历史学危机”的问题。现在史学界有的同志认为史学有危机,我不大相信。社会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历史科学。社会科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探索这一问题的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它研究了在简单商品交换的发展中,怎样产生了货币,货币又怎样发展成资本,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种历史研究。历史学研究对当前的现实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了解世界,就要了解世界历史;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历史;要保护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要对它作历史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过去研究的范围太窄了,可以开拓,也可以采取一些新方法,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历史学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怎能说它面临危机呢?

五

最后,我要讲一下社会科学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 70 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指导地位,这一点又是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相联系着的。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要靠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靠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而不能依靠行政命令、法律手段。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要勇于探索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回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也要多方面地学习,善于接受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这样,才能使我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必然达到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狭隘的宗派,要尊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从这种态度出发,就要以宽广的胸怀团结一切同志,团结一切爱国的理论工作者和一切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战斗性。这就是说,要勇于和善于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旧思想的影响,在原则问题上明辨是非。这当然不能靠打棍子,戴帽子。那种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废除。战斗性是要有说服力,善于以理服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弱点表现在:一怕犯错误,二怕被别人说成是“打棍子”。要消除这两怕。理论上突破和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提高理论水平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造成良好的学术环境,还需要时间,需要真正的深思熟虑。因此,要允许有反复、有偏差,甚至有错误,当然也容许改正错误。是否“打棍子”,要看是否言之有据地说理。如果努力充实理论的准备,提高理论思辨的能力,那就能平心静气地有根有据地说理,就无需怕这个,怕那个。

现在,社会处在大变化时期,但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安定的环境,这对于理论的发展是个极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珍惜这个条件,并以严肃的责任感要求自己,一方面密



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那时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学的名义在大学授课，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但是并不把这种研究称作社会学。毛泽东就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还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也曾指导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学呢？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30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



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

全国大陆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但在长时期间,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需要社会科学这个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过1952年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后,实际上就都被取消了。1954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当时只出版了《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三种杂志,别的就没有再去管。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就社会学来说,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

第一,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正如



自然辩证法可以指导物理学研究,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有了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

第二,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在革命时代,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后,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通过这 30 多年的经验,大家对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然也就解决不了娼妓问题、土匪问题等等社会问题。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运转,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要实现良性的运转,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作许多努力,因此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第三,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的著作,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洪帮》的书。那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发现在中国居民中有帮会组织,很有势力。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确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所利用。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他们的研究者就不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那样对他们毫无用处。但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材料,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重



要的材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他们的这些材料，当然还要进行鉴定和补充。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其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共同点。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在一切实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但是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得到的一些材料，使用的一些方法，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由此可见，把旧的社会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



一笔抹煞,是不对的。费老说过这样的话:“批判过了头,成了整个否定,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我同意这个意见。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些材料和方法,并且吸收西方社会学家的某些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既有发展的需要,又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究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可以说,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比如生活方式问题,我们过去不大讨论,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这算是什么问题呢?算经济问题?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但它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又比如婚姻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与经济当然有关系,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人口问题的研究现在变成一个专门学问了,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小城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总之,社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

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要有理论,但是理论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来的。



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丰富、生动、具体的内容。只有对此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经验,解决好新问题。因而我非常赞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基础工作。当然也要讲求调查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通过中国社会学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学学者的联系,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学者的联系。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叫《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好的调查报告,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第 二 篇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 10 周年开会。社会学研究所是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0 年来,取得了很多成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所研究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也是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和全国社会学界的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支持和帮助过社会学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同志们表示感谢。

社会学是 10 年前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作用?到现在对这个问题恐怕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这需要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通过实际工作予以澄清。我想在此说几点意见: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说,社会主义社



会存在着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成堆。那时候我们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要求得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革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会有任何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良性循环,就会很好地健康地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化了。我曾经说过,我们过去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的想法。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恰当。一方面,由于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社会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地健全发展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仍然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说明如果搞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最近的国际形势使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逐步地、健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也包含着如何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各种社会问题时,又要反对另一种倾向,就是贬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当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做许多实际工作,也需要做许多科学研究。我们应当也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得到良性循环。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是社会学的任务。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经济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问题,还有属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社会学到底是研究哪一类问题的呢?这就涉及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难免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对



此,我想说一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在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能不分门别类,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但是社会确实是一个综合体,许多社会现象很难说只是经济问题或只是政治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与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文化传统,涉及人的思想意识,涉及通常所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因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又比如犯罪,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还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研究小城镇问题,这固然可以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各种社会现象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良性循环,确实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的精神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我想,从社会是综合体的观点,可以说明社会学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即除了要有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的研究等等之外,还需要有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要吸收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社会学是把社会当作一个综合体来研究的,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求找到克服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弊病的方法,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第三,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社会学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总体而言,它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如何克服弊病,促进社会良性循环。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它自己无法解决的。例如吸毒问题、犯罪问题等等,我看是解决不了的。听说西方的有些学者主张让吸毒公开化、合法化,使走私贩毒无利可图。提出这种解决办法只能证明那里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黑暗的地狱是不可取的；但是，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好得很，只讲那里生产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不讲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是片面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社会学家不应当只是做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论述，而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比如说，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研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也发展不起来，陷入政治、经济各种困境中。还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也要研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发达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存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去改善它的社会，这点和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对西方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社会学，用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进程的企图，我们必须给以认真的、科学的批判和抵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调节它的社会矛盾，采取一些方法革除它的一些弊病，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只能暂时起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的这些经验我们不是不可以参考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期不一样。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在农村搞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有什么可吸取的？现在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好，为此我们就需要利用和参考各方面的经验。随便举例说，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很大的行业——保险行业，是大资本家搞的，但这是社会



保障的一种形式。对这种经验,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和应该吸取的,当然要从社会主义的特点出发来利用这种经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批判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学界的眼光首先要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并应该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解放初期,我们曾通过讲社会发展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很有成效。这个工作现在还要做,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深入。研究各种社会形态,联系实际,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讨论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都是有益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只是由社会学界来做。但社会学界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为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社会学界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所能够 and 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工作者,和前辈的学者,和许多不断地培养起来的社会学新生力量一起,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第一篇是1986年4月26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载《光明日报》1986年6月22日。

第二篇是1990年3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4期,7月20日出版。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

一切学科都要前进,都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它如何前进?如何创新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或者从中国近代中无论举出哪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



有所侧重。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看出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当然更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

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许多人长期研究所取得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也还需要我们反复地加以阐明。例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轻易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几代人流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对于前一代人,这也许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结论,但对后一代人,也可能还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证明。

真理不怕重复,在重复中也可以有创新。历史的真理是需要反复地加以申述的。为了使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认识和



接受真理,不能简单地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当前的实践,对这些值得重复的正确结论,进行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为此,我们就要收集和研究更多的资料,作出更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进行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好像说的是老话,但仍可以有新意,这里也就包含着创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加以坚持,并且给予新的论证。对于过去的错误结论,要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正确的结论。

二

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没有作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充分。

究竟怎样才算是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里谈一些看法:

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即使是材料摆得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历史研究的可能。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别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



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例如,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百年的历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的认识。又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封建主义的政权。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农民革命的政权。这也是企图对太平天国得出一个本质的认识。当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如果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是否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任务?我想,这仍然只是做了历史的科学研究的开始的一步工作,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系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还远没有完成。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所谓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从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中得出一个概括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的确反映了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反映了隐藏在众多的现象后面的本质,那就是正确的;但它并没有把历史现象的一切复杂性、多样性全部反映出来。这种概括的认识表现为抽象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具体历史现象却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举例来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一贯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结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斗争的具体情况是极端复杂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前,斗争有时主要是反帝,有时主要是反封建,有时有某种程度的自觉,而很



多是不自觉的,有的甚至表现为低级的歪曲的形态。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时,也还经过不充分自觉到充分自觉的过程,有时还因犯了错误而受到挫折和失败,而且在各个不同阶段分别着重反对某一个敌人,并不是平均用力地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总之,虽然从总体来说,从本质上看,一贯地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实际现象决不是这一句话就说完了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在历史舞台上的许多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是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抽象的、规律性的概括认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了这种认识才不至于陷入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的海洋中,无法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无法驾驭所遇到的一切史料。但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毕竟不在于只是得出某些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以这些概念(如果这些确是科学的概念)为线索,使纷歧错杂的历史现象井然有序地展现出来。因此,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既要从具体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这是第一步;又要把这种认识再回到具体的历史现象,回到在历史舞台上具体的人和事上——加以说明,这是更重要的一步。

在这里还可以说一下,我们从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得出的某个规律性的结论,究竟正确不正确,怎样能够得到检验呢?列宁曾告诫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如果我们是从个别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又用这结论来说明这些材料,那当然毫无意义。我们应当尽可能掌握具有全局性的材料,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带着这个结论回到广泛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不但不回避,而且要敢于面对那些看起来和自己的结论不相适应的具体现象。如果这个结论能够贯穿一切,把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都说明清楚,那么这个结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23页。



论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这个结论不足以说明一切有关的历史现象，就要加以修正和补充。这可以说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一种形式。对于已往的历史的认识是否正确，当然不可能用现在的实践来证明（虽然有时可以参考），而主要是用已往的历史实践来证明。在这里，所谓实践，就是具体的社会活动，具体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应该经得起一切有关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检验。

如果我们对某一段历史确已取得了科学的认识，能够以此为线索，把有关的具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的活动如实地展现出来，把本质隐藏在其内的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如实地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科学研究就做得比较充分了。

只罗列材料而没有观点的情形，或者只提出抽象的概念而不谈具体的人和事的情形，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的。但是，至少在一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确有这样的毛病：列举了一些历史的现象，然后得出若干所谓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往往是人所共知的，而举出的历史材料也好像是为了证明其结论而故意挑选出来的，使人感到观点与材料并不是水乳交融。应当按照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所要说明的论点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有血有肉的，和具体史料溶合在一起的结论。

从纷歧错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规律性的本质的东西，又据以分析各种社会现象，这种方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现实生活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由于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过去的事情，不但其前因，而且其后果都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更便于我们来运用和学会这种方法。科学的历史研究，除了给人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外，又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锻炼自己的认识和思维能力。如果我们能提供更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我想，是可以从



这两方面给人以好处的。

三

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标志,并不始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著作家,如湖南醴陵人刘彦,他曾经当过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当过大学教授,当过北京政法大学校长。他在1910年出版了一本《中国近时外交史》,已提出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划线。以后20年代初,开始有些中国近百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不能说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是这些著作,一般地包含有爱国主义的主题。刘彦的1910年的那本书,后来在1927年扩充改写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他的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

解放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也有反爱国主义的。例如蒋廷黻,曾任过大学教授,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他著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他讲鸦片战争,是贬低林则徐而称颂琦善的。他说林则徐是完全不可取的,而琦善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外交家。他的这种观点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界中也很少有人赞同。他的立场是反爱国主义的。

解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努力对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作出科学分析,把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呻吟,提高到理性认识,阐明中国争取民主进步和争取独立斗争的



一致性,批判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反爱国主义论调。在爱国主义主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切爱国的历史学家站在一起。

现在,通过学习中国历史,在人民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也要担负起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更应该重视这个任务。中国近代史可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来之不易,使人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增强信心,使人们懂得,中国人决不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但必须要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能够负起爱国主义教育任务也不那么容易。简单地重复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的著作是不行的,当然更不能靠标语口号式的结论,这里也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研究。去年有的杂志发表文章,讨论 19 世纪末年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这是有意义的。我们对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需要有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不但由此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政策和策略,而且从这里看出过去帝国主义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今天实行的开放政策的本质区别,也可以看到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有些什么事情应该注意。把这类问题提到科学研究的水平上来是必要的。

四

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得与失,很需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总结。这项工作,我们还做得很少、很差。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虽然在整体上达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错误,并且从科学的要求来说,对于正确的结论也



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出现某些偏向和错误,加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不少错误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得不好,运用得不好而产生,这同“四人帮”统治下那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不能相提并论。

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对史料的编辑、考订,以及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以前,有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如何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近代工业化国家的历史,并以为只要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业,中国近代化的任务就能完成。蒋廷黻就是以这种观点来描述中国近代史的。他赞赏同治年间主持总理衙门的文祥、奕訢,也赞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搞的洋务,惋惜他们的失败。他认为如果曾、左、李成功了,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采取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觉得辛亥革命也似乎可有可无。至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认为只是起了破坏作用。在旧中国,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从农业国家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没有独立和民主,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富强国家。在旧中国,有些好心的善良的人不懂得这点,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至于奕訢、文祥、曾、左、李以及张之洞等,是以兴办“洋务”来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种失败和上述善良的人的梦



的幻灭,性质完全不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蒋廷黻等学者以为可以继承洋务运动的事业,抵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对洋务运动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确实有未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发展成为近代的工业国家的。例如日本就是。但中国没有过“明治维新”。“百日维新”是想走明治维新的道路,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是想走这条路,但是走不通。不但维新和君主立宪行不通,辛亥革命也没有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历史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不是去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而是要对这个历史事实给以科学的论证、深刻的说明。

中国是不是要经过革命才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这已经是历史实践中解决了的问题。近代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运动(包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和以后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这主要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然后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才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把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虽然我们国家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将中心任务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今天的建设事业是过去革命运动的继续。没有从鸦片战争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长期革命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建设事业。

现在,国内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还有国内外的敌人。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还要和用各种方法来打断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在这个斗争中保



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近代历史上,明确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对历史估价的问题,也是和现实生活有关的问题。

五

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阶段。对这个特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必须认真考虑到。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谓半封建可以说就是半资本主义,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因为是半资本主义,所以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开始属于资产阶级,以后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阶段,但是旧中国毕竟并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缘故。它具有同别的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共性,同时,又有它的特殊性。特殊性主要的就是由于它的前身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而来。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也不能不面对某些特殊的问题。

在旧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而另一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独立地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辛亥革命中曾制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民国初年也曾经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但只是一纸空文和徒具形式。中国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它



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要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就不出现这个阶段;也不会因为人们想要有这样一个阶段,就出现这个阶段。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或者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为中国规定的命运就是如此。

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少了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确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制度等方面,都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我们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肃清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我们曾经因为不注意这个问题而犯了错误。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是与此有关的。但我们今天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以后,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选定了的,是中国历史不可逆转的道路。如果以为中国缺少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而应该补上这一课,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就这个问题来说,过去从来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后更不可能做到。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社会主义,并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历史赋予我们这样的任务: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会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学会的那些好的东西,并且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扫除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时代扫除掉的那些坏的东西,并且扫除得更干净。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但应该能够坚定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且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更加健全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

最后说一下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过去,为了反对那种否定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旧中国的著作界中是习见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对农民革命和农民斗争的评价出现了过于“拔高”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该纠正。但它并不是在学术界中居支配的倾向。就太平天国的研究来说,一方面我们过去对太平天国的弱点,作过比较恰当的分析,如1951年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另一方面,确也有一些著作,作了某些不切实际的评价,甚至对于单纯农民革命中难以避免的弱点也曲为解说,加以美化。

现在,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总结经验时,特别深切地感到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封建历史,具有广大的小生产经济的特点,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广大的小生产经济是滋长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不讲究效率的坏作风的基础。近代史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特点,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我觉得有下列几点可以说一下:

第一,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不能不具有各种弱点,即使是在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但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都生活在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表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各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都受到影响。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大资产阶级不用说,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封建性。中国无产阶级是有其突出的优点的,但这种优点中也包含着弱点。它和农民有天然的联



系,这当然是优点,但也因而容易受农民小生产者的影响。农民所具有的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无产阶级的自己身上。这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在对农民和农民革命的弱点进行科学的分析时,必须充分肯定农民在近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从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说,资产阶级是比农民先进的阶级,但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上说,农民群众远远超过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能缺少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敢于向下层群众中寻找力量,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不敢做的。但是,辛亥革命终究没有能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也就不能不失败。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就因为无产阶级的党领导了广大的农民,把农民群众的力量组织和发动起来的缘故。

第三,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看到我国是个有 8 亿农民的国家,这是一种困难。从它造成困难的意义上说,8 亿农民好像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包袱”可以转化为财富。清朝时候有一个官员向英国人说,如果我们中国每个人衣服的袖子都长一寸,你们兰开夏的织布工厂就得成倍地增加生产。外国资本家也曾寄希望于中国的市场。但是,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所以人口众多的中国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市场。现在我们正在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 8 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富裕起来,并且还要逐步提高文化。当 8 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逐步地提高文化,那将成为多么巨大的力量。单就市场这一点说,从现在的 8 亿农民转化形成的较高的购买力,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广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如何建设富裕的、民主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农村,这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础。我们近代史研究者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



题有所贡献。为此,我们就一定要对农民的弱点作恰如其分的分析,并且充分地估计农民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1981年3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5月20日出版。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 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致友人书

来信收到多日。没有立刻答复,是因为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一下子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现在虽然想了一下,也不见得能说出什么道道来。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我看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农民战争不但频繁,而且规模巨大,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色。太平天国虽然发生在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但是它和已往的农民战争还是有不少共同处的。太平天国研究者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感到材料不足,但是比起已往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材料要算是最丰富的了。把太平天国研究清楚,对于了解已往的许多次农民战争,显然是有好处的。

太平天国又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道路,在太平天国时期已显露端倪。对太平天国的深入研究,是有助于说明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特点的。为了认识农民在



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这一次农民大革命研究清楚,也是不无帮助的。

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研究的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而其中最值得受到重视的是在某些历史转变关头带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的历史现象。这些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要环节之一。把这样的环节认识清楚,有助于认识整个历史链条,而这是最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特别需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这实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很好的用武之地。中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太平天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形表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确是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应该通过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来学习和锻炼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能力,而当我们能够对太平天国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清楚的科学分析的时候,就真正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那么,怎样使我们的太平天国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呢?——这是你的来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材料积累得不少,但对已有的材料还没有足够地加以整理,并足够地给予分析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所根据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

是否需要发现和收集更多的材料呢?需要的。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采集尚未到手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需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但是分歧意见之所以产生,恐怕不能说就是因



为材料不足的缘故,至少有不少问题是不会因某一种新材料的出现而豁然开朗地立即得到解决的。

我想,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整理和分析、研究这些材料,如何从大量的复杂的材料中舍弃那些次要的材料(虽然不是完全置之不顾),而找出最关紧要的材料,如何透过复杂的现象得出本质的认识,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现象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等等。

历史研究者所遇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如果只停留在对某一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事,对某一件事的具体情节作现象的描述,那就至多只能做些考订工作。如果进而要对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作出一个判断,对某一件事的历史意义作出一个说明,就不能不进入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他这话是针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而言):“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接着恩格斯又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错误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①

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中,有没有轻视理论思维的倾向呢?有没有由于轻视理论,以致陷入自然主义地(也就是任意地),因而是错误地思维的情形呢?我以为,不能说没有。因此,对于太平天国研究者,也正如对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一样,着重地提出学习理论思维,学习正确地思维的问题,恐怕是必要的。

为此,历史研究者需要学习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这或许是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

^① 《自然辩证法》。



带关键性的一点。要提高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水平,其实就是要提高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们自己的水平。

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有了共同的哲学基础,并不就会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立即有共同的结论,还是要“百家争鸣”,而“争鸣”的结果是有可能达到共同承认的结论的。如果是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的争论,是很难找到共同语言,达到共同的结论的。

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当然不只一个。我把学习哲学当做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途径,但并不排斥其他途径。

我想建议历史研究者认真重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本历史分析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你所工作的机构里,是否可以抽出点时间,大家读一遍这些著作,讨论几次呢?固然这几本书是大家都读过的,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对同样一句格言,一个初入世的年轻人的理解和一个有了许多人生经验的人的理解是会大不相同的。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甘苦以后,重读这些著作是会得到远比过去深得多的体会的吧。除了这些最著名的著作以外,这两位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还有许多历史——政治评论值得我们阅读,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中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九卷中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同一卷中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第十卷中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第十一卷中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第十五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几篇短篇文字,等等。读一读最富于理论思维能力的大师如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实在是对我们很有教益的。



我原来是想说如何提高和加深太平天国的研究,但我以上所说恐怕是离开了题目,说成一般的历史研究了。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太平天国研究者要丢开太平天国研究,先去学哲学,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然后再回来搞太平天国研究。不是的,理论思维能力也还得通过实际工作——这里说的是具体研究工作来提高。

有人说,若干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工作虽然进行得很不少,但研究领域还太窄。我同意这种意见。我们不但是研究太平天国,而且是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因此,太平天国时期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太平天国的敌人方面的状况,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都应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虽然还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但是检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写成比较系统的著作,我以为,这是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做的事。

也有同志说,30年来,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小册子以及较大篇幅的书虽然出了不少,但是很遗憾,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既然要总结研究的成果,就可以集中人力写出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来。

如果采取集合许多单位、许多人,拟定提纲,各写一章,汇集成书的办法,写成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也是可能的。但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大概只能是资料长编性质的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部书,使大量的散乱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而汇集起来,这对广大研究工作者也可以有推进作用。但是,我更希望有既立足于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又是有思想性的、有创见的,并且有自己的写作风格的著作。

如有有志之士写出一部不是堆积资料,而是具有概括和分析能力的,虽然不是那么“全”,但对重大问题作出比较深刻的剖析的



太平天国史(一卷本或多卷本),当然值得欢迎。但是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分成若干题目,有几个作者分别担任,各写一本书。这些题目可以是,例如“太平天国的发动”(这本书是写太平天国发动前的社会情况以及它如何发动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主要是军事史),“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等等。题目甚至更细一点也可以,例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太平天国统治时期的浙江地区”,等等。并不一定要求分别写出来的这些书合起来就是一部太平天国全史。每个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选定一个题目。每个作者所写的是一个局部,但是他应该是胸有全局,通过他所写的局部来表达他对全局的看法,而又因为所写的是一个局部,就有可能比较完全地掌握有关的材料,比较充分地检阅在有关问题上的已有的各种看法,他也可以写得更深一点。因为每个作者都是独立著书,他们的看法当然可以不完全一致。如果在各个作者自定题目的前提下,由适当的组织(例如太平天国研究会)稍加调整,尽可能使若干重要的方面都有人写,又尽可能避免重复,那就更好了。但也不必勉强求全,不同题目的著作中有部分的重复,也无不可。

我想,如果在三五年间,有若干作者写出这样的五六本、七八本、十几本专题著作来,太平天国的研究就可以大大前进一步了。

信手把由你的来信引起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作为一次漫谈吧。

1982年4月

原载《光明日报》1982年4月12日。



从中国近代史中学习什么

中国近代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 109 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历史。现在很多青年都在学习中国近代史。我们从中国近代史里学些什么呢?

第一 认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革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使中国开始脱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习近代史就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根本变化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近来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报道外国的首脑人物来访,他们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平等的会谈。大家看惯了,并不觉得新奇。可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没有的。在旧中国,经常看到的是:日本军队打到中国来,英国军队打到中国来,美国军队打到中国来,法国军队打到中国来,沙皇俄国的军队打到中国来。不用说发生战争,就是平常时候,中国境内总是驻有外国的军队、军舰。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有外国的军队在上海、天津等地登陆。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的政府首脑从来不到中国来访问、会谈。他们是在华盛顿、伦敦、东京……过问中国的事情的;至于世界的事



情，他们更是从来不问中国当政者的意见。帝国主义国家下三流的官员，一到中国，就成了了不得的人物。中国的反动政府伺候奉迎，唯恐不及。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官员到中国，是以中国的主人的姿态来的。列强驻中国的公使、大使，随时都可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所以，从我们今天看得很平常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林了。

我上小学、中学是在 1927 年前后。那时学生们用的铅笔是从德国来的，叫做鸡牌铅笔。印教科书和其他书报的纸是瑞典来的。用的火柴也是从瑞典或是从日本运来的，所以叫洋火。用的煤油是来自美国、荷兰的石油公司，所以叫洋油。此外，洋纱、洋布、洋线、洋钉、洋漆、洋蜡这些词汇的出现，也都是那种情况的反映。那时，洋货充斥市场。不但机制品大部分是从外国来的，或者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办的工厂生产的，甚至上海人吃的橙子也是美国来的，叫做“花旗蜜橘”。中国虽然也有民族资本办的工厂，但是竞争不过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手工业也越来越衰落。

半殖民地，就是半独立。旧中国形式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没有独立的主权，任人宰割。在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和支配中国的是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在对内对外事务上都要看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不得到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他们是不敢做什么事情的。

半封建，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生，并且有了些发展，但很不发达。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中国没有能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或改革，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走过的路。中国的古老的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时，由于有帝国主义的



侵略，变成了一个可说是畸形的社会，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就不能不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清政府的任务，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时代。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想继续革命，继续完成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但他处处碰壁，找不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来。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不可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来完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是经过了近30年的斗争，经历了许多艰难和曲折才取得的。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几个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合了起来，提出取消革命的主张，所以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他们认为，国民党当权已经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不需要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坐等在国民党统治下，让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国民党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而上台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自由地发展起来。如果按照取消派的主张去做，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人民只能坐视中国一步步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

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办呢？它首先到农村去，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没有能够发动农民的力量。但单独靠农民的力量也不行。近代史里，曾有过多次的农民革命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都失败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把最广大的农民群



众的力量发动起来，去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个革命就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革命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国革命就是走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又比较迅速地经过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学习近代史，就是要看出新、旧中国的根本不同，也要看到旧中国是经过什么样的道路变成新中国的，为什么只能走这条道路。

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跳过了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这样，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不可能不遇到一些特殊困难，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我们是“一穷二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烂摊子。我们很穷，缺乏资金，工业基础差，科学技术不发达。我们的技术力量，我们对现代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都很缺乏。我们有广大的农村，而农村的生产水平很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实际情况。

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因此也就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始终不能给劳动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但它比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国家是否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时期是大为不同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我们的确建立了资本主义根本不能比的民主制度，广大工人农民的地位和在旧社会中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是在逐步健全和完备起来的过程中。人民的民主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由什么人恩赐的。我国人民通过斗争推翻了剥夺人民的任何民主权利的反动统



治，争得了民主，也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学会正确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消除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妨害民主生活的种种习惯势力。在我们的社会里，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个人迷信这一套，又容易出现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情况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有联系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联系的。

由于中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广大人民具有反帝国主义的爱的传统。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也产生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民族自卑的心理。这些虽然主要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具有的东西，但也影响到整个社会。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扫除了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产生的基础，但是，这种从旧社会留下的坏遗产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程度地起着影响。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时，既要克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这并不是我们所要发扬的爱国主义），也必须克服半殖民地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崇洋媚外、民族自卑的心理。

以上是简略地说了一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我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产生的一些特殊困难和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补上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一课，然后再变成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就与民主革命时期破产了的“托陈取消派”的意见差不多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如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我们的国家不依靠工人农民这样最广大的力量，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半殖民地的地位，重新变成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侵略、掠夺的对象。这难道是我们可以走的道路吗？



学习近代史使我们看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固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千辛万苦走出来的,但又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既然使我们的国家可以而且只能跳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走这条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克服一切我们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东西,学会为使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前发展的一切必要的东西,而且学得更好。

第二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重要的不是要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想,通过学习历史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身就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间抽绎出来的理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不学习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近代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社会阶级关系特别复杂的一个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有国内的许多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不但有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又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社会矛盾特别复杂,变化也非常迅速。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同我们今天的实际关系又最密切。要能对具有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变化得又迅速的历史认识清楚,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武器。研究这段历史,也就最有益于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出来的。学习中国近代史,当然也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是要从表面上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间剖析出它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问题,观察社会,也就是要学会这种本领。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人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就能够看得远一点,这就是历史的预见能力。只有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有科学的预见能力。学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了解昨天怎样变到今天,然后才能看出今天怎样变到明天、后天。认清历史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看现在的问题,帮助我们从现在的许多事实中间看出将来的发展前途。马克思主义又可以说是显微镜,帮助我们看得细致一点,看得深入一点,看得透彻一点,使我们避免片面性。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只能客观地、认真地去研究它。我们要具体地分析研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历史事件起了什么作用,与某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人物各自起了什么作用。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在活动中表现的主观企图,有些暂时得到实现而终归失败,有些只能得到部分实现,有些则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有些虽然暂时完全失败而从长远说来则又起着积极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间,就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



第三 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现在，我们要调动和集中全国的力量，同心同德，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最根本的是建立在人民的力量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势力，有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从清朝皇帝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都曾具有强大的势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但结果到底是谁强大呢？还是人民的力量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同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以大的革命运动来说，就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后来又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是，这些斗争证明了中国人民不是只能为自己苦难的命运呻吟的人民，而是敢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斗争的人民。我们的前人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想法，不免做了这样那样的蠢事，他们所进行的斗争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败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败的斗争也起了推动中国历史进步，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不经过各种由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从这些艰难曲折的道路中间，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就是能够在任何困难环境下面，坚决进行斗争，通过斗争来一步一步找到前进的道路。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传统。我们现在还有继续斗争的任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困难要克服。我们在国际间还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当然斗争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时代不同的）。在国内来说，还有少数敌视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我们还要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



各种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和我们的文化落后的状况、我们知识不足的状况作斗争。在这一切斗争中间,我们能不能最后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前人既然能够战胜一切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强大势力,那么,我们现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一定能取得胜利。党的十二大对于我们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指出了明确的道路,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这些相联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也就更坚定我们的信心。

1983年2月

原载《电化教育》1983年第2期,4月25日出版。



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

——一封信

大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已经读过，昨天又收到了来信。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答复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来信说：“您是史学界的权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为理由，劝您不要写这篇文章。您说：文章发表后，“有人夸我胆子大，有人为我担心”。又说：“总之，发表与您不同意见的文章，很像捅了马蜂窝。”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我虽写过两本书和一些文章，但说不上是“权威”。您所说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后，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文章已有过一些。

当然，“学术界的权威”并不是坏话。我国学术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权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认为他是权威就是权威。其实说不上是权威，但人们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视之为权威，这种情形在我国学术界恐怕是有的。

对权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吗？我看是可以的。真正的权威也不见得在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完全正确。在我看



来,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于权威或被视为权威者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说出来。我同意您所說的,“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应该“冲破这种气氛”。情况是复杂的。我也不敢说,对权威提出不同意见,一定不“倒霉”,但总不至于大倒其霉吧?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想方设法使他倒点霉,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权威,都应当受到谴责。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1981 年在北京和 1982 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1984 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只是就原纸型改了个别字句,并不像来信所说,是修订后的第二版。我还来不及加以修订,出第二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修订工作,可能要对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补充。但是,在学术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务运动问题上和辛亥革命问题上,原书的基本观点大概不会改。一本书的作者(不论是否权威)不一定因为一看到批评和不同意见,就来改自己的书;批评者当然也不必因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发表不同的意见,这些是不待说的。

现在我要说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说以下几点:

(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复”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的书尝试对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我的着眼点是分析革命派、立宪派、封建势力和以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这四种力量的错综关系。大作指出,我对安徽和江西没有提到李烈钧和柏文蔚。这是一个缺点。由于当时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对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过于简单,结论下得太快。当时许多省的情况的复杂还在于,有了省级的军政权后,也并不就能统治一个省,甚至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政权。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权的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复杂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叙述阎锡山在清军进攻下退避晋北时说:“但



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斗争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①。还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军政府和他们进行的战争(第1080页)。别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说到一些,但对这些省的复杂情况可能有说得不够的缺点。当时,全国各省都存在着革命的主流,正因为这样,立宪派要附和革命,旧势力也要标榜革命。我以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问题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势下,为什么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势的发展,为什么许多省的政权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里。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书中的话:“……从武昌起义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第1028页)。这是在论述武昌起义后湖北政权发展的情况时说的。武昌起义后,在武汉的形势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型的政党,但革命党人仍进行着种种努力,这也是我在书中说了的。大作对于书中针对武汉情况说的话(还有第1043页讲贵州情况的话)提出异议,却从全国的情况来进行论证,显然是对这些话作了误解。的确,“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当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但并不是说,武昌起义一发生,全国范围都已不存在革命党了。

(三)大作认为我的论述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准衡量辛亥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我认为,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有助于我们去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问题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懂得,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是根本错误的,而要认真考察在这种合作中谁影响了谁。这并不是用无产阶级革命

^① 第1054页——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页码,这里也用这个本子。



的标准来“衡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是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例如要求他们有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要求是毫无意义的）。大作中也说：“关键是当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歧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坚持革命立场，抵制、排除保守、反动势力的干扰，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分裂。”我想，这样说是可以的。但并不能以为，这就是要求他们坚持革命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四）大作一开始就指出列宁、毛泽东如何“高度评价”辛亥革命。我以为，这种总的概括的评价，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不能从这种概括的估价中演绎出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说法我以为并不符合实际。例如说，辛亥革命中“形成强大无比的革命势力”。又例如说，“在世界上很少国家像中国辛亥革命这样，从革命爆发，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仅仅用了两个多月。英、美、法等国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经过多年革命战争，反复较量后才取得胜利的。”这无异于说，辛亥革命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取得了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多年才取得的胜利。但大作又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软弱，它领导的辛亥革命夭折了。”又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封建买办势力进行一个回合的斗争后，就一蹶不振，丧失了战斗力”。对于这些情形，难道不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吗？大作中认为，按照我的书中的描写，省级军政府都成了“漆黑一团”，那么“在各省军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成为无根之木”。在我看来，南京临时政府并不是无根之木，但也不是根深蒂固。它的命运就表明了它并没有得到各省军政府为其可靠的基础。大作又认为，我的书中既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又承认“在中国国土上树起民



主共和的旗帜”，这是自相矛盾。但是事实上，辛亥革命是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但又并未实现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我们只能承认事实并给以说明，而不能依靠逻辑推论来说明问题。

以上是我在读了您的文章后初步想到的几点看法。总之，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我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是写给您个人的，但也可以发表。如果您同意，请您和《近代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商量一下如何？

1985年5月10日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9月出版。



在孙中山研究述评 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5天,现在结束了。我在这里说以下几点:

第一,对这次讨论会怎样估价?

近年来,各种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多,每次学术讨论会,都征集了许多论文,起了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但是,不少讨论会——我这里只是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有一个缺点,就是讨论得不够。有些参加过我们的学术讨论会的外国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讨论会的时间被宣读长篇论文占去了,或者虽有讨论时间,却被一两与会者的未必很精彩的长篇发言占去了。当然,也有些讨论会开得比较好,能够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我们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开得比较好的一次。

为什么能开得比较好?我以为,有两条说来也很平常的经验:第一是说短话,第二是能够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的看法。在有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有些同志似乎不大懂得,在学者的聚会上和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课是不同的。在这里,没有必要把人所共知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讲;为了要说出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见解,或者说出问题的疑难所在,在同行中间,用5分钟、10分钟发言就可以使人明白了。大家都讲短话,长话短说,才能开好讨论会。至于无所



顾虑地说出不同意见,这当然更重要。学术研究中必然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如果在不同意见和看法间不能交流以至争论,学术研究就会停滞下来。

我们这次讨论会,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经过讨论,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出结论。这固然因为这次会议是以介绍情况为主,并不是专门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但还应该说,任何有争论的学术问题,都只有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解决。在讨论会上,如果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摆出来,把问题的疑难点揭示出来,或者把在研究方法和其他方面的不利于达到正确结论的障碍揭示出来,我看就算有了成绩。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认为,这次讨论会是成功的。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即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人,能否同不采用,乃至不赞成这种观点方法的学者进行讨论?——我以为,这种讨论是能够进行,并且是有益的。如果认为,在任何问题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必然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必然得到另一个结论,那么二者间就不可能进行讨论;要讨论就只能是或者你说服我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我说服你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事实上,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学者,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能够在这个那个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我国现在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研究上也要实行开放。对于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学会和不同观点方法的学者交换意见,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不是贴在商品上面的商标,而是探寻真理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



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不是适应一时需要的、封闭的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和其他学派等量齐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应该是既善于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十分注意防止自己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它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有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考虑他们提出的批评和不同看法。我以为,这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中应该采取的态度。

第二,为什么研究孙中山?

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到,近几年来在中国对孙中山的研究有较大的开展。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注意研究孙中山?孙中山的研究属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近几年来,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的研究,都有较大的开展,同时也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的研究。其所以要进行这些研究,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原因。今后15年,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键时期。在这时期,我们要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过去几年,已经有了初步成就,但在前进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困难要克服。需要着重说的是,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就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的国情出发。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和它的历史传统有关的。历史传统中既有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积极因素,又有应该注意克服的消极因素。说到中国的国情,就不能不注意到我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又迅速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中国历



史上长期的封建时代也和了解中国今日的国情有关,但更和当前的国情有关的当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孙中山的研究是以辛亥革命为顶峰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心课题,这个时期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孙中山又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的其他人物,研究与这些人物有关的事件、思想,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有助于了解今天的国情,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国际的中国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把过去单纯研究古代的中国,转而用较大力量研究近代(现代)的中国,我想这也是和注意今天的中国及其发展有关的。

这次讨论会中提到一个值得想一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有些历史研究者纯粹由于历史兴趣而去进行某些研究工作,对此也不一定要予以反对。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外,我以为,是由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很复杂的,研究者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罗列一切事实,而总要有所取,有所舍。取什么,舍什么,往往和现实生活向研究者提出什么问题有关。所以,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我以为,研究者将无所顾虑地力求准确地研究我们的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在孙中山的研究上也是这样。

第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给我们以什么启发?

这次会议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看到有些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使我们看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即研究方法方面),我以为这次会议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许多发言者提到这方面的意见,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意见都归纳起来,只试就个人的体会说一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有国际意义。我们要歌颂这位民族英雄,但不只是歌颂。如果只是歌颂,写几首颂诗就可以了。许多发言者说,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复杂,而且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和他的发展道路,都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应该能反映出这一切。既然我们把他当做研究的对象,就要如实地分析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他的成就,也要分析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他的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矛盾,等等。如果说,因为怕损及民族英雄的地位,就不可以探讨某些问题,这样的禁区是没有的;由于某个“权威”发表过什么意见,因而不同的意见就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戒律是没有的。

有的发言者对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出一个批评,说我们的研究常常只限于对人物的褒贬,这个缺点恐怕是有的。这可能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对人物的评论,往往只是说出他的功过、忠奸、好坏。我们对历史人物和他做的事情,常常给以起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样的评价。这种评论是必要的,但有



时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而且作出这种评价,决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论,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从事孙中山的科学研究,不是当吹鼓手,不是当法官,也不是为他当参谋或为他当辩护士。例如,对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让位给袁世凯,我们不是歌颂他的“谦让”的美德,也不是谴责他妥协的错误,不是以当时他的处境来为他辩护,同时也不是建议他应当如何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既然是作科学研究,就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怎样迫使孙中山实行这种让步,这种形势是如何形成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能抗拒这种形势,孙中山本人和当时其他人物如何看待这一让步,其实际后果如何,等等。

历史上的人物,总是抱着某种预期的目的来进行活动的。但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最伟大的人物也有时难免发生这种情形。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分析为什么有些预期目的能够实现,有些预期目的不能够实现或者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于孙中山和其他历史人物,我们也必须如实地考察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其后果如何,为什么他这样想,这样做,为什么后果与其预期的相近或者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伟人。我们要从孙中山来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从中国的这个时代来看孙中山。孙中山创立了辛亥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成为当时先进的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不是孤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英雄。他只能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提出的最先进的思想。他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潮流,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的弱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得很快。他的先进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弱点。他领导的运动取得了成功,而又很快失败了。但他仍



继续前进,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有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它以后的发展,直到今日的中国。

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参加,也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参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孙中山的研究要由许多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以至外国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示孙中山及其时代这个课题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孙中山的研究来加深对中国近代(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1985年8月

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1988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谈党史研究工作

— 党史工作者要注意学习 中国近代史,学习理论

党史和许多学科有联系。党史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到和党史有关的各学科。

我们把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看作两个不同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者再上溯到五四运动,这60多年的党的历史。党的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和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是不可分的。

有过这样的说法,党史主要是讲党内的路线斗争。这种说法不恰当。并不是说党史不要去讨论党内的各次路线斗争、各种思想分歧,这是党史要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我们不要把任何党内分歧都叫作“路线斗争”。各种分歧主要是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党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这里面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在研究这个如何革命的问题之前,还有个前提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个革命的党?弄清这个前提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必须进行民主革命,以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怎么来的?党为什么必须存在,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这些问题不是就党论党所能说清楚的,要说明这些问题就必须讲清中国



革命的历史背景。

有些不懂得历史的青年说,国民党统治下发展了资本主义,而只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对中国就是起了进步作用。按照这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1927年以后是在起着促进中国进步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为什么非要共产党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不可?如果我们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而只是讲党内在那里争,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那又有什么意义?当然,要说清楚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村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是唯一正确的路线,也必须把社会历史条件说清楚。国民党统治时是搞了一些工业,但是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发展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了障碍的作用。托派反对我们党进行革命。他们说国民党的统治代表资产阶级,应该让它发展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前不要进行革命。究竟是托派取消革命对呢,还是我们党坚持革命对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从1921年到1949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说明当时的革命任务为什么是反帝反封建,为什么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就不能不把眼界放到中国的近代历史,包括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没有近代史为背景,党的存在和斗争就没有根据。只有从这个背景下面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革命,为什么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了这个前提,然后才有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是必须要革命,然后才是谁来革命,由谁领导革命。要有共产党,然后才发生党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领导了整个国家,党的历史和整个国家的历史就更加分不开。这些是说研究党史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党史不可能不和整个中国近代史密切联系,党史工作者必须注意中国近代史的全局。



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党史工作者对于哲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但不应轻视,而且要充分地认真地去加以研究。近几年来,整个历史研究工作都有一点轻视理论的倾向。历史讲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问题,好像不需要进行抽象思维。但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不能只是把一件件事情记载下来,而要给以说明,说明各个事件的联系和它们的意义。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就说不清楚。历史学不应当成为单纯的史料考据学。我们承认考据对于历史研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党史中确实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人、事件、时间,只要是重要的,当然有必要考证清楚。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

以上是说一个党史工作者要注意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注重理论的研究。此外,作为党史工作者,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

二 党史工作者要关心现实,关心现实生活中的思想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研究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因此不能眼光只看历史,也要看现实。关心现实问题,关心现实的政治、经济,关心党和国家向前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对于一个党史工作者是必要的。对于已往的历史,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研究某一个问题,特别注意总结某一方面的经验?这常常是为了



现实和将来的某种需要。写历史好像是向后看，实际上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所谓影射史学。牵强附会地以过去影射现实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否定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实。

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就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略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研究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党史工作者决不能眼睛只看到过去，而不关心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情况，不关心当前思想界的状况以及群众的思想状况。前面提出的问题，即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要有中国共产党，就不是抽象地提出来的。从当前现实生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出发，说清楚这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还要看到，对党史中有些问题，或者和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在思想界、文艺界中存在着混乱的看法。例如，在一篇新近发表的小说中，表现了否定全国大陆解放后镇压反革命的态度。既然有这种看法，党史工作者就有义务说清楚，为什么全国大陆解放后有镇压反革命的必要。人民群众当时对镇压反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是和这篇小说中的反映完全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必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注意到这些，也许研究党史的兴趣就更浓了，针对性也更强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指出了目前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另外一种倾向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



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主要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说服教育。党史教育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

三 当前思想学术界提出的一些问题

目前，历史学界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够重视，甚至对此抱否定态度。比如，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有人认为中国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不对。他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他们说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破坏了这种社会环境，因此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甚至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这么久，也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否则中国早已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历史学界有不少同志不赞成和批评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应该受到批评的。生产力的发展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根源，但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脱离了生产关系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看不出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否定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会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否定掉了。这主要是讲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好像和党史研究的关系不大，但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来，很显然就要和党史发生关系了。脱离生产关系讲生产力，人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共产党为什么要闹革命呀？革命不是和中国农民战争一样“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环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吗？从生产关系上说，那时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生产力不能向前发展，必须要革命。革命就是要破坏束缚



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要认真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能再天天抓阶级斗争,现在有可能也必须保持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十二大的报告指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有些人认为,现在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好像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研究历史也不必用阶级分析方法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和用阶级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历史问题是两回事。在以阶级对立、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研究革命的历史,不用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发展生产力,但不能把现在的说法搬到历史研究中去。这不是联系实际,而不过是影射史学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说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就可以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哪有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造成农民大量破产,流离失所,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形成农民的斗争。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如果共产党不领导农民起来革命,就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了,这可能吗?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掠夺,军阀割据,不断进行内战,根本不可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才有可能和平安定地发展生产力,而为了保卫这种和平安定的环境,还需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斗争。我们研究党史要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能搞想当然。把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是不对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我们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我们要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



历史进行科学的分析。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在还有一种观点,说不应当受“两个过程论”的束缚。所谓“两个过程”就是指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这点是不是正确呢?过去有些写中国近代史的书,只讲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只讲中国怎样可怜,怎样受欺负,而看不见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被称为“两个过程论”的这个论断,全面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本质。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去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能说是错误吗?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近代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各种具体的历史现象?怎么能说“两个过程论”是束缚人的框框,把近代史研究给束缚住了呢?说要跳出这个框框,到底要跳到哪里去呢?有人给了一个含糊的答复,说近代中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似乎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确,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这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志士仁人所致力的事情。但是,我们决不能脱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半殖民地殖民地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根本事实而来谈“向西方学习”,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西方不少资产阶级学者就不承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说西方文化到中国来影响了中国,帮助了中国进步。他们用这样一个基本线索看中国近代历史,抹煞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侵略的确起了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随之



在近代中国也就产生了封建社会中所没有的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革命斗争。但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的根本作用是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支持和维护中国的落后的反动统治、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毛泽东 1949 年在评艾奇逊的白皮书中对此作过详尽的论述。中国近代历史是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把“两个过程”当作死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每一件具体事情上去,是不对的。但被人称为“两个过程论”的上述论点是指明了近代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把它看成死板的公式,而是把它当作研究近代历史的主要线索,这当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主要线索的指导下检阅和分析研究全部复杂的过程和各种复杂的问题(例如,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有矛盾)。把“两个过程”看成是束缚研究者的头脑的东西,是没有理由的。

这里再讲一下“异化”与“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几年来在不少杂志书刊上发表了讲这个问题的文章。有些文章的作者把抽象的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讲人性的异化和克服人性异化而恢复人的本性的问题,因而人道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劳动异化和其他各种异化。有的作者说,“解决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也有作者说,异化概念“能帮助我们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要用它来说明现实的历史、社会问题”。还有人甚至说,“异化理论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和线索”。这些说法都是很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任何理论上的错误都说成是精神污染,但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上述这些错误观点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追随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一种潮流,从根本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用非科学的概念来评论社会主义,这只能导致怀疑和反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结论。马克思是否讲过“异化”？是讲过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后来又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思想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1844年马克思26岁时，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学、哲学的手稿。在这些手稿中，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性，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了劳动异化和各种其他异化，而共产主义就是要克服异化，因此他称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在写这些手稿时还没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也还没有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还没有形成。1844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写《共产党宣言》时，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848年以后，马克思再不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划等号，而是直接批评各种抽象的人的观点。他的许多著作中完全不使用异化概念，而只是在《资本论》里有几处用到异化的概念。《资本论》里也只是用“劳动异化”、“异化劳动”来描写一种现象，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劳动异化的现象，他是用剩余价值学说，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来解释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异化理论，有个和异化理论相联系着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并认为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前没有发表。他逝世后50年，在1932年才有人把它整理出版。出版后的这部手稿立刻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很大兴趣。从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二十年内，研究这个手稿形成了一个热潮。他们说，从这部手稿中发现了一个“年青的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的高度上大胜过“传统的马克思”。他们说，真正的马克思其实不是“传统的



马克思”，而是“年青的马克思”，或者说，全部马克思的著作都必须用1844年手稿中的基本概念来解释。美国的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他说，现在马克思已不是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作者，不是以革命家的姿态出现，“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

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掀起这种热潮，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在思想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企图反对和推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阻挡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在这种企图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改而采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手法。26岁的马克思写的手稿被当成了一种武器，用以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无害的思想，并用以来攻击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攻击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界有不少人广泛地使用异化概念，以为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于是赋与异化概念以各种含义，例如“无能为力”、“生活没有目的，没有意义”、“行为没有共同的规范”等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实际生活和思想上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的一种反映。使用异化概念只是表现了这种现象，而并没有给这种现象以科学的说明。

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我们也可以研究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从这里看出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发展过程。有的同志把手稿中的话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来引用，只简单地注上“见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某页”，这是吓唬人的、不严肃的做法。至于人道主义，我们是要讲的。我们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人道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不是从抽象的人的概念



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理论,不是从所谓克服异化、恢复人的本性的说法出发来讲人道主义。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我国宪法关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一切人的能力和才智,也是人道主义的表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是解放全人类,而这个理想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来最后达到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还有旧社会的残余痕迹,有许多弊病,还不成熟,因此还要改革,还要发展。用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察社会主义,只能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否定,而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健全和发展。

异化、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和我们党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好像这只是哲学界的问题,与党史没有多大关系。既然这是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问题,党史工作者怎么能不关心呢?如果按照这个论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史就非重写不可。如果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线索,那就必须用异化论去解释党的历史,必须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党的历史经验,必须以异化、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而且必须通过党史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用这种观点论述党和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完全错误的。

1983年12月

1983年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几次讲话的综合稿。
原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1月25日出版。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要求。历史是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研究党史好像是向后看，但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历史。我们研究过去常常是针对现实的，是根据现实需要研究过去。当然不可以为了现实的需要改造历史，历史是不能改造的。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是怎样就怎样。但过去发生的事很多，究竟哪些是重要的，需要着重研究，这就要有选择。选择就要联系现实需要。

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已往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到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当前我们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今天现实生活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与党史无关的。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书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

党史研究要注意社会效果。如果对某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在党



史中没有根本性的意义,而在这些枝节上进行争论,只会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党史上的事多得很,如果要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材料里,不能自拔。我们应选择那些在历史上本来就重要,对现实生活有意义,对振奋人们精神,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和思想方法有好处的问题,抓紧进行研究。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在旧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并不是不值得重新说清楚。过去我们讲党史,着重讲党内的路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虽然也涉及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但主要是讲如何进行革命。因为是对认为必须革命是个不成问题的前提的人说的,所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上。但现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有人提出,近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而要近代化(或现代化)就要发展工业,振兴商业,发展教育,等等。有人甚至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就需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局面。农民战争造成混乱、动荡,使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因而不利于社会发展。提出这种看法,似乎忘记了封建的剥削制度迫使农民活不下去,因而才发生农民战争,这样一个在两千年间反复出现的事实。按这个说法推论下去,就是革命只起破坏作用,妨碍了社会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需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只要发展工商业,发展教育,旧中国就能变成新中国。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工商业、教育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怎么办?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社



会进步与发展,才有可能使落后的中国实现近代化、现代化。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现在既然有人提出了如上的看法,那就需要我们深入进行研究,举出大量材料从各方面加以说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证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因此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不满,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们的心虽然是好的,但是他们看不到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他们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同这种主张的论战进行了很长时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作了一个结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中国富强。但是,富强的第一步是通过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时要注意的一个基本方法。昨天的实际决定了昨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决定了今天要做的事。今天的实际是从昨天的实际变化而来的,但不能把二者混淆起来。经过在旧社会制度下长期的革命斗争,我国人民现在才有了安定团结的、独立自主的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我们已经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正确的,但又是艰难的道路。回顾



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知名爱国人士,在国外看到殖民地的状况时触目惊心,不能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忧心忡忡。

梁启超在1900年曾游历夏威夷群岛。他说,1788年英国殖民者始到此地,“至今百余年,白种势力逐渐扩张,近三十年来,法权、教权、财权尽归于美国之手,握其国之实权者皆白人也”。英人初到夏威夷时,当地土民有20余万人,但到1890年成了34436人,到梁启超去的前几年1896年成了31019人。他从统计表中看到,大约每六年就减去十分之一,因此惊叹道“依此比例,则百年以后,全岛中将无复一土人矣”。梁启超感慨地说,“自古之亡国,只国亡而已。今也不然,国亡而种即随之。殷鉴不远,即在夏威。咄彼白人,天之骄子。我东方国民岂不儆惧耶。”他也说道,这个岛上近几年来商务日盛,谋生容易,当地人自以为得意,但岂不知绝种的危险即在眼前。梁启超并不是主张革命的人,但他在当时绝不是个守旧派。他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的新文化介绍到中国来,但他不能不为中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而大声疾呼。

到1934年,又有一个爱国者邹韬奋也经过夏威夷。他说,当地现在共有人口38万余人,但“这群岛原来的主人公(即夏威夷土人)却占极少数,只有22230人,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六不到!”从1896年的31000余人,又减到2万余人。韬奋根据两个美国人的著作说,土人死亡率高主要是由于花柳病的流行,而这种病是宣扬“文明”的西方人带去的。韬奋说“土人不胜梅毒和残酷榨取的蹂躏”,所以在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几近于灭绝。这不能不使他无限感慨。

这些爱国的先驱者为中国的命运而发出的警告,难道是多余的吗?也许有人说,把几万万中国人“灭种”,是不可能的。这当然不大可能。但帝国主义像日本侵略时那样统治中国,中国绝大多数



人都成为从事苦役、任人宰割的奴隶，哪里还谈得到什么文明和进步！

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统一的大国，人民富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不断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中国才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在19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曾打算“瓜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近代中国没有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中国被瓜分为一块块由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会比我们实际上所经历的要艰难百倍，这是显而易见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不自觉地充当了造成革命的工具，就因为它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使许多落后民族在濒于灭亡的恐惧之下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在这些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少数人的天堂和多数人的地狱的强烈对比。因此，在殖民地世界中不能不产生各种形式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产生反抗帝国主义的新的社会力量。当然，能不能有效地进行反抗斗争，并且达到胜利，还要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

有些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学者，竭力申述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的作用。但他们无法否认，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源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也无法证明，中国不需要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争得独立自由，才能有进步与发展。在经历过旧社会的人看来，中国不能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不言自明的事。这的确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必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才能帮助许多不了解旧中国情况的年轻人认识清楚。

党的历史的发展是与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不



能孤立地讲党史,必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讲。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至于怎样进行革命,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来领导,是主要靠武装斗争还是靠合法斗争形式,是先从农村还是先从城市开始,这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党史如果脱离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就没有基础,就不能作科学的解释。

二、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

我们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史应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决定的,而不是自封的;也不能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天生的,好像党一产生就立刻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形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党之所以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能起到领导作用,首先是由于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各个时期又是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党的主张真正为群众所接受,逐步提高群众的水平,是经过艰苦努力的。比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党领导进行的,的确把全国广大的群众卷了进来。但也要看到,那时参加爱国运动的人有不同的水平,有些认识甚至相差很远。所以不能把党的领导形成说得那样简单,以为党一发出什么号召,立刻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全国人民都拥护。1927年我们失败得很惨,能说那时全国都拥护共产党吗?不是这样。国民党还很有欺骗性,全国还有很多地方革命影响没有波及到,许多群众对革命恐惧、淡漠,中产阶级更是疑虑重重。八一南昌起义,也不可能是全国很多人都了解,都赞成。

30年代,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使党与群众建立起最广泛、最深入的联系。最近,在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的时候,国外有人议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承认一二九



学生运动和那时的救亡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但又似乎有些夸大了自己的领导作用。我认为，那时的学生运动、救亡运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并不只是因为共产党发动才发生。共产党最坚决地主张团结抗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所以的确是党起了领导作用。而且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运动不可能那样地发展壮大，坚持进行，斗争水平逐步提高。但我们也从不为，参加学生运动、救亡运动的所有人都明确承认党的领导，所有主张都同党一样的水平。如果那样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不正确的。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狭隘的报复主义、排外主义、民族自卑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等，对共产党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因为党提出了符合各阶级人民的要求的主张，所以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但要真正形成领导，使斗争坚持到底，还必须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接受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那共产党还要做什么工作？整个抗日战争中，党不断做工作，克服群众中的许多思想障碍，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斗争水平，直到取得抗战胜利。

党的领导的确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说清这个问题对现实也有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为充分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也还要作许多努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时，党是靠做许多宣传工作、组织工作，一步步说服群众，还靠许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才逐渐在群众中树立起党的威望，实现党的领导。我们今天也还是要这样，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是密切相关的。党在民主革命中反对



“左”倾教条主义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党史中讲反对“左”倾，往往主要讲反对“城市中心论”。相对来说，比较少讲到统一战线。照毛泽东的说法，统一战线的中心就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者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又要武装斗争，又要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还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后来叫做“三大法宝”。这的确是贯穿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放松了武装斗争，没有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统一战线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结果失败了。土地革命时期，党注意搞武装斗争，但是忽略了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遵义会议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民族矛盾居于首位的形势，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最好地把二者结合了起来。这个经验非常重要。

我认为，学术界对统一战线研究得不够。比如，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但恐怕不能说是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文汇报》7月10日的一篇报道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三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共同进行的；第四种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



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这个报导中说,第四种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好像这样说就解决了领导权问题。

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上述第四种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领导权问题。

那么,到底怎样来说明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不妨概略地看一下事实。在开始时,要同打了10年仗的国民党合作抗日,要承认它是全国政权,要改编我们的军队,党内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是不容易接受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国民党的反民主的本质没有变,消灭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干脆分裂,各干各的呢?那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做,内战就会不断扩大,国民党内部即使发生某些分裂,但国民党所属的巨大力量会转向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这当然会使抗战的局面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必须克服任何“左”的情绪。开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纲领,不能有任何必要的独立的行动,以为那样就会妨碍团结。这是一种右的倾向,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思



想,是当时党内右倾思想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收集和 research 从抗战开始前到抗战初期的各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到党外有用这种思想来影响我们党的,党内也有表现这种偏向的言论。我们党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和 10 年内战期间的经验,从抗日的实际出发,克服了“左”和右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不是只团结,不斗争,也不是只斗争,不团结,而是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在团结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的方针。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必须有全民族的团结,也就必须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在同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共产党就没有立足之地,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抗日战争也不能进行下去。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 1935 年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那次代表大会克服了在这以前,即从 1928 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出现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也影响到中国)。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又滋生了右的倾向。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右的倾向与此有关。可以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就各国国内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最有成效、最成功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克服“左”的倾向的同时,坚决地克服右的倾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前面讲的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几种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大资产阶级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针来进行抗日战争。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自己的一套方针,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解放区,而且广泛地影响国



民党地区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地团结中间阶级,包括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一切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并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孤立打击顽固派。我们在抗战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固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把抗日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但是我们用适当方式进行必要的斗争,就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按照它的反动方针把抗日战争引导到绝路,促使它不能不抗战到底。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

1981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已过去6年多了。6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许多新经验,使我们对建国以来的一些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就是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给人以很多启示。我们在1956年刚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但没有认识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才刚刚起步。当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那时,毛泽东也常和别人说中国“一穷二白”,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困难;但因为中国的这种状况同时又往往有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会更容易些、更快一些这样的想法。产生这种想法,看来是和错误地估计国家政权的作用,错误地运用革命战争时期群众运动的经验有关系。以为靠国家政权的行政手段,靠大搞群众运动,就什么事都能干。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这种错误的危害性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1957年以后的许多“左”的错误,都使我们看到,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地研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最一般的公式出发,是极其有害的。1958年提出“全民大炼钢铁”,钢产量要一年翻一番,从前一年的535万吨变到“1070万吨钢”。这好像是注意发展生产力,但结果完全失败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无疑能起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只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办事,准备各种条件,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从社会原有的水平逐步地前进。以为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能一步登天,当然只是一种空想。再者,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受到现有生产力的限制。脱离实际,按抽象的标准或主观愿望,一味追求“先进”,那就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适得其反。大办人民公社,一切行业国有化,由国家经营,这些做法在当时认为很好。既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公得越大越好,越纯越好,但实际经验证明并不是这样。为什么生产关系“很好”,生产力还发展不起来呢?于是用这种抽象地追求“纯粹”的标准去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就提出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本意来说,好像是为了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但结果走向反面,反而搞乱了社会主义,给那些争权夺利的野心家造成了机会。这些经验教训当然值得研究,值得记取。

再来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中被称为右派分子的人,提出了最好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说法同历史决议完全不一样。历史决议讲,当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



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究竟历史决议说得对不对?这是值得收集当时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一下的。

据我回忆,像历史决议所说的真正右派分子的言论那时确是有的,但也确是极少数。那么,“严重地扩大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1957年我们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就认识清楚了。既然发动大家讨论,给党提意见,当然就议论纷纷,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党内知识分子,当时有“左”的,也有偏右一点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观察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党的缺点时表现出这种影响,也是不奇怪的。他们一般并不是敌视党,敌视社会主义,倒是关心国家前途,肯动脑子的人。认识上的偏差,本来应该通过讨论、通过实践来逐渐解决,而不应该一棍子打下去,当成敌我矛盾。何况有些当时被看作是偏差的,并不一定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开始建立时,不承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从纯而又纯的主观要求出发,把在当时水平下认识的偏差说成敌人,结果是狠狠地打击了肯想问题、敢提意见的人。这样的扩大化留下了很沉痛的教训。还有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性的主张,不过是对某个党支部书记不满意,对党内某些不良现象不满,提了些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当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这种扩大化中也可以吸取许多教训。总之,从吸取教训着眼,对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成就,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也是构成“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我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



历史,当然要谈到毛泽东的错误,要谈到两个反革命集团,但也必须说到党和人民中的健康力量的发展。既要谈到周恩来怎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干部,尽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并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要说到被诬为“二月逆流”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进行的斗争,说到邓小平 1975 年进行的整顿,等等。我们还要看到当时许多被“审查”、“监护”、“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后,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谓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



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1956年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



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面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多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掉,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



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就是在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1987年8月10日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1月25日出版。



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工作没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而且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史教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大专院校过去是讲中共党史,现在一般改为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考虑怎样帮助大专院校把中国革命史教好。中国革命史的范围要比党史广。注意整个革命史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简单讲三点:

第一,我们研究党史,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研究一下,多讲一点,确有帮助。党不是凭空成立起来的,是在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不是偶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讲一下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社会划分为阶级并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注意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



已有许多人注意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梁启超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他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同盟会的一些人在主张革命的言论中,也讨论到革命要由“中等社会”主持,要运用“下等社会”的力量,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作出一种阶级分析,但这种分析还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明确了。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中原来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的东西,虽然是实际的反映,却还说得不清楚,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外面来的东西,它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要求。

第二,讲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否则革命就无法解释。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说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到底情况怎样?经济、政治等情况到底怎样?民国初年是怎么个情况?当时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袁世凯的统治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共产党何以产生,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有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讲中国革命史多讲一点背景情况,是有好处的。

第三,讲中国革命,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也要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党在中国不是孤军奋斗的。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穷苦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一些上层分子的同情。就是在30年代初期党犯“左”倾错误,对中间派采取错误态度,不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有



许多党外分子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比如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共产党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再如蔡元培，虽然在 20 年代一度参加反共，但 30 年代有所转变，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合作。至于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邹韬奋等等，本来是不主张革命的，但通过实际，渐渐地接近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运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跟共产党做朋友。这些事实往往我们不去注意，不大重视。毛泽东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就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不能简单地说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人民群众，另一方是反动势力。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要知道，在那时靠拢和接近共产党，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有被杀害的，如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等。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的精英分子，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情共产党呢？就是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前途怎么样也并不是那么明朗的，他们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又为什么呢？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中国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党史工作者打开眼界，看得更广一点，是能更好地说明许多问题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它成为早已过去的历史。但我们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的经验,确实是很重要的财富,需要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并且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例如,党必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是,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地“大搞群众运动”,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搞大炼钢铁这类事情,是愚蠢的,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不行。

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



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性从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的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的世界靠个人力量不行,必须参加到集体中去才有力量。民主革命这方面的经验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只有在全国人民共同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所以,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要发扬个性的,但不能提倡个人主义。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人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中国又会成为一盘散沙,说不上什么现代化了。当然我们也要检查是否有强调集体主义以至于否定任何个性发扬的缺点。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很丰富、很有价值的。深



入地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很好地利用它,把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不再沿用那些过时的经验,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三 建国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40 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40 年来的中共党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40 年总的说来,最初的七八年是好的,1957 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虽然 1957 年以后的 10 年里,主要在 1961 年到 1965 年的调整时期,还是有很大成绩,但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大破坏。“文革”以后又经过两年的徘徊,近 10 年来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 40 年。怎么能全盘否定呢?至少恢复时期的 3 年,1953 年到 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 年到 1965 年的 5 年调整,1979 年到现在的 10 年改革,总算起来有 23 年是好的。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一刀切,好像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说有几段时间好,也不一定全好,如 1956 年到 1957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近 10 年来,我们说发展很快,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没有失误,也有波动,有起伏。说有几段时间不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前后 20 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 10 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40 年来我们不但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错误和曲折中间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 20 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总结近 10 年的新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虽



然我们作过些总结,但还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建设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肯定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1957年开始,但在当时以至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相反地认为,好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倒能进行得更快一点。这就完全脱离了实际。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公式化、教条化,就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

我们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这一点不但领导要认识清楚,而且群众也应认识清楚。固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这是从变化的深刻性上来说的。改革确实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知道,并不是一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天堂”,还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坏的东西,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需要改革。新世界是要逐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坏的现象,这些需要消除。但不能破字当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最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现在是“立”字当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



影响。比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怎么消除?要立字当头,逐步建立法制,用法治来消除人治,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横扫一切。靠打是打不倒的。我们需要改革、改进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

把过分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是破坏一个,建立一个。但为什么不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都破坏掉,全部废除,然后再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为那样做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一个时期是双轨制,逐步过渡到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简单说这些,无非是我赞成大家认真研究这40年的经验。但首先要肯定40年我们没有“虚度”,要让青年们看到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但现在中国的总的经济实力比全国刚解放时增长了几十倍,这种发展速度是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是旧中国根本无法相比的。我们研究这40年的历史,就是让人民、让全体青年珍惜这40年的成就,同时也要总结和吸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再不能破字当头,再不能自己搞乱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了。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变化了,过去破坏旧世界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决不能再用来建设新中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这40年,尤其是近10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我赞成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但科



学性与宣传教育并不矛盾。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我想,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1989年4月27日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9月25日出版。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的编写情况

我现在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编写党史为主要任务,1983、1984 年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要写一部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党史。可以说是难产。有了一个初稿后,这些年来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上卷,于 1991 年 7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只包含新民主主义部分,有 56 万字。按照这个篇幅,连同社会主义时期的下卷,将要有 120 万字以上,这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学习的材料。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党史研究室从去年开始着手写一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时期的简明的党史。由于 1991 年 7 月是党成立 70 周年,所以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1990 年 5 月开始,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按照提纲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各章的草稿,到今年 1 月已经有了全部的初稿。因为各章出自众手,在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建国以后的 42 年,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这时候,除了党史研究室



的同志以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同志,以后又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同志参加工作。逐章进行讨论,该修订的修订,该重写的重写。这本书本来应该在“七一”出版,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赶时间。实际上到7月底才有了全稿,以后又核对材料,8月底定稿出版,发行已是9月。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很关心这本书。这本书能写成是和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督促分不开的。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邓力群同志都看过部分稿子,提出了各种很好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胡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后,他又看了他原来未看的部分)。8月8日,杨尚昆同志主持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审议并批准这本书出版。胡乔木同志为这本书写了题记。

这本书现已出版,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需要读者、教学者、研究者和熟悉各个时期党史情况的老同志们对本书多加指正,提出种种要求和建议。编著者这时候实在不需要再说什么话了。这里就内容简单说一下。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以40多万字写出党的70年的历史,平均每年还不到1万字。从主观上说,是力求要做到条理清楚,文字精练,有历史感。它不是史论,所以要把历史的经过如实地、扼要地写出来,但又不是材料的堆积。它以我们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为总的依据,但又不只是重复其言语,而要在组织材料和论述上有新意。胡乔木同志说,这本书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来,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这话是对我们写作者的鼓励。我们也确实想做到这样,有些地方可能多少做到了,有些地方还不见得能真正做到。

这本书想写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是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取得的。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步,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全部过程,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选择,所以不论经过怎样的风风雨雨,它都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辟前进的道路。这些是这本书的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无人能否认的。其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党能够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能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问题。但是,党在这些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走过弯路。这些错误具体说起来,同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认识有关,同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下,党在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从这些错误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这些经验,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于犯过大的错误。这本书一方面要说明在曲折和犯错误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在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曲折和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当然,错误犯得或大或小有各种原因,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前无古人地探索自己的道路,错



误和曲折就是难免的。这些错误和曲折也显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很好地接受了这些经验和教训,因此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最近这十几年中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总体上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还有一些小的曲折,本书也如实把这些曲折的情况写出来。

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这本书论述得对不对,是特别要请大家来评论的。积累社会主义时期资料的书不少,可用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恐怕可以说还缺少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要的读本,当然还说不上是科学研究,只是尝试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以1956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为例。这本书里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分期,大体上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把1956年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为一个阶段。这10年如同历史决议所说,是开始全面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10年期间,党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文革”以后这十几年来,我们赖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那10年间建设起来的。对这些成绩当然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但是,这10年里发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出现了三年困难;还发生了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其他“左”的错误。很显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同这10年中的错误有联系的。究竟怎样看1956年到1966年这10年呢?这本书依据事实,说明了这10年中正确和错误交织,取得成绩中间又有许多曲折的经历,把这10年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发展的10年。得出结论说,在这10年探索中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



趋向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而另一个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种趋向虽然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但确实是存在着两种趋向。后一种趋向直接引导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而前一种即正确的趋向,也正是“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先导。从60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如同民主革命的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的考验,自己探索出来。不但对这10年,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本书也用这个主题贯穿起来。解放以后最初的7年,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延伸下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问题,接着就是上述曲折探索的10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了严重偏差,走入歧途的结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也取得了许多经验。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也需要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夸大,才能保护其中某些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总结了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结果。以往这些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对于今后也仍然是有益的。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些。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下,编写者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明的读本,已经是尽善尽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详略上可能有不当之处,知人论世也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不但如此,就是在文字上也还有不精确、不妥当的;事实材料虽然几经核对,也还可能有失误。我们准备按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在适当的时候再版,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90年代作为一本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当然也希望听到对《党史》上卷的各种批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家提的意见,对我们以后写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一定会有很大的益处。

1991年10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11月
25日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1991年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就以《历史决议》为根据,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成四段,各写了一章,即第六至第九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写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一章,即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写到1991年写书的当时。1987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过一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把1976年10月以后的这段历史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期”这段历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徘徊中前进”;第二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在看来,这样的写法可能有问题。什么叫“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如果一直写下去,那么党的基本路线还要坚持几十年,总不能把几十年的经过都写在一章里,不仅包括的时间过长,而且与“开创”一词也不



相符合。与以前的 27 年相比,这段历史固然可以叫“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但发展中总是不断地出现新情况,进入新阶段,不能用一个“新时期”贯穿到底。同时,把 1976 年以后的历史整个作为一个阶段,与以前三个历史阶段,即建国后最初 7 年、1957 年起的 10 年、“文化大革命”10 年并列也不相称。相比起来,前三者是较低一级的分期。

我曾和几位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个大时期。我认为这样的划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现在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意义,与 1935 年的遵义会议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意义是相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两大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就是从遵义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称之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因为在这以前,党的领导人是很不成熟的,党处在幼年时期。

如果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划分为两大时期,那么三中全会以前可以按《历史决议》分成几段,三中全会以后也可以分成几段,而不是简单化地把三中全会以后视为一个“新时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应该属于前一时期还是后一时期?我以为,既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那么两年徘徊应当放在前一时期。当然这两年不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我们在讲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应说明,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时期中,存在着反“文革”的倾向,存在着各种程度的对“文革”的反对和抵制,最后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下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得不太好、不彻底,因此发生了两年徘徊。我们把这两年写在前一个时期的最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只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16年了。我们笼统地把它作为一个时期也是不妥当的,还应该再划分一下。可能有几种划分的方法。我初步设想,可以把1979年到1984年作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农村进行改革。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改革全面展开。当然,在1985年以前已在工业、城市等方面初步做了一些改革的基础工作,但改革真正全面展开是在1985年以后。从1985年到1991年是一个时期。1992年起又是一个时期。这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时发表重要讲话。这种划分法是否妥当,当然还可以考虑、研究。

二 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问题

以上说的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对这段历史,《历史决议》里有两个提法。在讲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说:这一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讲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了前面引用过的话,其中说到: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说:“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就是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粉碎“四人帮”是很重要的事件,它使“文革”的结束成为可能。如果“文革”不结束,还继续延长,那么中国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现在看来,当结束“文革”以后,整个工作怎么做法,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文革”以前。这样做也不能说不是搞社会主义。回到“文革”以前,还是搞社会主义,但是结果会怎样就很可虑了。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真正结束“文革”。在“文革”以前,我们固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发展速度缓慢,而且酝酿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其结果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错误。“文革”结束时由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恰好是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凝固化。如果这样走下去,只会造成比“文革”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文革”结束后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显然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另一种可能是,总结历史经验,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一条新的道路。实现这个转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际上也是阻止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从



此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隔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这就像遵义会议一样。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只认识到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改变了红军在军事上处于被动、危机的局面,并在事实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全新的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和军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在向前发展,也许现在还不能完全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恐怕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

16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的政治风波和1990年前后国际上的大变动的考验。有了苏联解体,东欧改变旗帜的教训,再看我们中国,尽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现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基础。世界上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像苏联共产党那样崩溃?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像东欧那样垮台?这些悲剧没有在中国重演是什么原因?这是应该提出的问题。反过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走改革开放这条路,而是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按照过去的老路子走下去的话,后果会怎样?如果那样,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推论:中国将会继续“文革”那种混乱状况,我们恐怕很难渡过1989



年到 1991 年这个时期国内和国际发生的风波。邓小平同志在谈到 1989 年的国内风波时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要乱,乱就要打内战。按照这个逻辑考虑,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我们就顶不住国内国际的风波,闯不过这些关。

这样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亡党亡国这个问题,首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他常说要警惕和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毛主席最早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许考虑过苏联的情况,但他主要讲的是我们自己要注意。他也采取了避免亡党亡国危险的措施,但走到“文革”这条路上去了,走错了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国家繁荣兴旺,如果不能让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怎能顶住 1989 年到 1991 年各种风波的冲击?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我们一定能经过努力解决一个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三 关于研究建国以来党史的目的问题

我们研究历史,常常说要弄清事实真相,但这不是我们研究历



史的最后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弄清事实真相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不能用虚假的事实作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求真、不护短的,在事实面前无所畏惧。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不是不分轻重大小,一定要把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弄清楚。我们党已经有 70 多年的历史,如果要把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搞清楚,从党中央到地方甚至每个县委的事情全部搞清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可以说,一些琐碎的小事不值得弄清楚,因为它对认识大局无妨,还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此,有些没有实质意义、与大局无关的事情不一定都要弄清楚,更不应当因此引发无谓的争论。当然,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要以扎扎实实的事实为依据。如果一个事实与某个历史结论有关,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说,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为什么可以粗一点?粗一点是指我们要着重了解总的形势,并不是可以马虎一点的意思。宜粗不宜细,是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都适用的方法。

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还是为了现实,为了当前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的路线方针是从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其正确性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研究社会主义的历史,首先就是为了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所谓正确,当然不是说已经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规律的所有细节。但是,总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确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要说明这个问题,就要用正反两方面的各种历史材料来作出科学的论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29 年(包括 1976 年以后的两年徘徊)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路线、方针、政策确是很好地接受了以往的好的经验,也充分地接受了以往的教训;确是符合于中国具体情况,能够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发挥社



会主义优越性。对建国后最初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应当充分肯定,但也应该仔细研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于匆忙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对“文革”前10年,应该肯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但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左”的错误在积累,以及当时想要克服“左”的错误而又没能克服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面前,“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没有什么可肯定的;但“文革”的经验教训很重要,因为它从反面警告我们不应该这样做,也告诉我们“文革”以前的10年决不是尽善尽美的典型。50年代、60年代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那时确实有些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接受下来;但是也要看到,现在人们怀念的某些东西是与发展缓慢、封闭相联系着的,所以不能一般地加以肯定。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当然还要以近16年来的成就为依据,要充分研究16年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

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除了要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以外,还应加上一条,就是通过研究来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反对“左”倾的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的斗争中,曾经提出过革命的长期性问题。当时“左”的倾向认为,党能一下子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欲速则不达。在“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红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甚至几乎葬送了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但在遵义会议以后14年就夺取了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驳、否定了认为革命很快就能胜利的观点,认清了革命的长期性,结果反而达到了出乎预料的进展速度。

但是,也因为民主革命胜利快得出乎意料,多少留下一定的消极影响,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很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急躁的想法。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还要经过几十年



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邓小平同志说,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这实际上就是讲的长期性问题。现在外国有些人提出,再过几年,到了21世纪初,中国就会变成世界上经济实力第二强国,或第一强国。这些话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不要轻信和自满,而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建设。要认识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谓长期性的含义,第一,是时间长。同民主革命相比,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要更难一些,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第二,长期性还指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直线发展,而是在迂回曲折中前进。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有这层含义,就是说,不像当时持“左”倾观点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革命能勇往直前地发展,走一条笔直的捷径,用几个月或一年时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采取了迂回前进的正确办法。在10年内战后与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两党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取得抗战胜利后,又进行打倒蒋介石的解放战争,才夺取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是一个大的曲折,但却是客观情况决定的。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往往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什么曲折了,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底子薄、人口多的国家里,许多事情不能采取简单的直接痛快的办法。第三,长期性还意味着在前进中可能有许多艰险。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总的说来基本的路线方针是搞对了,按照这样的路线方针搞下去就有胜利的把握,但在具体实践中还可能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一方面在客观上有种种艰险,另一方面在主观上也可能有失误。当然我们应尽量避免大的失误。

过去的16年,总的来说我们是顺利地前进的,但确实也遇到



过许多困难。今后我们还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就可能偷懒或取巧,要么一切照老公式办,要么提出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应该认识到,我们虽然找到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但很多问题的解决还要靠按照实际情况寻求新的办法。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可能在遇到挫折和艰难时惊慌失措,丧失信心。

所以,通过党的历史的教育,要使全体党员认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这条路线,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总的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正确的路线,有了胜利的把握,但还要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许多困难,解决各种问题。所以我们要健全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人民中更好地起领导作用。研究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就应该达到这样的目的,发挥这样的作用。

四 关于研究建国前党史的目的问题

我们现在应着重研究建国以来的党史,但不是说建国以前的党史就不需要研究了。建国前党史的研究还要进行,这对党、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明年(1995年)1月遵义会议60周年是值得纪念的。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进行研究和宣传。研究建国前的党史起什么作用?对此我想简单地说两点。

第一,通过研究建国前的党史,要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破除迷信。民主革命时期,党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在相当程度上受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过去毛主席曾经讲过,不要过多地讲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接受了这种影响,主要责任在我们。现在一方面在讲到政治责任的时候,还是要遵守毛主席的这个



教导,的确党在幼年时期水平低、经验少,所以容易接受教条主义;但另一方面,在进行历史的科学研究中,应当如实地论述共产国际和苏联给我们的坏影响。有些同志已经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有的同志研究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什么不同。确实应该研究这样的问题,进一步通过历史说明教条主义的危害。

第二,要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典范。不拘泥于老框框,实事求是,敢于创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过去,我们在讲毛泽东思想时曾经出现过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说成是毛泽东创造的,这不实在,不好;另一种倾向实际上是否认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说毛泽东的东西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如陈伯达就写过这种文章。我们现在说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时,要恰当,不要夸张,也不要自卑。要确实讲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下,如果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没有用处。马克思主义是锐利的武器,但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创造了些什么?胡乔木同志在1991年纪念党的70周年时写过一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看起来,这篇文章讲得是比较恰当的。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归纳了12条,其中几条属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还有几条属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也和毛泽东的贡献有直接关系。比如第一,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第二,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第三,统一战线;第四,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五,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区分;第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全面创造;第七,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新经验;



第八,在国际关系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有一条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穿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在这些方面都有毛泽东的特殊贡献。比如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了区分,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说农民战争、土地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了。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这些不是简单地推演马克思主义原理就能解决的,也不能用毛泽东说过的话来解决。但我们的理论界仍然存在着用现成的公式来套新问题的习气,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要提出新的见解不是容易的事,可能会发生失误。因此,我们应该对各种问题,特别是新问题的研究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认真的探索。通过党的历史的研究,我们要提倡勇于创新的精神,培养根据事实进行分析,提出新见解的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它的全貌已经呈现出来,从头到尾,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已经清清楚楚。因此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中的各个问题,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深入研究,作出优秀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能够起很重要的思想教育作用的。围绕纪念遵义会议 60 周年的活动,我们党史界有责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1994 年 11 月 21 日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原载《求是》1995 年第 4 期,2 月 16 日出版。



第 四 辑

先 贤 和 故 友

(1985—1995)



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今年是林则徐诞生 200 周年。我们纪念他，因为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开始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首先带头起来反抗斗争的民族英雄。

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当然比封建主义进步。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是要掠夺和奴役中国，使中国成为殖民地、附属国。19 世纪初期，侵略者用可以取得暴利的鸦片烟这种毒品作为冲开中国大门的武器，并且用炮舰政策来支持非法的鸦片贸易，充分证明了这种侵入者的反动性。严重的民族危机压到了中国的头上。

19 世纪 30 年代，在清朝统治层中，是否要彻底禁烟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许多有势力的官员直接或间接从贩运鸦片中得到私利，他们不赞成禁烟。那时，敢于主张彻底禁烟是要有勇气的。林则徐是坚持这种主张的人中的一个。他认为，外国商人运输鸦片进口，换取白银出口，简直就是“谋财害命”；受害的吸毒者愈来愈多，而且中国社会经济将因此遭到摧毁，这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大家知道，林则徐为主张禁烟而给道光皇帝的奏章中有一句名言：“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到广州办理禁烟。他下令在广州



的外国商人交出他们的全部鸦片烟,并且要求他们保证以后再不夹带鸦片来中国。走私贩运鸦片的,主要是英国商人,英国并派有商务官员在广州。他们以为林则徐和其他口称禁烟的清朝官员一样,是虎头蛇尾的,是可以贿赂的。当他们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時候,只好把2万多箱鸦片烟交了出来。林则徐在虎门亲自安排,当着中外人士,销毁了全部收缴的鸦片烟。这又是出乎外国商人意外的事。他们本来以为,这样大量的财富不会不落入钦差大臣和各级有关官员的私囊。

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报复林则徐没收鸦片为借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出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在广东尽力做了必要的战备,抗击武装侵略者,并且向朝廷建议在沿海各地严密设防,积极抵抗。他特别着重发动民众用各种方法打击侵略者。腐朽的封建朝廷和多数官僚,不可能实行他的主张。在战争中虽然有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陈化成、裕谦等官员和将领率领士卒坚持抵抗,有的以身殉职;虽然有广州三元里和其他地方的民众自发抗击敌人,但是这次鸦片战争终于以订立第一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禁烟有功和主张实行抵抗的林则徐被罢官并受到处罚。

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以前,同其他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毫无所知。他到广东后觉得有必要了解外国。为此他招聘了一批懂外文的归国华侨和原任通事、引水等职务的人,翻译他所征集到的外文书刊。他也向可能接触到的外国人了解情况。他让人翻译了18世纪瑞士法学家瓦特爾著《国际公法》中的部分内容,因为他在同外国人打交道中需要这种知识。他还组织翻译了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的全文,据以编成《四洲志》一书。后来,受林则徐的委托,魏源根据《四洲志》和其他



材料，又加以补充，编成《海国图志》这一部曾广泛流行的书。通过这部书，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第一次知道世界各国的情况。虽然林则徐当时对世界的了解很有限，也不免还有误解，但是在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他首创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新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是从林则徐那里来的。

林则徐在向外国侵略者作斗争中，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但他并不采取顽固的排外态度。他主张在禁止非法的鸦片贸易的同时，应当保持正常的进出口贸易。他也注意区别武装侵略的国家同和平贸易的国家，认为不应一律看待。在抵抗英国侵略军时，他充分了解到对方有船坚炮利的优势，因而主张“以守为战”，并且力求仿造和购置西式的大炮、舰只。他在广州就是这样做了的。当时官僚层中的大多数人不顾世界大势，以“天朝”自居，盲目自大，而在一看到侵略者具有意想不到的武器时，就惊慌失措，进而屈膝投降。道光皇帝在禁烟和战争期间就是集中表现了这种态度。林则徐的看法和做法，显然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人的水平。

林则徐在奉命到广东去时，已经感到，由于禁烟触犯了许多当权者的利益，因而不论办好办坏，都可能受到责难。他甘愿冒风险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果然，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他被认为是“误国”的祸首。在他已被罢官时，他仍以所谓“待罪之身”留在广州，尽可能设法阻止继任的官员琦善等人的投降活动，企图挽回局势。他还自请到浙江前线效力。当他在浙江尽力参与备战活动时，朝廷下达把他流放到伊犁的命令。林则徐是封建统治层的一员，他自以为效忠于封建王朝，但他所做的是为民族和国家长远利益的事情。他明知道，这样做会遭到从自己阵营内部来的暗算和打击，但他义无反顾地去做。林则徐的这种精神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仁人



志士的精神。这样的人是民族的脊梁。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到重重灾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断地展开新的斗争的时代。林则徐和他的少数志同道合的同志在鸦片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是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民族进步的斗争,虽然他们并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他们在当时是失败了,但是后来的几代人继续进行和发展了由他们开始的斗争。

近代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中国历史上有爱国主义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在近代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了高度的发扬。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爱国者,激发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中国一定要从一切屈辱中摆脱出来,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这是近代中国一切有志之士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虽然中国曾经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虽然中国内部的腐朽反动势力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卖身投靠,卖国求荣,但是中国没有亡国,在一个长时期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而且最后终于摆脱了自己身上的一切枷锁,由中国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代代中国人爱国主义斗争的结果。

在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斗争是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相联系着的。林则徐的失败已经表明,不同国内腐朽倒退的势力斗争,就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势力。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初步表达了不能走封建主义老路的思想。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可以从反鸦片的战争算起,求进步的斗争也可以从反鸦片的战争算起。在沉沉黑暗的中国,出现和发展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政治力量、新的思想。一切国内外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中国不断前进



的步伐。

近代中国人民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高理想的革命,没有能完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留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前一时期的斗争启发了后一时期的斗争。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取得了一百多年间丧失殆尽的国家主权,并且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进步打开了宽广的大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胜利,也是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以来一百年间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一切斗争的胜利。

我们现在正在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斗争。我们将用几十年时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国家。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全世界一切国家平等相处。中国人民要向一切其他民族学习他们的长处,并且将能够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在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无穷灾难的黑暗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在那黑暗的时代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而斗争的一切先驱者永远值得我们追念。他们的斗争精神仍然可以成为策励我们前进的力量。林则徐就是这些伟大先驱者中的最早的一个。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在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些先驱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追求进步的精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精神,团结一致,为开辟我们国家的伟大前途而奋斗。

1985年8月30日在全国政协召开的林则徐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于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创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这年他 28 岁。他为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宗旨。他认为,为了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必须首先用革命的方法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使中国成为一个同西方国家一样的民主国家。

1905 年,孙中山领导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经过 6 年的斗争,在 1911 年爆发了由武昌起义发端的全国大革命——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伟大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没有到此止步,他继续向篡窃中华民国政权的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斗争。在许多大小军阀统治下,中国继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全国四分五裂,连年内战,广大人民陷于毫无权利,以至丧失谋生手段的境地。为改变这种状况,孙中山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息。斗争的实践使他逐渐看清楚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大障碍,就是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封建势力;为了战胜这些强大的敌人,必须寻找可以依靠的新的社会力量。孙中山晚年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启发,看到五四运动后兴起的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力量,看到初生的中国



共产党的力量。孙中山重新解释他早已提倡的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赋予它以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并且坚定地实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孙中山过早地在 1925 年病逝。他没有看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他晚年改组他所建立的中国国民党,使这个党有了新的生气。他所实行的国共两党合作的政策促成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

孙中山生活和斗争在落后的黑暗的中国,但他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一再申言:“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我们将能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建立“头等大共和国”,然后“采用欧洲的生产方法使用机器”,发展生产,根本改变“国贫民瘠”的状况。

辛亥革命胜利后一个短时期内,孙中山以为,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告成(因为当时他把推翻满族人做皇帝的统治,看作民族主义的实现;又认为既已成立中华民国,就是民权主义的实现)。尚未着手而亟待努力的只是“民生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发展实业”,发展农工商矿各业。他提出了 10 年内建设 20 万里铁路的设想,认为这是发展实业的根本。他真诚地表示,他要“脱离政界”,专一从事社会事业,也就是从事铁路建设。为什么他把发展实业说成是民生主义呢?因为他以为,随着实业的发展,虽然会产生许多资本家,但是应该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资本家垄断、贫富悬殊的局面,使发展实业的福利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他认为,实现了他的理想,中国将不但能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而且还能超过它们。

局势很快向孙中山表明,他不可能“脱离政界”。铁路计划在那时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他必须重新举起革命的旗帜。虽然如此,他关于在革命胜利后一定要用现代方式发展社会生产的思想,无



疑是正确的。他在 1919 年前后,撰写《实业建设(物质建设)》这一著作,作为他的《建国方略》的一部分。其中提出了在当时无法实现的宏大的建设计划。孙中山一生的实践证明,只有在革命胜利,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统一的条件下,物质建设才有可能大规模地进行。而孙中山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中国终将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而屹立于世界,总是满怀希望,并且认定这种希望一定能成为现实。这种坚定的信念是十分感人的。

孙中山主张,中国在建设中要实行“开放主义”,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但实行开放主义必须保持主权。因此,他在民国初年,反对帝国主义借以蹂躏中国主权的银行团。很显然,他所主张的开放主义也只有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后才能实行。

孙中山和他的若干同志在 1906 年就把他们所主张的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他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对社会主义运动表示同情。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谈到民生主义和发展实业时,几乎无一次不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1920 年他关于民生主义的演讲中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并不明确的。他多次说,中国因为产业落后,所以可以及早实行社会主义,而且特别易于实行。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这样一种社会历史实际的反映,这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不可能完全照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孙中山谋求国家的富强,又十分关心人民的普遍幸福,这是很可敬的。孙中山晚年热烈地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坚定地实行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显然同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是一致的。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 120 周年。从孙中山先生逝世至今也



已经 61 年了。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国人民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合作和两次分裂,现在正面临着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实行第三次合作的形势。

中国人民从来把孙中山先生看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原载《中国画报》1986 年第 11 期。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

今天(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在昨天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这样隆重地纪念李大钊同志,在他牺牲后6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李大钊同志生前曾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开展革命活动。到会的有全国各地理论界、教育界、史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并邀请苏联、蒙古、日本及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学者参加。以这样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李大钊,也是第一次。

李大钊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寻求国家出路的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李大钊也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之一。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实际逐渐使他怀疑和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想中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认定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是资本主义,而只能



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运动。

70年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志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过是李大钊和他的几个学生和同志。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相信这个事业必能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他们也充分了解,在前进的道路上要通过无数的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李大钊在1927年英勇不屈地走上绞刑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与的伟大运动。在李大钊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而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是这个革命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战胜它。经过挫折和失败,它受到锻炼,更健康地发展起来。

在李大钊逝世22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李大钊逝世60多年后,也就是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考验,牢牢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现在我们纪念李大钊,就好像是在一棵参天的大树前面怀念栽树人一样。我们不能不想到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还要继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下前进。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为什么在 70 年前李大钊和其他先驱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主要介绍唯物史观的理论,尤其着重阶级斗争的学说。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是如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曾经说,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是不适合的。他们企图证明,好像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本来不会有、不应该有,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才发生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站不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由一种学说“制造”出来。

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那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到了 19 世纪后半期,中国封建社会既遇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在内部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阶级。中国社会关系复杂化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各派政治家在为解答中国革命问题而发表不同议论时,往往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

可以首先举梁启超为例。他在 1904 年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上等社会之革命”和“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梁启超是反对孙中山一派所创导的革命运动的。他以为,中国今日要革命,就难免会把他所说的“下等社会”的力量鼓动起来,这其实就是说,会把农民大众鼓动起来。他认为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事。这里不来评论梁启超的主张,但应该说,他是在试图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当时的革命作出一种阶级的分析。

当时,主张革命的一派人也使用“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概念。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等社会”上。他们



认为革命应该由“中等社会”主持和领导，也要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例如杨笃生在1903年所著《新湖南》中说，“中等社会”的责任是破坏“上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1905年自杀的陈天华在遗书中说，一定要先使“中等社会”都知道革命主义，渐普及于“下等社会”。他们中还有人说，“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而“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中坚。同盟会的朱执信是在那时已经多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在中国应同时并进的论文中说：“革命者，阶级战争也”。我举出的这些材料可以表明，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已经反映在这些革命者的头脑里，他们感到为推进革命需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所说的“中等社会”，大体上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是指江湖会党、劳动人民和士兵。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等社会”主持和领导的。革命的结果却并没有实现革命派的预计，“中等社会”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使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也不能不使人们，特别是先进的爱国的人们进一步思考这问题。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开始传入中国时，虽然是完全新的学说，但它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实际生活中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没有能给以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并且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即使在中国为一些人所接受，也不可能广泛传播，并在千百万群众的斗争中起作用。

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李大钊和他当时的一些同志，最早认



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他们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是初兴的、力量还不大的阶级,然而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走到工人中去。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立的。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人中的一个。和那些只看到农民的自发性的弱点的人不同,他主张积极地组织和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巨大力量。

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时曾经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中国的现实任务。但不久,包括李大钊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了,在中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首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此,就要以工人阶级为首,发动农民大众,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并尽可能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生前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后活动的时间还不到10年,他的理论与实践不免带有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在不到10年的短时期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他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中国的前途已由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李大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他既身体力行地如他自己所说,“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又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尽了开创者的使命。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工作。这个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在进行这工作时,当然我们要十分重视当前的实践,但我们同时也重视前人积累的经验。我们不但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中国最初



栽下共产主义树苗的先驱者，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业绩中学到许多东西。

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李大钊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为人，堪称共产主义者的模范。他的著作，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教育等方面。这是值得珍惜的思想宝库。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下，冒着危险发表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李大钊的亲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收集到他的一部分著作文稿，于 1933 年编成《守常全集》。鲁迅先生写的序文中说，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本文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那时周建人等同志也默默地进行李大钊遗著的收集工作，费了 10 多年的时间，汇集遗文近 300 篇。40 年代，在延安，一些同志研究和宣传李大钊的思想和革命业绩，激励党员和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1966 年起的 10 年动乱中，研究工作受到干扰而停顿。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大钊的研究又在学术界内认真地开展起来。《李大钊文集》和他的传记、年谱等书相继出版。

这次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收到论文近 200 篇，选送会议的论文 67 篇，内容比较广泛，不少论文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和新的见解。会议期间，大家还会就各种问题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意见。我们相信，通过这种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是有益的。

1989 年 10 月 29 日在李大钊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 60 周年。10 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举行过 50 周年的纪念，对瞿秋白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扫除了“文化大革命”横加于他的一切诬陷的灰尘，恢复和发扬了瞿秋白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光辉。10 年来，对瞿秋白著作译作的整理出版工作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随着这些工作的进展，对瞿秋白的了解和认识在学术文化界和青年界中有所增加，但仍有待普及。在他英勇就义 60 周年的时候，我们再度举行这次纪念活动，介绍和宣传瞿秋白革命的一生，号召党员和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向这位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学习，以继承他的优秀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他的崇高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瞿秋白的一生，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半期的历史紧密联系着的。五四运动时期，瞿秋白是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活跃人物，随后又为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而投入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中。不久他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奔赴苏俄，在那里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和学习。他勤奋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广泛接触处于社会大变动中的苏俄各阶层人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政治活动。这时他在思想上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于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作的大量新闻通讯，向国内读者最早系统



地介绍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的动人信息。他的这些经历和才能,很快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23年回国后,他担任《新青年》、《前锋》等党的机关刊物主编,在译介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与此同时,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间进行联系的重要人物,通过繁重的联络工作为帮助这两方面制定和推行革命的大政方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负责起草党纲。在中共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进入中央领导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准备建立联合国民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动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为促成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处理两党关系中的问题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国共合作的实现,导致大革命高潮的兴起。瞿秋白通过参加实际工作的领导,为五卅运动、各个地方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北伐大进军的发展指引方向,排除障碍。同时通过他所主管和指导的革命报刊,为革命进行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他还撰写大量论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文章,探索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面对敌人和同盟者从外部、内部对革命进行的种种破坏,他尽力团结骨干和群众,维护革命利益,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倾向,给破坏活动以坚决反击。他曾多次同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又较早地向中央提出警惕和防范蒋介石将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建议。1927年春,他看到党内右倾错误发展的危险,同这种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建立血腥统治的时候,瞿秋白临危受命,于1927年8月7日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使趋于散



乱的革命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团聚起来，继续战斗，使遭受惨重失败的革命事业得到挽救。这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发展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瞿秋白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总负责人，当时年仅 28 岁。在这前后，他参与决定和指导了一些地区的武装起义。在他领导下，党在一个短时期内，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仅存的革命力量又受到损失。但不久他就承认和改正了自己的错误。1928 年 6 月，他代表第五届中央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总结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并再次对自己的“左”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两年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党的工作。他用很大的精力投入理论研究，继续写作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文章。1930 年 7 月，他与周恩来同志奉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不久后他被共产国际无端地指责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的诬陷和打击，在 1931 年 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 3 年他在上海白色恐怖下与鲁迅共同指导左翼文化运动，使革命文化事业能够冲破敌人的“围剿”出现繁荣。这时他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但把持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等人继续对他排挤和打击。1934 年 2 月他到达瑞金中央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仍被排除在党中央领导之外。同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他被迫留在已被敌人控制的苏区，于 1935 年 2 月被俘，6 月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

瞿秋白从开始投身革命到最后壮烈牺牲，只有 10 多年时间，



而他在实际革命斗争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等方面，竟为党和人民作出那么巨大而又多方面的贡献，这是十分令人赞叹和敬佩的。其中对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所作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果，尤其值得称道。他早年就树立了“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革命志向，并且估计到在前进中必然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以至挫折失败。但他坚定地认为经过多次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他确信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同时郑重地提出“革命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分离”，并始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新的创造。在他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中，最早接触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旧式资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最早提出和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对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内最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十分关注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最早写文章作专门论述。就在他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他于1927年12月著文总结武装暴动的经验，提出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几县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在党的“六大”上再度申述这个正确观点，却受到张国焘等人的嘲笑和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理论上重视新鲜实践经验的敏锐性。他固然还没有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他的确做出了一些独特的贡献。当然，对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很缺乏的年轻探索者来说，要冲破当时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严格限制，要摆脱旧的传统和习惯势力的束缚，在短时期内就获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的完整的理



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瞿秋白的著作中的确不免带有早期探索者的不足和失误,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著作毫无价值不值得一顾,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作为一个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寻找革命道路中所表现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在辛勤探索中的成败得失和在 500 余万字著作中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也就是以北伐战争为高峰的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遵义会议为界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半期。历史不能割断,革命的经验是积累的过程。正是成功地运用了这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所积累的革命的成果、经验和影响,才有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大胜利。对于在过去革命斗争中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先驱者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对于他们在开创革命道路中所作的艰辛的探索,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我们都很重视,都要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利于正确的革命理论、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回顾建国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过类似于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在这以前的 20 多年期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取得重大的成就,又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在这以后到现在的 17 年期间,我们党成功地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从而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胜利。



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伟大创举，它将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提供根本的保证。我们应该充分地估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在坚定地维护这些成就的同时，继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更加兴旺发达！这也是今天我们对瞿秋白烈士的最好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瞿秋白烈士永垂不朽！

让我们继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的遗志，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继续奋勇前进！

199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同志就义六十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学者。他生活在中华民族历尽苦难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为寻求中国的出路而进行艰难的探索，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蔡元培先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并具有自己的独特光彩。

蔡元培先生生于1868年，即清朝同治七年。他在24岁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翰林院。这是甲午中日战争前2年。这次战争的结果使他感到清朝政府没有希望，弃官回乡从事教育事业。这以后他渐渐转向反清革命。1902年他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这些机构都在青年中宣传救国和革命的主张，成为国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的核心。1904年他又发起成立光复会，这是一个联络浙江各地会党进行革命的组织。次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组织同盟会，光复会是其基础力量之一。蔡元培先生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他为民主革命做了许多宣传和组织工作，曾被清廷指名缉拿。他一旦搞清楚了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推翻清朝统治就不可能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进步，就毅然抛弃功名利禄，投身于革命。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在由辛亥革命而产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蔡元培先生任



教育总长。他对于教育实行的民主主义的改革,虽然由于临时政府短命而没有完全实现,但仍起了重要的影响。在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蔡元培先生不愿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教育总长职务。以后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的五四运动,是同蔡元培的名字分不开的,也是同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分不开的。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晚年已经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名称虽已改变,但校内的风气仍然很腐败。蔡元培先生对这个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革。他在学生中提倡认真求学的精神,引导学生创办各种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团体。他聘用了一批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来当教员。在他主持下,北京大学不仅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学风大变,呈现出生动活泼的空气。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学校中居于主导地位。蔡元培先生的言论和他在北京大学创导的风气,对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他受到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攻击和压制。

这里应当说一下蔡元培先生这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原则。在他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请入北大校园的同时,仍聘用一些虽然在政治和文化上持保守态度但确有学问的学者当教员。这样做,既使新文化运动取得合法讲坛,又是尊重知识,尊重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成就。当时,有些学生对蔡校长容纳主张“尊王尊孔”、“君主立宪”的教员表示不理解。蔡元培先生解释说,他希望同学们学习这些教员的学问,而不是要大家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无原则地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从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他的主张,这是同依靠反动政治势力来压制新思想、新文化的做法根本对立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得到蔡元培先生的坚决支持。他积极营救在斗争中被逮捕的学生。他虽然因此而一度被迫辞职离校,但在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仍然本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支持各种新的思潮。1920和1921年,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都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同意和支持。蔡元培先生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表示向往。他响亮地提出过“劳工神圣”的口号。他在1920年支持北大的学生和工友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基地之一,是和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态度有关的。1922年他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主张,他也对俄国的十月革命表示赞赏。这显然都是因为他一贯关心中国的独立自由问题的缘故。他的这些表现为反动的北洋政府所不容,他终于在1923年被迫离开北京大学。

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后期间,确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为中国新式的大学教育树立了楷模。他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到一个新的时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1925年的革命高潮兴起时,蔡元培先生在国外,对于国内反帝斗争,他积极支持。1926年他回国参加国共合作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当时国内的复杂局势,对于一个几年离国的人,不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当1927年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发动所谓“清党”的时候,蔡元培先生附和“清党”的主张。但是在葬送了国共合作进行的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使蔡元培先生迅速感到失望。他从1928年起向国民党政府辞去一切职务。由于他是国民党元老,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人们给了他许多显赫的头衔,但是



他除了担任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工作外，始终拒绝任何党政要职。

蔡元培先生一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不能同意国民党当局的对外政策。他又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反对国民党当局残杀异己，实行特务统治。他为营救被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做了很多的努力，这些努力多半都无效。特别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看到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实行不抵抗主义，一方面加紧镇压主张抗日救国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情形，蔡元培先生更加明确地站到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他和国民党左派的伟大战士宋庆龄站到了一起，和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站到了一起。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诸先生发起成立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先生也应邀参加。蔡元培先生参与主持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并且坚决驳斥国民党当局把同盟视为“非法”的论调。杨杏佛先生在1933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是对宋、蔡二先生和其他参加同盟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警告。法西斯毒手虽然迫使同盟只得停止活动，但蔡元培先生没有改变他的立场。他继续在上海支持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运动。最明显的事例是，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时，蔡元培先生不顾个人的安危，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葬仪，发表演说。

蔡元培先生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赴国难是积极支持的。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寄寓香港期间，赞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并欣然受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主席。1940年3月，蔡先生因病逝世。

我们从晚年的蔡元培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的伟大形象。1927年的暂时曲折并没有玷污他的形象，倒是证明，以蔡元培先生的处境，要笃守自己从来的信念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不是突破丛生的荆棘，如果不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是万难做到的。而蔡元培是做到了的。蔡元培先生晚年结识和爱护为数不少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他走的道路是和中国共产党人相通的。许多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文艺家，在为民族命运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国共产党是引以为荣的。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在 1928 年成立的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在经费异常支绌和其他困难条件下，建立和扶植这个研究院，直到逝世。在他主持下，中央研究院先后成立 11 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还培养了许多科学家、研究者。中央研究院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蔡元培先生毕生重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常常发表教育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但他不因此脱离现实政治斗争。他从事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是同惨淡经营中央研究院同时的。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位总干事就是惨遭枪杀的杨杏佛先生，也是蔡元培先生的亲密合作者。蔡元培先生说，提倡科学是为“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张科学为抗战国防服务。

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中的许多学者，在 1949 年后，成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的领导人和骨干。蔡元培先生把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看成振兴中华的重要事业，这在现在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蔡先生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已迁往台湾。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前几任院长和现任院长吴大猷先生主持下，也在科学研究的各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认为，海峡两岸的科学研究机构都应当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大陆的科学家期待着和台湾的科学家加强联系交流，用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以利于中国



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是在纪念蔡元培先生时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意思。

1988年5月4日在纪念蔡元培诞辰120周年
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纪念许地山先生

我没有和许地山先生相识的机缘，但我历来是敬仰许地山先生的。

1941年许先生逝世的时候，我也在香港。当时我写了一篇短短的悼文，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上^①。

在这篇悼文中我写道：

“听到许地山先生的噩耗，重读他的最后的遗著，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论文《国粹与国学》，不能不万分地感慨。

“许先生是对于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见解的当代学者之一。从这一篇论文中固不足以窥见他的全部思想学识，但是我们不难从这论文中读出他对于文化上的复古倾向的憎恶，读出他对于民族的新时代的新文化的向往。战斗与进步的光芒闪烁在这篇他在逝世前一个月所写的文章中间。”

悼文引用了许先生的那篇论文中的一些话，结尾说：

“我们同情许先生的见解与主张，我们愈深感到在这需要更多的有理性的学者来共同击溃旧文化的魔影，建设民族的新文化的时候，失掉了许先生的悲痛！”

5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正

^① 见《胡绳全书》第一卷，第847—848页。



在和全国人民一道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奋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在一步步呈现着新的面貌。

在许地山先生逝世 50 周年之际,谨录旧文以表示我对这位毕生抱着爱国的民主的精神,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先驱者的敬仰。

1991 年 5 月 17 日

原载南京市台港澳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会编的《许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专辑》,1992 年 6 月 1 日出版。



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四十周年

40年前逝世的邹韬奋(1895—1944),是个毕生追求真理,不顾任何困难险阻,坚持不懈地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文化战士。在他的身上,既表现着热爱人民,为人民尽心竭力、忘我工作的高尚品质,又表现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在黑暗的旧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韬奋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韬奋一生的最后几年,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1941年,他在重庆主编的时事政治评论刊物《全民抗战》,在国民党当局的图书审查制度下不能说出他要说的话;他主持的对进步文化起重大作用的出版发行机构生活书店在各地的分支店几乎全部被封闭。但他坚决主张,为了抗战到底,必须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的民族团结,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而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38年他曾被国民党政府聘任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这时他毅然辞去这个职衔,流亡到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又回到内地。他隐姓埋名,从广东辗转到上海,又到了苏北的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但是他已身患癌症,在敌后农村环境无法医治,只好又秘密回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1944年7月24日,他永远闭上了他不甘心闭上的眼睛。在他缠绵于病榻上的一年中,他还不断地拿起笔来,写下了他对于国事的严正的主



张,并且记述了他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不惜过流亡生活的感人的经历。

他所身受的压制和迫害没有使他对中国的前途绝望。他在临终前口授的遗嘱中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韬奋并不是在他开始从事文化事业时就是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经过自己的具有特色的道路而选择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韬奋在192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他当过私营纱厂和上海纱布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又当过英文教员。1926年,他接办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出版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刊物——《生活周刊》。他本来有志于当一个新闻记者,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办这个刊物上。在他主持下,这个本来每期印数只有2800份的刊物,到了1931年初已销8万份。刊物的内容是什么呢?韬奋这样说:“《生活周刊》的初期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同时还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个刊物的信箱栏是很有特色的。韬奋和来信的读者讨论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个刊物虽然对于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抨击,但是还说不上是一个革命的刊物。可以说,当时它的读者是还不了解中国必须有一个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有光明前途,而是从个人的生活角度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不满的一批人。韬奋自己的思想,当时也处于这样的水平,但是他没有停止在这个水平上。

韬奋十分重视和读者通讯,这是他在办刊物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记述最初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编写这个刊物时的情形说:“读者一天天多起来,国内外的来信也一天天多起来。我每天差不多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这真是一件极有兴味的工作。因为这就



好像每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周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都有直接答复的必要。有的信不能发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复。直接写去的答复，最长的也有达数千字的”。他还说，他“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

他这样认真地为读者服务，使他得到了读者群众的信任，同时他也通过和读者的联系而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周刊》逐渐发生了转变。韬奋说：“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适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

《生活周刊》的这个转变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这时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刊物成为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有力号角，并且宣布了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立场。他带动了原来的读者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而且新的读者成倍地增加了。《生活周刊》的发行数量最多时达到 15.5 万份之多，这在当时中国出版界中是空前的。

1933 年，韬奋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个同盟负责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内，不得不流亡出国。随后《生活周刊》就被当局查禁了。

韬奋在西欧诸国、苏联、美国学习和考察了两年。这使他对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命运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回国后不久，他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这个刊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前不到一个月开始出版，对于传播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掀起全国的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只出版了 16 期就被封闭。1936 年 11 月，韬奋和



救国会的其他 6 个领袖一起被捕，直到次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才被释放。抗日战争期间的实践更使他看清楚了中国的前途，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韬奋这时已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1938 年他从上海途经广东、广西到武汉，同行的张仲实记载说：“韬奋先生每至一地，都有许多青年来访。到广西郁林（今玉林）时已晚上十时左右，该地数百中学生都已入睡，听到先生抵达消息，全体起床，硬要先生前去讲演半点钟”。抗战时期在南洋的胡愈之这样说：“在海外，无论是怎样偏僻的小岛上面，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韬奋的读者。当我在苏门答腊避难的时候，有些小地方只有一二百个华侨，甚至都是不能讲国语的，但其中就有人读韬奋的著作”。1939 年初，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起征集 50 万封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信。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只在一个月內就从读者中征得 12 万封这样的信。

韬奋始终通过刊物密切地联系着群众。在《大众生活》创刊时，许多读者给他写信，表示看到他回国出版新的刊物十分高兴，但十分担心这个刊物可能又遭到不幸的命运，因而希望韬奋在文字上谨慎一些。韬奋在刊物上答复说，我们固然也希望刊物不会“中途夭折”，“不过当然还要以不投降黑暗势力为条件”。又说：“我们当然要尽力之所及使本刊不要夭折，因为我们要借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办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如果万一夭折终于难以避免，“我们却不因此灰心，却不因此停止工作。解放运动的进行并不因此而停止或消灭，时代的巨轮还是朝前迈进的”。

现在来读韬奋写的文章，也许有人感到他写得很浅，但应该看到最可贵的是他通过自己的文章把心交给他的读者。读者从他的



文章中看到他一片为国为民的真诚的心,又从他的活动中看到他是真正言行一致的。他曾写道:“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在前进的书报求锁钥外,无时不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他是在时代的浪潮中勇猛地前进的人。他向群众学习,也带动了先后受他影响的上百万群众一道前进。因此,韬奋成为一个永远值得后人追念的文化战士。

1984年12月

原载1988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胡绳的文集《历史和现实》。



追念邹韬奋同志

邹韬奋同志是在 30 年代国民党统治区掀起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的宣传家。由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和以后坚持主张团结抗日，主张民主进步，反对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主义，他屡遭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直至在颠沛流离中病故。他不谋私利，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追求真理，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在生前已为千万人所敬仰。抗日战争前夕，他主编的刊物发行量最多时达 20 万份，超过在这以前和当时的一切报纸刊物。他以诚挚的心、通俗的笔调为读者解答疑难，说出人民要说的话，因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他本来是个无党无派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他认识到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成功必须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人民前进，开辟中国光明未来的政党。他的临终遗嘱郑重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韬奋坚定地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一定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一定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他的这些信念在他去世后一一成为现实。他是为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斗争了一生的伟大战士。作为一个无限忠于人民的爱国者，一个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引导群众前进的文化战士，韬奋同志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崇敬。

我在这里还想就韬奋一生的思想发展说几点意思。



韬奋从他开始办刊物以言论影响社会到他逝世,将近20年。在这期间,他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爱国,救国。怎样才能挽救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他对这问题的认识,初期和后来是不同的。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是在1931到1932年。在这以前,他说:“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是“根本要策”。到了1932年7月,他针对国民党军阀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在自相火并的事实说:“民众为着自身利益而反抗军阀混战,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除非把政权和武力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显然,韬奋这时已经对国民党统治绝望,认为不可能把政治清明和实业振兴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反动统治者身上。

有了这种新的认识后,韬奋言论的方向转到了唤起群众的自觉,自觉地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进步的斗争中。孙中山总结他一生奋斗的经历,得出了“唤起民众”这个结论。人们把五四运动称为启蒙运动,所谓启蒙,也就是唤起群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间,以韬奋为代表的救亡运动宣传家,主要是在知识青年和城市市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起了巨大的影响。这部分群众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国民党统治下的内忧外患,多数人对个人出路和国家前途感到迷惘、困惑和苦恼。帮助这部分人逐步地觉醒起来,振作起来,是韬奋的最大功绩,是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形成的重大贡献。应该说,30年代的救亡运动也包含着启蒙运动的内容。把救亡和启蒙看作好像互相对立,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五四运动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但就所影响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来说,30年代的救亡运动是超过了五四运动的。

或许有人说,启蒙运动是指反封建,而救亡只是反帝国主义。



这种看法也是站不住的。在半殖民地中国,从来一切带有启蒙性的运动都不能不接触到民族的存亡问题。不仅五四运动,而且五四前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如此。到了30年代初,正如韬奋所说,“全中国民众当前所焦思苦虑、梦寐以求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是要避免亡国奴的惨祸”。当时,中国人民为避免亡国奴的惨祸,就必须一致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侵略。所以,称为救亡运动。救亡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也反对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使中国落后的封建主义;不仅求民族的生存,还力争民族的进步,没有进步,是不能生存的。就实际生活说,大量的青年是冲破家庭、社会的种种封建罗网才投身于救亡运动的,他们又从抗战的实践中逐步认清了中国前进的方向。经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反封建斗争也大大地向前跃进了。

1935年,韬奋所办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这是韬奋和他的朋友主持的几个刊物相继被当局查禁以后出版的又一个刊物。在创刊词中,韬奋指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是“特别要注意的主要目标”,同时又提出另外两个目标,这就是“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在救亡运动正进入高潮时,他提出这三条纲领式的目标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个人主义的问题还值得说一下。那篇创刊词中认为,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走上纯粹资本主义的路”。韬奋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反对个人主义的。他说,“以个人的利害做中心,怎能团结大众,共同奋斗来争自由”?他反对提倡封建道德,养成奴性。他主张个人要“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用集体主义来克服个人主义。五四时期早年的《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以为,可以用个人主义来反对封建主义,这种想法早已为先进的思想界所扬弃。韬奋曾说:“无论



做人做事,宜动些脑子,加些思考,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动的精神,有创作的心愿”。同时,他“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和精神”。他自己确是这样做的。克服个人主义,而在集体斗争中发扬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这是韬奋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观点。50年前韬奋在救亡运动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以为是值得重视的。

韬奋是一个和人民共呼吸的言论家。他引导群众,也向群众学习。他通过实践和独立思考而提出的许多思想,表达的形式很朴素,但有很可贵的内容。我们应该珍视包括韬奋在内的许多爱国的革命的先驱者的思想遗产和斗争业绩,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思想和事业。

1990年11月5日在邹韬奋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

邹韬奋同志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的激荡风云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30 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在 30 年代开始的 3 年前,背叛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而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这个政权,以为它可能带给中国以不同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好局面,但是事实迅速地表明,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国民党当权以后,内部为争权夺利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甚至酿成规模巨大的内战。国民党政权无力造成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它也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贫穷落后,百业凋敝,一如既往。对外,国民党政权也不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丝毫改变。在进入 30 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公然攫取中国的东北,并且进逼华北。对于外来的武力侵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统治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实行所谓不抵抗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 30 年代开始时,就其整体说,政治上还不成熟。它所实行的革命原则虽然是对的,但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左”倾的指导思想使它继续走了几年弯路。经过 1934、1935 年的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站稳脚跟,实行符合于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政策。它的力量虽然还很小,处境很艰难,但是它的政治影响不断地扩大。



邹韬奋生于 1895 年,在上海受过直至大学的正规教育,然后在上海的工商机关和教育机关中过工薪生活。他在青年时期似乎很少受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1927 年国民党政权建立时,他在主持办《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谈个人的修养问题,和读者进行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的讨论。他的刊物很少谈政治,在谈到政治时也无非是要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当时韬奋还说,“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话其实是要求国民党政权做到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最低限度所应该做到的事情。当时的的问题是,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做不到这些最低限度应当做到的事?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事?对这些问题在当时韬奋的看法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的所做所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如同在它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但是在这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去扫除这个政权,那恰好给正在以全力准备并吞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有利的机会。当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把民族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反抗侵略者,也推动国民党统治者参加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这样不但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而且可以有希望通过救亡推进全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 1935 年以后,就逐步地坚决地转移到这样的政策上来。这种政策的实施,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也对于国民党政权形成重大的压力。

经过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和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逐渐地增加了议论政治的篇幅。他以朴素的语调、说法,说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时的所感所想。他揭发国家的危机,分析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让步。他的



言论很明显的是不符合国民党当局的要求，而为广大人民所赞成的。韬奋的特点在于，他明知有政治的风险，但绝不掩饰他觉得应该讲的话。他在言论中坚决表示，要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国民党当局，而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在1933年，他被列名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中，他的刊物被封闭，他被迫流亡国外。这时他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曾参加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民权保障大同盟。他有个别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开始去了解共产党的主义、主张和它所进行的斗争。韬奋靠自己的稿费在国外旅游两年，于1935年回国。这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一步步深入华北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时候。韬奋没有因来自国民党统治势力的压力而退却，他继续经营进步的出版事业，同时参加群众救国运动。他所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在群众中倡导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这刊物才创办3个多月的第14期上，发表了韬奋的一个《启事》，他说，“近来得各方读者好友来信，报告本刊将被封闭和我将被拘捕和陷害的消息”，为了“也许变起仓促来不及留下几句话和许多读者好友道别而遽去”，所以发表这一启事。《启事》中他庄严地声明说，“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又过了半个月，这个刊物终于在第16期上宣布被迫停刊。他又发表《启事》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也就在这时，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个党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开始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



党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于中国政坛以后，除了有许多先进分子参加党以外，总是有许多党外的同情者。他们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阶级，也不是，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同情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以各种形式帮助共产党，他们可以说是党的同路人。在1927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它的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时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包括它的同情者的数量，都显著地减少了。直到30年代中期，在国民党地区内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述情况有了改变。党的中心虽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落里，但是它在全国城市中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同情它的事业和实际上支持它的主张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韬奋在这时成为党的积极的同路人，有重要的意义，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多年间以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办刊物，由于他在言论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爱国赤诚，由于他坚守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受到众多读者的爱戴。他的读者不仅在国内，而且有海外华侨。他的杂志销售数最多时达到十几万份这样一个在中国出版界中空前的数字。他对政治方向的选择，影响了数以万计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终于收到了实效。由于共产党坚持这个方针，由于全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再加上国民党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出发而进行的利害得失的盘算，国民党承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但这时韬奋和沈钧儒等在上海的7个救国运动的领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拘禁在监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被释放。

在抗日战争期间，韬奋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很高，被国民党



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国民党地区内继续从事出版事业。由于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所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他所办的杂志、出版社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50多个分支店，先后被封闭。1941年在发生皖南事变，整个政治形势恶化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为保护韬奋，安排他离开重庆到香港工作。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命令它的特务系统搜索韬奋的行踪，在任何地方捉到他时“就地惩办”，所以韬奋不可能再回到内地的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组织帮助韬奋辗转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但这时已发现他患脑癌。在艰苦的农村根据地无法进行治疗，只好把他送到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所统治的上海。秘密居住在那里时，治疗无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他在上海逝世。他的遗嘱中充满着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他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的祖国与人民继续奋斗。”他要求参加共产党，在遗嘱中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这个伟大的爱国者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一生历史的总结。

在30年代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出现了一批经过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来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都对社会做过有益的贡献，他们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国民党使他们失望，他们根据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受他们影响的人，也随之而倾向于这种政治选择。邹韬奋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抗日战争结束时,还没有能确定中国今后的命运。经过一些曲折,终于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大决战。共产党在这场大决战中取得 1949 年的彻底胜利,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强过国民党(相反,它的武装力量在战争开始时比国民党小得多),而是因为民心不在国民党方面,民心在共产党方面。为什么广大民心背离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而趋向力量相对弱小的共产党?追溯历史原因,就应当看到 30 年代。在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处境还十分艰难的时候,韬奋和其他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愿意与共产党同甘苦,共命运,就把中国的前途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正确选择不但对当时的人民群众起着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以后多少世代间人民群众的意向起着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韬奋虽然死得过早(他逝世时只有 49 岁),但是人民永远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纪念的原故。

纪念邹韬奋诞辰一百周年为《邹韬奋传》作序,
三联书店 1995 年出版。



艾思奇走出的第一步

艾思奇同志一生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事业。在纪念他逝世 20 周年之际,使我想起周扬同志在《艾思奇文集》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艾思奇同志作为一个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从走进社会第一天起,就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武器,批判旧世界,开创新时代的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奋斗了终生”。我认为这是对艾思奇同志的真实写照。

艾思奇同志 1932 年春到上海,1933 年开始发表哲学论文。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可以说大部分是哲学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第二个时期是到延安以后,第三个时期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认识艾思奇同志是他在上海的时期,抗日战争中没有接触。以后,在北京则有不少工作上的联系。艾思奇同志到延安后,思想与各方面都逐步成熟起来。但是我总是容易回忆起他在上海的时期,也就是他写《大众哲学》的时期。现在看来,这本书有些地方未免显得幼稚,连他本人后来也不满意。在这本书出版后 3 年,他曾写道:“当时我所写的这本《大众哲学》和我现在所理想的《大众哲学》,已经远离了不知多少里程了”。他写这本书时才 24 岁。这本书 1934 年在《读书生活》上逐期连载,1935 年以《哲学讲话》的书名出版,后来改书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查



禁,到1938年已出到第10版,共两万多册,以后还陆续在各地再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它起了很大的影响,确实有不少青年受到《大众哲学》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也有不少青年通过《大众哲学》而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道理。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写作的历史背景是在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当时,在我们党内,继立三路线之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党领导下的文化、文艺运动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但是仍然能进行得很有生气。党的有些领导人较早地看出了在文艺工作中应该纠正“左”的错误。1932年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其中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停留在狭窄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是“左”的关门主义。瞿秋白曾一度在上海领导文化、文艺工作,他注意纠正左联忽视文艺创作的倾向,要求团结一切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参加左联工作的党内的同志,鲁迅、冯雪峰、茅盾、夏衍等都对“左”的教条主义的组织方法和工作方法有所抵制。由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的临时党中央迁入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派出机关又屡遭破坏,在上海的文化界、文艺界的党员实际上处于孤立作战的地位。但也因此,他们不可能继续执行“左”的那一套做法,不能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出发,力求在那种恶劣环境中还能生存,还能进行工作,并且注意团结各方面的进步力量。这时除文艺以外,社会科学和一般政治宣传方面也出现许多新事物。例如,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由于有党员作家参加,而在广大读者,包括大量处于中间思想状态的读者中起了积极的影响。陈翰笙、薛暮桥等进行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刊物和书籍。胡愈之、钱亦石主办《世界知识》,向读者说明



分析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这些出版物都是实实在在地摆事实、说道理，而不采用那种盛气凌人，空喊革命口号，脱离群众的做法。因此，受其影响的，就不仅限于本来已有革命要求的读者，而大大地扩充了。在1935年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上海的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进步的文化文艺界就更加生气勃勃地展开工作，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艾思奇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他最初是在《申报》流通图书馆工作。那时在《申报》这个中间性的销路很广的报纸上辟了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持的一个读书问答专栏。艾思奇和柳湜是这个专栏的主要写稿人。他们在这个专栏里以答复读者来信的形式和读者谈心，谈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那时有无数青年，既对国家和社会的状况感到不满，又在个人生活中感到种种苦恼，苦于找不到出路。为了和这些青年讨论问题，打动他们的心，靠教条主义的说教显然是不行的。看来，担负读书问答这工作，对于年轻的艾思奇，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不久，在这个读书问答栏的基础上，柳湜、艾思奇办了《读书生活》这个杂志，又进一步成立了出版社。也就是在这时候，艾思奇写出了《大众哲学》。

毛主席说过，那时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是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完全失败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当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在起作用。那时在上海的党的文化理论战线的同志，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是他们能够做出成绩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他们按“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指导思想来作工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们就会脱离群众，而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束缚，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30年代中期上海的理论宣传的一个特点。除了上海，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其他地方，如北平的党的文化工作者及其同盟者也作着同样的努力。这时候产生的许多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或者虽然不是很通俗的但能够联系实际、联系读者群众的思想状况的著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能够在反动统治的严格禁令下取得大量的读者，就在于它们较少教条主义的习气。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著作之一。附带说一下，艾思奇在 1936 年还编了《认识》月刊，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理论性的刊物，也表现了较少教条主义习气的特色。可惜只出了两期便停刊了。

也许有人会说，反对教条主义是毛主席在 1942 年整风运动开始时才提出来的，怎么 30 年代党在上海的文化理论工作已经能克服教条主义的弊病呢？我这样说，是否夸大了 30 年代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理论工作呢？我以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夸大。党中央的一个新的正确思想并不是凭空地突然产生的，总是对许多已有的经验的总结。往往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对这样做不行，那样做才行有所感，但还不能明确地、系统地说出来。正因此，当党中央概括这些经验，提出一个新的正确思想时，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人们感到这是把自己原来说不清楚的问题一下子说清楚了。30 年代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党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宗旨，也并不能系统地反对教条主义，但是这时人们对教条主义已经感到厌恶，对“左”的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是行不通的已经有所察觉，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突破教条主义的樊篱，这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我想，这样来估价 30 年代的上海文化、文艺工作，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一方面党又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指导思想统治下，上海的文化、文



艺工作能取得那样大的成绩。30年代上海的文化、文艺工作之所以特别遭到“四人帮”的仇恨，也从反面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的束缚。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在他一生的理论工作中走出的第一步。这第一步的确带有幼稚的痕迹。但从当时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认为这是很坚实的第一步。当然他没有止步，由此他一步步踏实地走了下去。在纪念艾思奇同志一生业绩的时候，我想，说一下他在什么情况下走出的第一步，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1986年4月7日在纪念艾思奇逝世20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忆家英同志二三事

1949年初，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我和家英相识。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北京后，常有机会在一起，有几年还在同一机关里，并且住处相近，有时又一起到外地去。算起来，我们从30岁左右开始做了18年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暴过去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颇有才华，也有见解，本来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的确使人难过。

家英颇有才华，这是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承认的。这方面我不说了。家英遇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也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我想从一件也许不为人们知道的事说起。

家英多年间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主席身边工作。当然，他不可避免地会同江青经常接触。但他从不对江青像通常所说的注意“搞好关系”，相反，他做了些似乎使江青不高兴的事情。在家英同两三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关起门来聊天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江青的厌恶和鄙视。在这样的场合，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对所议论的这个人用“密斯”这一代称。“密斯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控制下，密斯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密斯又装病了，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其实她是一心想摆脱毛主席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我听到家英讲这一类的话，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想，如果他不是当时唯一能看出这个“密斯”的野



心的人，那么他也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中的一个。固然，在另一点上他是看错了。他以为，有毛主席控制着她，她是演不出自己的戏的。1966年后那种复杂的局面，他当然不可能预料到。

大约在50年代末，家英向我说过一句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在他去世以后，这句话常常在我的记忆中浮现起来。这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这句话可以说是属于书生的狂论，但也的确反映了他的一种心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在家英心上是很明确的。他对毛主席也十分尊重。但是他对当时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渐渐地发生了怀疑，他认为可以有别的模式。回想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由于有不便深谈的人在旁，我没有就这句话进一步追问他。不过我想，如果说，他当时已透彻了解现行模式的弊端，并且已对另一种模式有比较完整的概念，恐怕也未必。

但是在农村问题上，他的确有了新的想法。家英是热心于农村调查工作的。在1955年他曾帮助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农村，看到许多实际情况，使他的看法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他认为当时在一些地方农民自发实行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值得推广的。他曾向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这个主张。当毛主席在1962年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抨击所谓“单干风”的时候，家英是被批评的对象之一。他不可能再坚持他的主张。这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也是在他短促一生的最后几年，心情苦恼的一个原因。

1965年12月21日，家英和我，还有其他3人，一起在杭州听到毛主席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谈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就因为有这么几句话，这篇谈话成为一篇著名的讲话。由于



这次讲话和家英之死有点关系，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有记载说，毛主席是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作这个讲话的。但其实这不是一次会议。他在11月21日把我们5个人找到杭州，当天就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是要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他认为，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这一次谈话根本没有提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10天前这篇文章已经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这次谈话只是要大家考虑可以先出哪几本书和如何写序言的问题。他说，过几天再约这几个人谈一次。以后，这几个人就在杭州等待第二次谈话，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期间，毛主席突然到上海召开一次中央会议，那就是对罗瑞卿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的会。这次会议后，他又到杭州，才有了12月21日的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是原来的5个人。这次谈话历时3小时，毛主席所谈的仍然是原来的主题，不过他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谈到“海瑞罢官”。

在这次谈话以后，家英以为这篇讲话内容重要，建议搞一个讲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家英这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按他的职责来说，这样做似乎是必要的。但他所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因此，在家英、我和参加谈话的另一个人一起，凭记忆和谈话时所作的简单的笔记来进行整理时，家英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都不必记入讲话纪要里。我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讲话纪要。参加整理谈话纪要的还有另一个人，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关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像是由康



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4人在一起,这4个人中“一分为二”,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另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5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关锋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并不是原来讲的主题,原来的主题以后再也不提起了。家英参加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同志,也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海瑞罢官》牵连到彭德怀同志,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

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成为家英的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其他原因,家英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期间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压力。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6年3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天。他把这卷条幅



拿去,要和他收藏的同一人所写的字卷对照一下。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

现在提起家英,不免还想到一起在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还有广州、杭州、嘉兴、武汉逛旧书店铺的情景,不免还想到在一起通宵工作后到府右街凌晨就开张的小铺子吃豆浆、油条,和深夜到东四牌楼沿街小摊上喝点酒,吃碗面条这类事。我们还一起在杭州寻访南宋宫殿的遗址,一起赏玩庐山上李白歌颂过的瀑布……这一切,现在想来,都成为少年游了。

如果家英还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农村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找到了新的合适的模式,那该多好啊!

1987年春,我在与杭州阔别22年后重到西子湖边。徘徊于孤山白堤之间,不禁想起了故人,遂作湖上怀田家英小诗一首:

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

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

1987年12月

原载1989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先驱者李达

李达同志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过重要贡献。

李达同志一生主要在理论战线上工作。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3年间，他已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介绍和宣传。他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准确地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国民党统治期间，李达同志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他所身受的压迫，只要有可能，就坚持在各大学中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讲课。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更重要的是他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他所撰写的许多著作有广泛的影响，其中主要是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等。他的这些著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有许多创见。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撰写《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还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他的确是毕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并有卓越成就的一个战士。

李达同志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还先后担任新中国的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在教育工作上也有建



树。

李达同志在理论工作上的成就是值得特别重视的,若干年来学术界对此已多有论述,我们还应该继续探讨。我这里想说的是,在李达同志的理论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特点,这两个特点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有突出的表现。

第一个特点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并不是个很简单过程。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的思想界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既有主张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宣传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等的错误思想,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修正主义的和极左的思想。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当时,李达和其他为数很少的同志就是这样做了的。虽然李达同志自己后来说,那时作的批判还是很幼稚的,但是可以看到,他们是很认真地从理论和事实上分析这些错误思想的矛盾,指出种种论点的似是而非,通过比较,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李达同志那时说:“我们关于主义上的讨论和批评,总要根据理论说话,不要感情用事,专重意气”。正因为他们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批判的武器,所以他们能够不断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中的地位,不断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色。但若干年来,由于人们错误地运用批判这个武器,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批判就是简单地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罗织罪名,随声附和地群起而攻,这就把批判的名声搞坏了。我们纪念李达同志,就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认真地分析研究,充分地讲理,在指出错误观点时要树立正确的观点。

第二个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



论,社会发展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 30 年代后期才成熟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只是一般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从李达同志的早期著作来看,他在 1923 年就发表了题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文,其中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这一特点出发指出,中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是有“理论上事实上的根据”的,同时又说,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那是要“按照中国国情”来决定的。在那时有这样的看法是很可贵的。显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李达同志认真进行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具体研究。他在 1929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就是“从经济里去探求”“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中着重提出,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作者收集了当时他所能得到的大量的数据,论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怎样发展中国的产业,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李达同志早在 30 年代以前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科学研究。30 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继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此可见,有些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从来没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作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攻击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似乎是为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而放弃科学研究,这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重视批判的工作,就是要解答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思想问题,这其实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方面。理论联系实际,更要求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研究,解答在中国和世界出现的许多新的实际问题。解答思想问题和解答实际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丧失活力。联系实际,解答各种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活力,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当然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功能,或者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批判工作。我们应该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种种思想认真地进行深入的批判。进行这种批判需要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相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掌握充分的资料,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纪念李达同志和其他先驱者,就要学习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并且以他们为榜样,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密切地结合实际来推进我们的理论工作。

1990年10月27日在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忆何增禧（徐沫）

我和徐沫可算是总角之交。因为我们建立友谊、交往密切是在20岁以前。那时当然我们很幼稚。我们共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追求进步，萌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互相影响，互相切磋，在这中间建立了友谊。

我们是苏州中学初中部的同学，1931年夏季毕业，我进苏州中学的高中部。徐沫家境贫寒，不能继续上学，考进了上海的中国银行当“练习生”。徐沫是他的笔名，本名是何增禧。

九一八事变在1931年秋天发生，次年发生一二八事变。继侵略东北之后，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青年。徐沫同在苏州的几个同学经常通信，交流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担心和希望。有时他回苏州家里，我们当然就有了聚谈的机会。渐渐熟悉了上海这个都市的徐沫带给我以新鲜的信息和知识。他曾不止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出版的报刊带到苏州。这时，我们开始读马克思的书，知道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我们对中国革命抱着虽然不明晰，然而真切的向往之心。我们也关心正兴起的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1933年下半年，我转学到上海徐家汇的一个中学。我和徐沫的来往更密切了。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和徐沫在一起。我们一起



在徐沫宿舍的小房间读秘密书报，一起到位于卡德路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徐沫在1933年已经参加了这个协会。我在苏州开始学习世界语是受他的影响。世界语那时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新鲜的语言，我们还把它当作打开革命眼界的工具。我们认识了在艰苦的条件下住在这个协会的简陋房子里坚持工作的乐嘉煊（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逝世），也认识了叶籁士、张企程和其他一些进步的世界语者。徐沫的世界语学得比我好得多，他在以后若干年间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做了很多工作。

那时在上海还有一个我们在初中时的同学，他已经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的名字叫徐荣华，后来改名许亚。徐沫在进入中国银行后不久就和许亚有联系。党的秘密出版物就是从许亚那里得来的。我到上海后，许亚有时也来看我和徐沫，除给我们看一些报刊外，还让我们帮他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许亚在1936年被捕，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从监狱里出来，继续为党工作。60年代初，他担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不幸在壮年时病逝。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应该是1933年11月20日），徐沫忽然到我学校来，告诉我一个刚刚得到的消息：因在上海抗战而著名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和其他一些人在福州成立了人民政府。报纸上还未透露这个消息，银行通过自己的渠道先知道了。我们感到，这个突发事件对国民党统治者是一个重大打击，对于在江西的红军显然是有利的，因此很高兴。不久后，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当然使我们很失望。我们只是简单地确信革命终将胜利，但是对于时局进行具体分析是我们所做不到的。

1934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暑假里我住在徐沫的宿舍里，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那时北平的著名大学在上海设有考试点。徐沫在银行里做“练习生”已经期满，成为低级的职员。他为了避免和



银行的同事不必要的接触，不再住在银行宿舍里，另外租了房子（当然只是一小间）。这年暑假是住在一家肉铺的楼上，每下楼来就有一股屠宰场的气味扑面而来，楼梯扶手上也似乎都是油腻。

我在北平上了一年大学，又回到上海，结束了学校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离开上海。在这两年间，有几个月我和徐沫曾同住在一起。在当时“法租界”的环龙路住过，在“英租界”跑马厅附近住过。我们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并因而接触到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个别负责人。胡乔木是“文总”的负责人之一。他在这时认识徐沫和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住的四层楼的阁楼上来和我们谈话，还在那里借宿一宵。

徐沫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上海中国银行供职。他也一直同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有联系。抗日战争把我和徐沫隔绝了。直到1946年，我在上海工作一年时才又遇到徐沫。再以后，和他会见已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了。虽然同在北京多年，但是因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见面的机会很少。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暴风雨，他显然和别人一样，是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在暴风雨袭来的一开始，他就受到迫害，含冤而死，那时他才50岁。我知道他不幸的结局，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徐沫是个沉静寡言的人。在旧中国时期，他为了谋生而做银行职员，主要在外汇部门工作，因而有机会钻研这方面的业务。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马列主义。除世界语外，他还学好了英语，也学了日语、俄语。他一贯地、悄悄地为进步的世界语运动、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奉献。他直接间接地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对于他所能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和党所领



导的组织，他尽力给以支持帮助。他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在那时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他从不在任何情况下炫耀自己做过些什么工作，进入新中国后他还是保持着这种品质。他甘于默默无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和工作。在上海解放时，他和银行中的党员和其他进步分子为人民政府接管银行做出了贡献。这以后，他继续在银行工作。多年来他在外汇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是国家 and 人民所需要的，因此他极其勤奋地钻研他的业务。在旧中国，他是为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从事业余的工作，在新中国，他同样是为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而从事他的业务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诬蔑徐沫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愤怒。徐沫只有初中的学历，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具有较高业务理论水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的人。他能把他在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外汇业务中的经验和知识整理和提高，既在高等学校中讲课，还写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结算方式》的专著。我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这些成就。但应该承认，他即使不能称为“权威”，至少也是这个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专家。这样的专家本来只应该受到爱护，而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摧残。说他是“资产阶级”吗？他在旧中国的银行中，从“练习生”做起，十七八年不过是个普通职员。他持久不懈，甘冒风险地为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不吹嘘他自己曾为革命做过些什么，只是一心一意地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他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们也不必再使用过去人们曾用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样的说法，但应该承认，他的一生是革命战士的一生，是一贯和党走一条路的战友。

一场根本不当发生的暴风雨吞噬了不少本来还可以大有作为的共产党人和党的战友，其中有我的朋友徐沫，这使人想起来就痛心。



这场暴风雨的确提供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为使这种不应当发生的事不再发生，我们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做许多工作。有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这一畸形的历史现象，攻击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我相信，牺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战士，如果还活着，也不会同意而且要坚决驳斥这种错误的观点。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历史教训实际上有两层。在“左”倾的指导思想下搞“大民主”，搞“阶级斗争”，结果造成无政府状态，搞乱了社会主义，恰好为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造成活动良机。这一层教训是明显的。另一层教训是，如果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削弱以至放弃党的领导，结果一定不会有什么“民主”，而只是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为此我们就会付出比“文化大革命”多几倍、几十倍的代价和牺牲。这是我在缅怀徐沫和类似的其他朋友时想说的话。

原载 1990 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怀念何增禧（徐沫）同志》。



写在《柳湜文集》的后面

我和柳湜同志相识是在 1936 年。但是在认识他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了。1934 年冬，他和艾思奇同志编辑的《读书生活》杂志创刊。那时我在北平，是个大学一年级学生。这个在当时出版界中以一种完全新的风格出现的杂志，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它的经常撰稿人，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有汉夫（写国际问题）、征农（写文艺评论）、吴敏（写经济问题）、高士其（写科学小品），还有曹伯韩、廖庶谦、陈楚云等。两位编者写的文章最多，艾思奇主要写哲学方面的文章，柳湜写的方面较广，时局、社会动态、青年生活都是他写作的题材。

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东北，又侵入华北，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是国民党统治者对日本侵略势力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内战，施行反人民的法西斯高压政策的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退出南方根据地，进行艰苦的长征的时候。那时，在国民党书报审查制度下，连抗日两个字都不能见于公开的报刊上面。一大堆问题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中国能不能避免亡国的命运？中国能不能有个光明的前途？由于看不到民族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产生的愤懑、苦恼、不安、恐慌，交织在一切善良的爱国的中国人民的心头。

正在这个时候，上海的一些实际上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党组



织在许多方面，也在文艺文化战线方面联合党外的革命者做了许多工作。运用公开出版的书刊，通过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大至世界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出路问题，小至个人遭遇问题），而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传播给群众，是他们所进行的出色的工作之一。《读书生活》杂志在开辟这一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5 年秋天，我离开北平的学校到上海。由于给《读书生活》投稿而逐渐同这个出版社（这时已建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辛勤的工作者认识了。至今我还能记得，在斜桥弄的一间既作发行工作，又作编辑室用的简陋房子里，同柳湜谈话的情景。柳湜除了编辑《读书生活》外，还在别的刊物上写文章，出版了一些在青年中有影响的书，如《街头讲话》。

国民党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已经被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起的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所打破。柳湜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参加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但在这一时期，我和柳湜的接触还不很多。

1938 年在武汉，柳湜主办《全民周刊》，邀我参加工作。这虽然是个周刊，但编辑人员除了主编以外，就是我；不久默涵来了，共有 3 个人。我们在江汉路联保里租了楼上的 3 间东厢房，其中一间柳湜夫妇住，还有两间是相通的，可说是一大间，一半由我和默涵住，另一半摆了两张桌子，就算是杂志的办公室。

夏天的武汉是有名的“火炉”。联保里又处于汉口闹市。《全民周刊》出版期间正赶上夏天。柳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写稿子，编刊物。联保里的北端有个商人办的小印刷厂，由它承印我们的周刊。每星期出版前，包括主编在内的全体人员——3 个人都挤在这个小印刷厂里看校样，直到付印。

由于工作生活在一起，逐渐相知较深。但是刊物每周出版一



期,再加上别的工作,够我们忙的。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议论的事够多的了。我没有听到过柳湜谈论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他比我大10岁,坐过牢,受过生活的磨难。他的勤劳的工作作风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我这个参加斗争生活不久的青年以很深的印象。我是把他看作老师的。这时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何伟同志经常来同我们联系。

《全民周刊》出版了几个月后,和韬奋主编的《抗战周刊》合并成为由生活书店出版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在武汉沦陷前不久,《全民抗战》随生活书店迁往重庆。柳湜也到重庆去了。

1939年5月,我也辗转到了重庆,又和柳湜会见了。他这时仍和韬奋合作主编《全民抗战》(已改为周刊)。在柳湜的鼓励下,我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不久,柳湜到延安去了。我一直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多年和他没有个人间的联系。

我和柳湜再见之时,已是1949年春天在北京。北京刚解放不久,他担任市教育局局长。一天,我们偶然遇见,他邀我到他寓所坐坐。在他的卧室里,我们长谈起来,一直到深夜。分别了这么多年,可以谈的话题当然很多。那天我们谈的是全国胜利后的形势;他还谈了开展教育工作方面的许多设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间的长谈也就只是这一次。此后,由于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各忙自己的事,见到的机会也很少。在他政治上受到不应有的委屈后,我没有能见到他,谈一谈,这是我至今想到就不能不感到深深遗憾的。

10年动乱中,不记得什么时候,听到了柳湜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沉重的痛苦压到了我的心头。我不忍设想,但又仿佛看到满脸流血的柳湜以湖南人的倔强性格喊道:我不是叛徒。

是的,柳湜同志是经受过许多苦难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



现在柳树滋同志把他父亲的遗著认真地选编出来，我以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柳湜同志一生写了很多文章，在抗战初期，在延安期间，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有许多著作。但我想，他著作生涯最光彩的一段还是在抗战以前的几年间。这里，我要回过来谈一下那几年柳湜所参与其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

1936 到 1937 年间，上海有的刊物提出过“新启蒙运动”这样的口号。近来看到有一本叙述那个时期的历史的书，这本书在 60 年代初版中写过“新启蒙运动”，但在 1979 年的修改本中删去了这一段，并声明删去这一段，“不只是因为这次运动发起者中有陈伯达其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次运动刚发起不久尚未真正展开，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实际上并没有能成为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不再使用这个当时虽曾提出，但不久就不再使用的“新启蒙运动”的说法是对的。但是应当承认，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几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确是进行了一次颇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称之为一个运动也未尝不可，但这运动并不始于“新启蒙运动”口号的提出，也不需要称之为新启蒙运动。

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的筹备时期就开始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没有停顿，反而是向前发展了。为了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驳斥种种取消和歪曲中国革命的谬论，都需要理论武器。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除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外，还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读本、论文等。但是在 30 年代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严重地染上了后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八股的气味。到了 1934 年左右，为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而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



同志们虽然还没有明确的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的认识,但是他们针对现实的形势,针对读者群众提出的问题,从读者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并使用读者能够接受的形式,帮助读者逐步地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是一个联系实际的,又是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对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宣传来说,确是别开生面。这一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代表刊物,除了柳湜、艾思奇编的《读书生活》外,还可以举出徐步、沙千里主编的《生活知识》(被查禁后改名《新知识》、《新学识》,它一直出版到1938年在武汉的时候),还可以提到比《读书生活》还早一点创刊的薛暮桥等编的《中国农村》,胡愈之、钱亦石、金仲华等编的《世界知识》等等。这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大量的青年在这时候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投身于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柳湜是在当时有成效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

当然,现在看来,无论是柳湜,还是其他作者,那时所写的东西不免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中,不仅不能忘记他们在那时期的工作,而且我们至今仍可以从他们的业绩中学到一些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

听到《柳湜文集》将要出版,引起了我的一些追忆和联想。把这些追忆和联想写出来,当然不足以表达柳湜同志的一生和他的全部工作,好在这些已有本书的“前言”作了全面的介绍了。

1986年3月

原载1987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的《柳湜文集》。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

今天，我们怀着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来瞻仰他的铜像。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49年进入北京城时才见到范文澜同志的。这以后，他长期住在东厂胡同的宿舍里。在同他交往中，和其他同志一样，我从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大家尊称他为范老。我以为，在范老的身上，既体现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又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品质。范老以其一生的治学，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最科学的思想武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对中国的丰富的历史遗产给以科学的说明，作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做到古为今用，通过历史研究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为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范老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扬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他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人。当然，他不是埋首故纸堆中脱离实际的学者。他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战士，他排斥和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范老的治学和为人都足以为后人的楷模。

今年是近代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近代史所是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这个所在成立后多年间由范老



直接领导。

这个所的历史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早在延安,范老的周围已经集合了一些年轻的研究工作者。那时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1947年已出版于华北解放区。以后他让一些同志帮助他对这本书校订补充。这本近代史多次再版,起了很大的影响。以范老为核心,由范老指导的研究集体就是近代史所成立的基础。范老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工作者,创立了在这40年来做出很多成绩的近代史所。所以,在纪念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时,看到范文澜同志的铜像,特别使人感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早的创始人中有范老这样的学者,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除范老以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还有其他好多位老一辈的学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力求拿最好的、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奉献给人们。他们有的还健在,有的已和范老一样逝世了。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向范老和其他老学者学习,树立严肃的学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好研究工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1990年8月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内举行的范文澜铜像揭幕式上的讲话。



纪念陈垣同志

陈垣同志是在 20 年前逝世的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他治学极为严谨,既有宏观的见解,又有严密的考证,既不说无根据的空话,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早年抱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在他长期做学问、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表现了对个人私利的崇高品格,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我们至今还为表露在这部学术著作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所感动。我以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陈垣同志的身上已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懈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谋求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是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相通的。陈垣同志在进入 70 岁的时候热情地欢迎新中国的建立。他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社会政治活动,从事学术工作、教育工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将近 80 高龄时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郑重选择。我有幸在新中国成立后认识陈垣同志,虽然没有机会多向他请教,但深感到这位学术界前辈的治学和为人是极其值得景仰的。陈垣同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并曾担任当时的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方面的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人,趁今天这个机会,对这位可尊敬的学术界前辈表示怀念;并且表示,我们纪念陈垣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严谨的学风,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理论,继承他的高尚的品格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更多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1990年10月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陈垣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维护党的团结的楷模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同党的发展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每一时期，他都是党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研究和学习周恩来同志的一生的奋斗史，不能离开整个党的历史。可以从各方面去进行研究和学习。我这里只谈到一个方面，而这方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在近几年学习党史中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其发展历史中为什么没有分裂？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后，几经错误和正确、失败和胜利的曲折，有时还是错误路线统治全党，造成巨大的损失、挫折，但是党没有分裂。在革命胜利以前，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各个革命根据地独立发展，以至形成所谓“山头”，但是党没有分裂。

实际上，党不止一次遇到过分裂的危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受到严重打击，从涣散中重新振作起来。这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脱离党，自行成立组织。这一帮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人成不了气候，始终只有几十、百把人，虽然一度成立统一的组织，但立即又分成几派，互相争吵。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有很高的威望，并且多年间是党中央的领导人，彭述之也曾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但他们分裂不了党。长征期间，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拉出大部队，违抗中央北上方针，南下川康，拥兵自重，甚至公然另立中央，



造成党内严重的分裂危机。张国焘从建党时起，一直在党内居于重要地位，但他分裂不了党，只得取消自立的中央。他虽然心怀不满，但在党内彻底孤立了，最后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怀抱。抗日战争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以党的领袖自居，妄图控制在武汉的长江局，把它当成全党的中心。这实际上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虽然局部地使党的工作遭到许多损失，但他也分裂不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一个人跑到苏联去，写些反党的书直到死去。“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抢班夺权无望，又企图到南方去另立中央，结果阴谋败露，仓惶出逃。他搞分裂活动，只有极少数追随者，终于败亡。此外，在党的历史上，还有罗章龙的分裂活动也迅速失败。党遇到过这些分裂的危机，但始终没有分裂。

这种情形表明，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总的说来，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一时嚣张，或者来头很大，总是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党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不可救药者，纯洁自己的队伍。它能够在党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它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单纯农民起义，像太平天国那样，内部闹分裂，最终失败。

党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对党内犯错误的人的正确办法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虽然是在1942年整风时才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已经这样做了。

党的历史上曾有过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形成尖锐的矛盾，但对这样的矛盾也不是用分裂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反对错误路线的同志仍然维护党的统



一团结，在党内逐步来纠正错误。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几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其实是不合法的（即违反党章规定的），他所倚仗的只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支持。“左”倾路线的执行，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直至导致“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但党仍然保持着团结，终于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克服“左”的错误。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人反对这种错误，不是因为党内群众通过实际生活没有发生对这种错误怀疑和不满的情绪。

不妨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对比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会后，少数派逐步以非法手段控制了设在国外的党中央机关和党中央机关报。列宁公开揭发少数派的错误，指出由它控制的中央机构在政治和策略上背叛了党。在无法取得党内和解的情况下，拥护多数派的国内几个地区举行代表会议，选出了自己的常务局。常务局负责组成组织委员会，不通过背叛党的国外中央机构而召开国内各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①。少数派反对这个大会，自行召集它的代表会议。这样就在1905年形成了“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在这次代表大会前，列宁有一篇《告全党书》（由22个多数派成员联名发表）。其中说：“有人说，召开代表大会会造成分裂。为什么？既然少数派坚决不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要求，宁肯造成分裂也不服从党，它实际上就已与党分裂，这时，再把不可避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106—107页。



免的正式分裂拖延下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①。

但在中国的30年代,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形。1903—1905年的俄国党主要是职业的革命家组织。而中国党当时虽未掌握全国政权,但在农村根据地拥有政权、军队,是群众性的党。中国党当时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左”倾领导者的支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群众对“左”倾错误的充分认识还需要时间。如果发生党的分裂,必然造成军队的分裂,难免自己打起来,那就更严重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是“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虽然许多老同志反对,但也没有用分裂的方法解决问题。分裂只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和损失,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任何情况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和许多党的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我这里说的领袖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

毛泽东是这样的领袖人物中的突出的一个。他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被排斥。在长征开始后最危急的关头,他用正确的路线方针说服了党中央的许多同志,通过遵义会议开始纠正错误。从此他成为团结全党的领袖。他主张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他主张不用惩办方法,而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方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间内,他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在晚年,一步步陷入“左”的错误,以至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团结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有不少领导同志,在错误路线统治下,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使人想起来就十分难过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451页。



通观党的历史，周恩来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一贯地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有时他所起的作用是别的同志所难以代替的。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几乎被打散。恩来同志虽不在党中央担负最主要的职位，但他在最艰难的地下工作的条件下，为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建立党在各地的武装，把以上海为中心的党中央和全国各根据地联系起来，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恩来同志一生中，恐怕最艰难的是两段时期，即 30 年代前期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党的几年，和“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

先说 30 年代前期。1930 年恩来同志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推行了半年的盲动主义错误。三中全会是按照纠“左”的方向进行的。但这时共产国际突然改变调子，说三中全会对立三错误的批判没有提到路线的高度，是批“左”不批右，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这就引起了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1931 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导演下召开四中全会，把王明等人搞上台，形成更加完备的“左”倾路线。秋白同志首先被赶下台，接着毛泽东也被剥夺一切工作，朱德靠边站。对这些情形，恩来同志是反对和不满的。由于恩来同志在党内有长期多方面工作的经验，和多方面干部有联系，“左”倾领导者不能不用他。恩来同志在实际上不被重视、许多意见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从事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以保持党的统一团结。他所处的地位即使他有可能尽力减少“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又有可能在有条件时出面纠正这种错误。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上，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纠正“左”倾路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遵义会议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期间，恩来同志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所起的作用，这里不需要多说。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直至破裂期间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长期代表党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并同各民主党派和中间力量联系。他负责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府工作。他经常承担着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并且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从不居功,倒是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中有什么不足之处。他始终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最后必须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在这10年动乱中,周恩来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责。对于狂热的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在“造反有理”的名义下形成的“天下大乱”,对党内外领导人物、老干部、专家的迫害是不同意的。他尽可能采取各种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他既不是公开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也绝不消极怠工。国家生活在动乱局面下的正常运转缺少不了他。他有力地协助毛泽东战胜了林彪一伙的叛党叛国活动。接着他受“四人帮”的排挤、迫害,甚至不为毛泽东所完全信任,但他仍坚持党务、国务,处理政治、军事、统战、外交等方面的日常工作,保护了许多党内外人物,尽可能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复杂险恶的斗争和繁重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没有能看到这场动乱的结束就过早地病逝了。他对维护党在那种特殊局面下的统一团结,保护和促进党的健康力量的成长,使党能够在统一团结的情况下纠正错误,结束“文化大革命”,过渡到新时期,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任劳任怨”这句成语可以在最严格的意义上,用在上述错误路线统治党的时期的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同志的“任劳任怨”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高度原则性的基础上的。

周恩来同志是有坚定原则性的革命家,但必要时他善于作妥协、让步,来求得原则的实现。党内外、国内外的人们对他的印象一般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善于说服人、团结人,又善于委婉曲折地表



达他的原则立场，在必须坚持的原则立场上是一步不让的。反映在他的性格上，一般说来，他是温文尔雅的，但有时也爆发很大的“火气”。而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压抑，甚至是长期压抑这种“火气”，可以想见他的苦恼。

在党的历史上，恩来同志曾在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承受着从自己身后来的攻击，全力承担党和国家的许多繁重工作，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减少因党领导的错误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创造纠正错误的条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上述两个时期，最足以表明，恩来同志起到了别人所代替不了的重要作用。

恩来同志逝世后，党内外、国内外对他的一生已有定评，公认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对他也不是没有误解的，误解往往就集中在上述这两个时期。

我以为，应该说，周恩来同志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党受到错误路线危害的最艰难的时期，对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起着特殊重大作用的领袖。

1988年2月

本文未曾发表过。



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9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检阅和交流关于这位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

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为革命无私奉献、为真理刻苦追求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投身于五四运动,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通过比较鉴别,他选中了马克思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且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的时期,张闻天作为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也犯过“左”倾错误。但是,他能够在实践中接受教训,逐渐认识和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直至在长征中率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他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在我党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战略转变中,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制定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方面,他有不少出色的建树。他是我党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核心决策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张闻天长期主持党



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自觉地响应中央的号召,转变学风,主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使他在思想上、理论上更加达到成熟。当解放战争向全国胜利发展的时候,他在党内最早全面地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和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他的正确主张为中央所采纳。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做出许多重要成绩。同时他仍然注意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作了批评党的错误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发言。虽然他因此遭受错误打击,多年间身处逆境,但是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地从事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10年,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保护同志。他以高龄抱病之躯,继续写出一批批判“左”倾错误,探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文稿,为此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回顾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多次党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关头,他作为参与决策和领导工作的人物之一,都曾发挥过独特的杰出的作用,并在理论上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很长时间中,他的许多功绩鲜为人知,或未给予应有的评价。经过历史的检验和党中央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张闻天在我党的历史地位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他的革命业绩、理论贡献和党性修养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在他逝世14年后,在他的90诞辰到来之际,我们隆重纪念他,提倡学习他,推进关于他的事业和思想的研究,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对于党的建设,对于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都是很有裨益的。



这里,我还要着重讲一点:张闻天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刻苦钻研,在我们党和革命队伍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从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不论在什么岗位,不论在何种处境,终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是情况复杂、处境艰难,他越是锲而不舍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精神力量和理论武器。他的理论学习,不是摘取片言只语作表面的征引,而是特别重视系统地攻读马列原著,反复推敲,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会贯通,获取真知,所以他在这方面能达到高深的造诣。张闻天积极响应党倡导树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身体力行,取得显著的成绩。他的调查工作周密细致,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向现实生活学习,善于发现问题,注重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他无私无畏,激流勇进,敢于研究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和敏感的社会问题。他还注重学习理论结合个人思想实际,对思想修养和党性锻炼问题有深刻的论述,他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在严谨治学,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方面,张闻天也是表率。他以严肃求真的态度,科学缜密的方法,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迷信,不迎合,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敢于独立地系统地提出和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他亲自动手搜集和积累丰富的资料,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使研究工作具有坚实的基础。他撰文授课立论精当,见解新颖,逻辑严密,以理服人。他学风民主,平等待人,虚心求教,集思广益。我们大家要学习张闻天的这些优良学风,加强和改进我们的党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工作。

1979年8月,党中央隆重追悼张闻天同志,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为学术界开辟了研究张闻天的广阔天地。11年来,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有关张闻天一生的史料发掘和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迄今搜集到的张闻天撰写的各类文稿共有 600 多篇,2000 余万字,有关他的资料 500 多件,照片 200 多幅。《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回忆张闻天》等书相继出版,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各种报刊已发表张闻天研究文章 130 余篇,回忆文章 140 余篇,其中有若干重要课题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次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收到应征和特约论文 142 篇,选送会议的有 75 篇,选题比较广泛,不少论文的研究水平有明显提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正确评价和学习张闻天。希望大家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交流,更深入地研究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及其丰富的精神遗产,把张闻天研究的学术水平向前推进一步。

1990 年 8 月 24 日在张闻天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本文写作时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的帮助。



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是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同志诞生 100 周年。郭沫若以他战斗的一生、勤奋的一生，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和社会革命实践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外国古典文艺和当代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从早年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开始，郭沫若毕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他总是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活跃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一生，典型地标示了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走过的道路。

郭沫若已经成为一位不朽的历史人物，他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他富有个性特色的思想文化活动至今仍然显示着巨大的魅力，能够给我们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

郭沫若一踏上新文坛便提倡创造精神，为创造精神欢呼。他最早的诗作《女神》就是以创造为基本主题。这个主题蕴含着郭沫若



在五四时期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独特的文化思考。可以说，创造精神是郭沫若毕生在许多活动领域都表现出开拓进取性的重要动力。

那时，郭沫若所追求的创造精神，首先是对于民族文化心态向现代化转换的一种期待。它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具有异曲同工的文化启蒙意义。如果说鲁迅是通过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在精神上埋葬旧世界，郭沫若则是通过对创造精神的高扬来呼唤新世纪的曙光。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逐渐形成了一种抱残守阙、因循苟且的文化心态。青年时期的郭沫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张，“挽救我们中国”要从涵养“美的灵魂”，“提高个人的精神”，塑造“圆满的人格”入手。要“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创造本能”。他认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但具有“注重现实、注重实践”的特点，而且具有“动的进取精神”，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了。他试图唤醒这种进步的文化意识，以破除沉潜数千年的精神混沌，使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

郭沫若自己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的转换，所以他才能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我创造尊严的山丘、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在这诗的语言中，显示的是创新开拓的精神。他的《女神》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审美观念，都标志着诗歌领域的一次彻底革新。

从郭沫若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到可贵的首创精神。郭沫若不是浅尝辄止的人，但他思想活跃，不断转移自己的学术兴趣的兴奋点，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见解。虽然他未必在每一学科领域都建构起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他的学术见解也未必都无



可非议，他却总能独领开拓者的风骚，或是做出独辟蹊径的理论建树。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勇敢地向几千年传统史学观念挑战，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用科学的方法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综合研究，建立了完整的古文字学体系。他从社会史入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批判，使古代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固然首先因为郭沫若接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同样重要的是，他从不株守成说，敢于提出独立见解。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治学的道路上，他都能不断创新，锐意进取。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然身居显位，又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郭沫若并未因此而多几分大人物的矜持，在创作上、学术上仍好标新立异，显出机敏、活跃的思路，时有富于创意的见解。

郭沫若的创造精神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女神》是写给青年的，他与创造社同仁带着青年的大胆、稚嫩，无所顾忌，睥睨一切，突兀而起，踏进文坛。在知天命之年时，郭沫若曾写下这样的题辞：“要永远学习大人物的本领。要永远保持小朋友的心情”。他在《我如果再是青年》这个题目下不仅向青年提出殷切的希望，而且表白了自己“尽可以存心保持自己的一切青春化，尽力和老气斗争”的心迹。青春在郭沫若眼里代表着活力、追求、发展和创造。那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永远向上发展”的精神。

郭沫若不是钻进象牙塔里的诗人，也不是蜇伏于书斋里的学者。他的理想追求不是写在纸上而是渗透在实践意识里。他的创造精神具有深沉的历史忧患感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女神》不仅倾吐了“个人的郁积”，也宣泄了“民族的郁积”，表达了时代的呼唤。“为艺术的艺术”这一命题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反叛



和挑战。他从事历史研究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而“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在思想上还有比较浓厚的浪漫式的英雄主义，那么当他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科学的解释，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他便完全自觉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把自己毕生的活动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焕发出更大的创造激情。

1925年前后，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1926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刻，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加入了南昌起义的行列。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日本的10年间，他始终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命运。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犹如报晓雄鸡的一声长鸣。它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科学终究是要取得胜利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波。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协助周恩来同志担负起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并且撰写、创作了大量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表达了国统区人民的愤怒和意愿，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深刻地指明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把它作为整风的学习文件。抗战胜利以后，在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英勇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进行顽强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长期担负着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夜辛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老而弥坚。在耄耋之年，他以热烈澎湃的激情呼唤“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郭沫若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自我融进时代,而最终确认了自身价值并实现其历史使命的缩影。郭沫若不是完人,他有过失误,但他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这是他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可宝贵的精神。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上,郭沫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士。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保守复古派的顽固阻挠,也有全盘西化论的干扰。郭沫若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能始终保持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从而形成其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这是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至关重要的一点。

郭沫若自己说,他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他虽幼年受过正统的旧式教育,但在少年时便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群学肄言》,林琴南译述的小说,各种新潮杂志,梁启超的新文体及其史学论著,对郭沫若都具有新思想启蒙的意义。留学日本,使他打开了眼界,广泛地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哲学、美学、文学,进化论、个性解放、生命哲学、泛神论,歌德、斯宾诺莎、海涅、莎士比亚。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异域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强烈的开放意识。他在1923年说,“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立的时候了”,我们要“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郭沫若很早便达到了这样一种自觉。

郭沫若不是最早创作新诗的人,《女神》也非第一部新诗集,但他开一代诗风,因为《女神》表现了全新的文学精神和审美意识。这



种文学精神和审美意识是从惠特曼、歌德、海涅，从欧洲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中获得的。郭沫若早年把中国文化看作与希腊文化同一类型，用泛神论的思想来阐释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体系。尽管他的这些论证和见解还很粗疏、幼稚，甚至表现了他当时思想上的混乱，但他把中国文化史放在世界文化史中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却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多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儒家思想表示彻底决裂。郭沫若并不片面地否定传统思想文化，而是把他的开放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鉴别结合在一起。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郭沫若公开宣称自己“崇拜孔子”。可是他同时说明，自己崇拜孔子“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古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他认为，自汉代以后“以帝王之利便为背境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儒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家，孔子也不是原来的孔子。他力图用发展的、开放的观点，努力挖掘古代思想文化中注重实践理性、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正确取向，郭沫若比较了西方的各种学说，终于认定“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反对“义和团”式的排外思想，主张“复兴民族的真谛”在于高扬民族文化的巨大“同化力”，去吸取异民族文化的精华。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同时指出：“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我们都须得尽量的摄取”。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应该是：“对于古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本国的，应该批判的扬弃；对于现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敌国的，应该批判的摄取”。他期望“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

吸收外来文化要经过自己的消化，这是郭沫若文化观的一个



重要思想。他早期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主张,虽然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但随着渐次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他逐步克服了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的偏颇。他从自己的文艺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新文艺需要不断汲取外来文艺的营养,但立足点必须是“经过本民族的创造”,赋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吸收了西方浪漫派艺术的精华,又牢牢植根于民族审美意识的沃土上,显示了成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对于马克思主义,郭沫若也同样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使它中国化”,才能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取得胜利。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来救中国。但一切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但它一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纯粹的翻译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它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在他的创作和研究领域中,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做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作的努力,是他毕生中的重要贡献之一。

三

不断探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把科学求实的态度贯注在人生



的各个方面，是郭沫若身上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郭沫若从一个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无产阶级文化巨匠，就是在不断探求真理，不断扬弃旧我中实现的。尽管这条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曲折甚至是痛苦，但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下上而求索”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光明坦荡的大道。

追求真理是要有勇气的，因为其中包含的自我否定常常伴随着精神上的巨大痛楚。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因为无法面对这种痛楚，怯而不前或踟蹰徘徊，落伍于时代。郭沫若具有这种勇气，亦有执著于真理的热情，所以他总是敢于面向现实和人生坦露自己的灵魂。那不只是诗人的一份真诚，而且是向时代挑战的一颗赤子之心。“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求”，这曾经是五四时期困扰着郭沫若的一个矛盾。他既想成为肩负社会使命的斗士，又怀着一个浪漫诗人的纯艺术梦想。但这种困扰并未成为羁绊他前进步伐的心灵桎梏。《女神》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凤凰涅槃》是在死而更生的一场熊熊烈火中歌唱自我和民族的新生。《天狗》一诗峻切地表达了诗人企望通过旧我的彻底毁灭，实现“开辟鸿蒙的大我”的理想。当严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郭沫若心中诗的梦境以后，他很快便从“昂首天外”而俯身于“水平线下”，去切身体味、感受社会底层人民的辛酸、血泪、希求，并且以这种社会实践为契机，开始从理性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毅然决然地清算了自己和创造社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中的个性本位的思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表示：“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尽管这一诀别还带着对于个性主义某种感情上的依恋，但是他说，



“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的生命”。于是首先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而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郭沫若就是从对自我的又一次否定中实现了世界观的改变，并切切实实地把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无产阶级人民革命事业里去，“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大家知道，以郭沫若的聪颖和才气，他不难坐享诗人、学者或其他什么家的盛名，但他却不断踏上更为艰难的人生旅途。郭沫若一生中每一种选择或每一次探求，都是出于追逐真理、追求发展的热情和勇气。没有这一腔热情、这一股勇气和这样的实践努力，他可以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或睿智的学者，却不一定成为新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探求真理需要不断破除思想上的僵化、保守，永远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人生之道如此，学问之道亦如此。郭沫若做诗、做学问有一种浪漫气质，但他面对科学又能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任凭感情冲动轻率从事。有人曾感慨史学家笔下的屈原抵不住郭沫若历史剧中屈原的形象，其实郭沫若塑造的屈原形象是基于他对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和对历史精神的独特理解，那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郭沫若一贯主张学术研究既要掌握正确的历史观点，又要充分占有可靠的材料，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他花费很大精力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初衷并非另辟学科领域，而是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准备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他的许多翻案文章，也是在充分掌握了史实、史料，在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郭沫若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或失误，即使在拥有一种权威的身份之后。无论做人还是治学，他都力图在不断批判谬误、补正不足中达到真理的境界。郭沫若著作的版本之多在现代出版界是少



见的，这固然有某些时代方面的原因，也充分表现了郭沫若在主观上勇于自我批判，勇于修正错误的努力。郭沫若曾经对鲁迅怀有深深的误解，并且以刻薄的语言讥讽，但当他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之后，就充满炽情地喊出“大哉鲁迅”，并且非常中肯地总结了鲁迅的精神。在史学研究中，他也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论证、观点的不足，譬如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在鉴别史料上不够慎重，在方法上有公式主义的毛病，套用西方古代社会的模式来论证西周的社会形态，他曾对胡适、顾颉刚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工作估计不足等等，这些都在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和补正。这种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使郭沫若具有非常民主的学风。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曾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

今天在这里纪念郭沫若，我们面临着一个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历史性时刻。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我们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弘扬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郭沫若那种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开放拓新的意识，执著探求真理的热情和科学求实的作风，对于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学习的。我们正置身在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应该像郭沫若那样投入自己全部的激情和才智，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科学文化。

1992年11月14日在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文写作时得到蔡震同志帮助。



追怀黄洛峰同志

黄洛峰同志在 1927 年 18 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为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工作了半个世纪，直到 1980 年逝世。我这里想说的，主要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这也是我和洛峰同志工作上很接近的一个时期。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经过淞沪战役后深入内地，但是上海的进步文化界仍有人在“租界”地区内坚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时，上海的出版工作方面至少有两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一是出版了《鲁迅全集》；二是出版了《资本论》的全译本。后者就是洛峰同志主持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功绩。抗战爆发前两三年，在柳湜、艾思奇两同志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的基础上，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洛峰同志担任总经理。出版社除出了《读书生活》和《认识》两种杂志（均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后一种杂志好像只出了两期，现已很少为人所知，然而很有分量的一种杂志）外，还出了若干译著。它的出版物在读者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革命思想，所起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它只是个小规模的出版社。对它说来，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下刊印《资本论》那样的大书，显然是件很吃力的事。当这部书在上海印出来的时候，武汉已经沦陷。洛峰同志又想方设法、千辛万苦地把印成的书运到重庆。1939 年，我们在重庆拿到在当时说来装帧很讲究的这三大卷书的时候，实在感到高兴。



这固然要感谢译者郭大力、王亚南两位同志的辛勤努力,也不能不归功于出版者的毅力。

从1939年直到抗战结束时,洛峰同志在重庆工作,人们称他为“黄老板”,因为他一直经营着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称读书出版社)。这期间,我只在1941年离开重庆一年多。1942年后,当我在离城十几里路的《新华日报》工作的时候,每次进城,几乎总到“黄老板”的住处。他的住处也就是他的出版社的社址。那几年里,党的南方局文委和出版界的联系很大部分是通过洛峰同志的。

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一个出版社实在简陋到极点。“黄老板”的出版社既无编辑部(抗战前在上海时还有个编辑部),更谈不到有印刷厂,也经常没有门市售书的地方。但他要做的工作非常艰难而复杂。为了取得一些印书的纸,为了找到代为印刷的厂家,为了使印出的书能送到读者的手里,都要费尽精力。他和组成他的出版社的很少几个同志,一起来做这一切工作。他还要自己同作家们联系,还要尽可能团结那些非国民党官方的、也在不同程度受到歧视的出版商。此外,还必须应付特务以各种手段进行的干扰和压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在党的领导下并肩作战的三个兄弟出版社。到1941年初,生活书店的所有在各地的分店都被当局查封。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重庆以外的一些分支店,在蛮横的压力下,也只能或者关闭,或者改用别的名称。三家出版社只在重庆一地还勉强存在着,但工作条件越来越困难。

人们都知道,在抗战以前的10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文化“围剿”,其实这种文化“围剿”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继续进行着。人们又往往以为,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就是出版许多反共的书籍,发动反共的舆论,其实它对进步的革命文化的



“围剿”并不只是运用文化的武器,而且更多地使用文化以外的手段。黄洛峰同志这样的战士就负担着同这种超文化的手段作斗争的任务。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这些战士是不可缺少的。洛峰同志是性情非常耿直的人。但他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不能不耐心地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

革命的文化,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符合于历史进步的要求,所以任何反动力量摧残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无论在10年内战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失败了。在想到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文化的艰难发展历程时,我们忘记不了为此做出了贡献的许多出版战线的战士,其中就包括黄洛峰同志。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11月3日。



纪念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他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他逝世的 1980 年。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古史考订、古文献考订、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这个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一定会用许多出色的论文来纪念顾先生。我没有资格全面地或就某一方面深入地评价顾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我想从顾先生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说起。

颉刚先生被认为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这是因为他在 1926 年编著了《古史辨》第一册的缘故。为辨明古史，顾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受到很多人赞扬，也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和怀疑。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在一个时期对此至少是不重视的。

郭沫若在 1930 年时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辩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作伪之点



大体是被他道破了”^①。我以为郭老的这段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顾颉刚先生之说的正确态度。

我在1957年曾仔细阅读了《古史辨》的第一册和以后各册，得出了一些看法。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我还以为，“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

学术界里曾有人主张史学即史料学，即把史料学看作史学的全部内容，他们从这个意义出发推崇“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为这是“史学的中心题目”。我认为这种夸大的说法会损害历史科学，以致使得“古史辨”这样的工作反而不易于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

把“层累地造成古史”观看成是史料学范围内的问题并不是降低了其意义，因为史料虽不是史学的全部内容，而是史学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历史发展的科学论断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个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

把“层累地造成古史”观看成属于史料学范畴，是符合于顾颉刚先生本意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先生说，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辨古书是为了辨古史，所以这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附录：《夏禹的问题》。



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古史辨》第四册《顾序》又说：“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在分工的原则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用得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的‘上达’。……我们正为着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这段话很可注意。这话表明颉刚先生很早就表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情，并且认为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需要有确实可靠的史料辨别工作作为其基础，这个意见是对的。

颉刚先生用“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进行古史传说的考辨，做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由于新的考古资料出现，他的有些看法固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的基本观点的确如郭老所说是个卓识。这个观点看来不仅对古史，还在别的方面有用，顾先生在民俗学里卓有成效地运用了这个观点。我看甚至在当代史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强调对领袖人物的记述一定要严谨。我看如果搞得不好，也许会形成越是后来的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描述得越具体、越生动，但越来越多地掺入附会的、出于想象的，甚至编造的材料。

我说以上这些还不是全面评价“古史辨”的工作，我只是由此想提出一个问题：在学术界里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有一种态度，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对非马克思主义只能批判、反对、驳斥。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革”曾把这种态度发展到极点。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工作有价值，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重视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引导研究者达到正确的结论，



但是不能以为，只要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结论就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以为，凡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都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事实。前一种看法之错误有事实证明，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犯过错误。后一种看法之错误也有事实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凭空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他们从前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正确的意见和有用的思想资料，而前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都只不过是错误的堆积，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似乎就完全可以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非圣贤之书不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自己读的当然不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列宁如果只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写不出帝国主义理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读非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无法进行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常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有用的东西，例如“第三产业”的概念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是分析批判的态度——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否定其中无价值的东西。一笔抹煞的否定是不对的，只否定不吸取是不对的，甚至应该说，否定是为了吸取，在一定的意义上吸取比否定更重要。

我们现在都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平地上建起，一定要吸取人类以往的全部文化，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中的最高阶段）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遗产中学习，还要从当代世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中学习，当然应该是有批判有分析的学习。我想可以这样说，不从世界一切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经验中学习，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善于接受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遗产，不善于



从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不能发展的。

顾颉刚先生很早就表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他追求进步,即使在“文革”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20年代起60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有益的,当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工作的成就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所提供的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93年5月7日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00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革命的出版家徐伯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武装斗争，但也需要有其他战线的工作相配合。文化战线是这些战线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说到文化战线，我不能不想到出版工作。党所直接经营的许多出版社和党外进步的出版家所做的工作，对于革命文化的传播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及其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伯昕同志长期致力于革命的出版事业。他是邹韬奋同志的亲密的合作者。在1926年韬奋开始主编有名的《生活周刊》时，伯昕负责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1932年，在这周刊为读者服务的书报代办处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伯昕担任书店的经理。他们一起作为爱国主义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通过抗日战争烈火的锻炼而成为共产主义者。韬奋不幸于1944年过早地逝世。伯昕既是韬奋生前最得力的助手，又是他的事业的有力继承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伯昕继续主要通过出版工作来为中国人民大革命服务，忠实地执行了党对出版事业的要求，直至新中国成立。在这以后，伯昕除了为建立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外，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伯昕一生的劳绩，并不限于出版事业，但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作为革命出版家的徐伯昕，这是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确实做出



了杰出的成绩。

30年代初,《生活周刊》在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以前,最高发行数字达15.5万份,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新纪录。这当然是因为这个周刊宣传抗日救亡,站在爱国舆论第一线的原故,而伯昕善于经营,善于通过各种发行渠道联系广大读者的能力,这时已表现得很突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内的革命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的政治压迫,又苦于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处境的困难是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伯昕在这种困境中千方百计地从事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不因任何挫折而气馁,不为任何困难所压倒。他不仅主持在读者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生活书店,而且支援和协助其他进步的出版单位。在生活书店备受摧残以至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仍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运用各种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散播革命文化的种子。在他身上,可以说,既有“生意人”的精明,又有革命家的胆略和远见,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出有效的斗争方式。在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伯昕这样的出版家是起了特殊作用的。

在这本集子中汇集了伯昕生前的友好和共事者的一些文章,也收入了伯昕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伯昕的为人和他的工作作风,可以看到伯昕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出版家、革命实业家。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并且富于创造精神。现在,在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全面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需要无数这样的实业家。特别在经济战线上的同志,既要真正学会做“生意”,又要真诚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对于现在的实业家说来,在改革和建设的新的条件下,学习前辈的精



神并利用他们的经验，也是很必要的。我认为，从事出版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志，都可以从伯昕同志的一生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1986年8月

本文是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
《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作的序言。



怀念周建人同志

今年11月12日是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民进中央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会，追思这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缅怀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我谨代表全国政协对周建人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向建老的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

周建人同志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经历了自清末以来各个不同时代，最终无私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他生于清末，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年轻的时候，他受到胞兄鲁迅先生的影响，对光复会、同盟会和秋瑾、徐锡麟、孙文、陶成章、黄兴等革命家十分仰慕，并萌发了“只有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彻底改造社会，人才能合理地生活”的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跟随鲁迅一起，参加了家乡的武装演说队，迎接绍兴的光复。1919年底，周建人和母亲一起随鲁迅到北京，不久进北京大学旁听，攻读哲学和生物进化论，这对他以后接受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早在1923年，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时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沈雁冰、瞿秋白、杨贤江、侯绍裘等有密切交往，与瞿秋白夫妇更是莫逆之交。他曾应瞿秋白、杨贤江、侯绍裘等人的邀请，先后到上海大学、神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以及松江女子中学



任教,讲授进化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侯绍裘等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周建人义愤填膺,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从而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年秋,鲁迅先生到上海定居。周建人跟随鲁迅同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并常为鲁迅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担任通信联络,做掩护工作。后来他又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上海分会的调查委员,参加调查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罪行,搭救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抗日战争时期,周建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和一批留居在“孤岛”上海的文化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学习《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这个读书会常在他的寓处举行。上海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到重庆,留在上海的职工很困难,当时周建人又患肺病,贫病交加,但他坚持抗日,拒绝为任何汉奸买办报刊写稿,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关怀。

抗战胜利后,周建人同志又积极投身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他以笔为武器,在进步报刊上大量发表揭露、抨击国民党倒行逆施罪行的文章。他主编的《新文化》杂志,是当时在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1945年底,他与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且成为该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还当选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在统治区内不断制造暗杀暴力事件,白色恐怖异常严重。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48年4月,周建人同志义无反顾,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建人同志还是位著名的生物学家、著译颇丰的学者。他没有正规地上大学,依靠自己刻苦攻读,自学成才。他经人荐举于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直到1944年。他和党所领导的进步出



版社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有密切联系。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主编过中小学动植物学教科书和自然科学小丛书。他研究自然科学和写作文章是和他从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曾经常为鲁迅主编的《语丝》写稿,又是潘梓年主编的《北新》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曾以乔峰、高山、克士、松山等笔名,发表过大量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并较早地翻译了达尔文《进化与退化》、《生物进化论》等书籍,鲁迅先生称这些译作不但可以“见得最近进化学说的情形”,也可以“见中国人将来之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建人同志担任过国家政府部门的许多领导职务,但他始终保持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1950年前后,我曾有幸和建老在国家出版总署共事。他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同志满腔热忱、和蔼可亲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建人同志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也是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副主席。他还担任过民进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职务,并曾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周建人同志忠实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同各党派人士合作,善于团结同志,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长者。

周建人同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一生,是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建老身上集中了我国知识分子的许多宝贵的品质。今天我们纪念周建人同志,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不断追求真理的崇高品德和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民革命事业的精神。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更要学习建老坚信马列主义、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立场,与党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振奋



精神,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宏伟目标做出我们最大的贡献。

1988年11月11日在民主促进会中央举行的
周建人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胡愈之同志的工作精神

胡愈之同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特别为人民的革命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在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史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业绩，但实际上他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起了别人所代替不了的作用。

愈之同志生于1896年。他在1914年脱离学校生活进入社会。他自己说过：“我只读完中学二年级，是以学徒或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的”^①。年轻的愈之同志利用商务印书馆的环境努力刻苦自学，博览群书，还自学英语、日语、世界语，同时也在认识社会，探索人生的道路。在他开始当学徒或练习生之后10年，他竟然在实际上负责主编《东方杂志》。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最重要的杂志，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杂志名义上的主编是钱智修，但他因年老不大管事。《东方杂志》在1925年为五卅运动出版了一本临时增刊，详细报道五卅事件的经过，唤起群众的爱国运动。这个老牌杂志采取这样积极的态度，对五卅运动的兴起是有一定作用的。这个杂志已有二十来年的历史，长期间在政治上很保守，但在1924—1927年间有些新气象。我曾经以为这是受到当时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的缘故。当然这是总的原因。但如果不是愈

^① 见胡愈之著：《怀逝者》，第48页。



之同志在那里负责实际的编辑工作,这个老牌的杂志恐怕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愈之同志这几年主持《东方杂志》,发表了当时已知名的进步作家如鲁迅的作品,也为新的著作家的成长提供了园地。

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中,愈之同志虽曾参加上海工人群众的斗争,但还没有明确决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他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目睹反动派对上海工人群众的屠杀,这使他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他立即起草了对国民党的抗议书,邀集郑振铎等人署名公布。因此,他受到反动派黑手的威胁。他和郑振铎都不得不相继流亡出国。1928—1930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艰辛地度日子。1931年初,他经由苏联回国。

1933年9月,愈之同志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在欧洲的3年,深入地了解世界形势,并且研读马克思主义。当他回国后,如他后来的文章所说,目睹“白色恐怖达到最高点的情况”,并且看到不少曾经叫喊革命口号的知识分子,禁不起时代的考验而变节,为此极为愤慨^①。但他不因为这些情形而退却。应该说,当愈之同志入党前几年间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完全不考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个人的安危,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加入党的队伍,并且从此在他一生中坚持这个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

1931年回国后,愈之同志写了《莫斯科印象记》。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是最早客观地生动地介绍苏联状况的作品之一,在当时进步的青年中广为流传。这本书是先在一个与国民党有关系的文人办的杂志上发表,然后又在发行这个杂志的书店出版,因此这本书居然未被禁止,而且多次再版,起了很大的影响。愈之同志在1932

^① 胡愈之作《伟大的爱国者——韬奋》,见《韬奋的道路》一书,第133页。



年被王云五正式聘为《东方杂志》的主编。1933年1月出的《东方杂志》刊载了一个叫作“新年的梦想”的专栏,其中有些文章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反动统治,轰动一时。由于这个专栏,王云五辞退了愈之同志。后来,愈之同志回顾说,当时其实是可以不搞这个“梦”的专栏,以保持《东方杂志》这个阵地。不过,“梦”的专栏中其实包罗了各方面的作者,革命作家只占极少数。由此也可见,当时编辑杂志是多么不容易。

虽然编这个“梦”的专栏是失算的,但我以为,应该说,愈之同志在30年代前期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是较少受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的思想的束缚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愈之同志曾参加一次党组织为筹备成立“苏联之友会”而召集的会。愈之同志在会上发言,认为应该促进中苏邦交,联合苏联以利于抗日。而当时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成立“苏联之友会”所设想的宗旨,却是号召全国劳动者“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苏联之友会”后来并未建立)。愈之同志在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公开出版的杂志上写文章提出“民族抗日”的口号,主张动员和团结全民族一切爱国力量,孤立和瓦解国民党政权,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这个主张在当时形势下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并不符合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调子,因此党的地下刊物甚至把愈之同志看作“拥护国民党的反动派别”的人物,点名进行抨击^①。愈之同志之所以没有能更早一点被吸收为党员,和上述情况是有关的。

愈之同志当时在文化活动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团结和鼓励许多爱国的、正直的文化界人士。他们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可

^① 见1931年10月《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政府》一文。



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或者是可以成为同情者的。争取和团结这些人士,不对他们的工作提出过高的要求,但逐步帮助他们进步,这在当时实在是很重要的事。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党在30年代前期按照“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这种错误想法,很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而愈之同志在入党以前和入党以后,在这方面实际上突破“左”的樊篱,出色地做了许多工作。到了30年代后期,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后,他致力于推进救亡运动。他在救亡运动中团结文化界的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35年党的《八一宣言》发表以前,愈之同志在上海通过他的朋友杜重远,同东北军中的一些知名人士接触,说服他们同意和共产党合作抗日。这时在上海的党组织已严重被破坏,和愈之同志联系的党员已离开上海,因此他到香港找到这个同志,并受命秘密到法国和苏联,向在第三国际中的中国党的代表团报告这些情形。虽然东北军和党的合作已通过别的途径在进行,但愈之同志在上海时所做的工作也是有影响的。

在文化界中,章锡琛、夏丏尊等主持的开明书店最初是在愈之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创办的。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的发展更是同愈之同志的影响分不开。30年代后期在上海出版的许多有影响的杂志,如《文学》、《太白》、《世界知识》、《译文》、《妇女生活》,大都是在愈之同志的联系和筹划下创办的。

愈之和韬奋的友谊是感人的。1931年愈之初认识韬奋时,韬奋所编的《生活周刊》的内容虽然主张抗日救国,但仍限于政治改良主义,而且“还带些低级趣味”。但愈之发现,如他后来在纪念韬奋的文章中所说,韬奋具有真诚的爱国热情,在文雅的仪表下有一



副硬骨头,而且从善如流,虚心学习^①。因此他积极地帮助韬奋改进《生活周刊》,韬奋也把愈之看作最可靠的朋友。韬奋终于进步到共产主义者的水平,有他自己认识的基础,但愈之对他的帮助是有很大作用的。在愈之的支持下,韬奋还在1933年建立了在以后十几年间的进步文化运动中起重大作用的生活书店。愈之同志是党内最早重视韬奋所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第一个人。

从愈之同志在30年代的工作中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特点。他孜孜不倦地为人民革命的事业,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当然不是为谋什么私利,而且不居功,不图名。生活书店是在他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他并不在书店里担任任何职务。当1933年7月韬奋被迫出国流亡后,愈之同志是《生活周刊》的实际主编人。当《生活周刊》终于被国民党查封时,由杜重远出面主编出版《新生周刊》,愈之同志又全力参加编辑工作。《世界知识》这个杂志创刊后,有一段时期是愈之同志主编,但他从未署名。他是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的救国会的最初组织者。他是当时的进步的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最积极的组织者之一。他做的许多工作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后来他也从不和人谈起自己做过的这些工作。

我在30年代后期还是上海进步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学生,正在开始写作,那时我不认识愈之同志。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认识他的,并且逐渐从别人口里知道他在30年代上海文化工作和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我把他看作可尊敬的长辈。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出版总署署长,我曾有一个短时期在他领导下和他共事。我感到,他一贯保持着30年代他的工作精神。

愈之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先是在武汉、桂林工作,继又按照党

^① 胡愈之作《伟大的爱国者——韬奋》,见《韬奋的道路》一书,第134页。



的要求,出国到新加坡从事报业工作,太平洋战争后,他在南洋经历了九死一生后才回祖国。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的发展,为统一战线的发展积极工作,也有卓越的成就。这些我不想在这里说了。我以为,从愈之同志对 30 年代文化工作的不大为人们所了解的贡献中,最足以显示他一生奋斗的精神,因此我愿意在这里据我所知的说一下,以表示我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和追怀。

1988 年 2 月 19 日

原载 1989 年 2 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
《胡愈之印象记》。



怀念侯外庐同志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怀念去年9月逝世的侯外庐同志。外庐同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杰出的理论学术工作者。在座有几位是和他同辈的学者；对于我们多数人说来，他是我们所尊敬的长者。他的治学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纪念。他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业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很有价值的遗产。

我最初知道侯外庐的名字是在1937年以前。那时我在上海得到了他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视为珍宝。我还记得那是印刷装订都较粗糙的一厚本。马克思的这部不朽的著作在这时才第一次有第一卷全译本。近来我读到外庐同志的回忆录时，才知道他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用惊人的毅力来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他在1927年以勤工俭学的名义到法国，虽然在巴黎大学文学院听过一些课，但主要还是自学。他说：“我不谋任何学位，但求学会翻译《资本论》的本领”。他只能靠菲薄的经济条件来维持他和他的夫人在法国的生活。他不可能从事什么有报酬的劳动，因为他要用全部时间来学习为翻译《资本论》所必要的知识。他说：“我在法国试译的阶段以及后来在回国重译的过程中间，通过自学补充的知识，除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几十年后，



外庐同志在回忆这段时期所下的苦功时说：“回想起来，多亏了为翻译《资本论》所承受到的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有机会，也未必会有同样强大的动力，去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可见外庐同志为了翻译这部巨著是花了多大的苦功。

经济条件使他不可能再在法国住下去。1930年他回国后继续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当然，他仍得不到从容的环境。他是在政治压迫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还曾在1932—1934年被捕入狱。在共产党内，虽然有成仿吾、陈翰笙等同志鼓励和支持他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但他受到“左”倾领导者的冷遇。他除了在王思华同志的合作下译成和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外，还译出第三卷的一部分和第二卷的大部分。直到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二位的三卷全译本出版时，他才停止这个工作。

外庐同志的回忆录以《韧的追求》为书名，这当然是指他的一生。但只从翻译《资本论》的10年经历来看，的确无愧为韧性的斗争。

我认识外庐同志是1939年在重庆。那时，我除了知道他是《资本论》的译者外，还把他看成是位政论家。他在1934—1935年间已开始社会史、思想史的研究，但我那时还没有读到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我所读到的是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抗战建国论》两本书和杂志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外庐同志是个学者，当然不是“学究”。他做学问的确费尽心力，决不草率从事，但他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和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从事学术研究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的理论工作是同现实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关乎民族的存亡和前途的抗日战争爆发时，外庐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战士投身到现实的斗争，而且



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现实问题的探讨,这是很自然的。他“开始全力投入史学方面的著述”,如他自己所说,是在1941年。但在这以后,他仍然常常研究现实问题,并且在他的史学著作中表现出他对现实的斗争的关注。

外庐同志在1941年后全力从事史学著述,是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的鼓励不可分的。除在一些集会上外,恩来同志曾单独约了外庐同志晤谈。外庐同志在1942年底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没有接着进行秦汉以后的研究,而先进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著述,就是接受了恩来同志的建议。恩来同志总是同学术界人士做朋友,他充分考虑到他们工作的特点,给以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和他们商量如何做工作,而决不是发号施令。无怪乎外庐同志的回忆录中用相当多的篇幅,以感激的心情写到恩来同志。

外庐同志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自己说,在1926年以后,“我的思想和行动都较为自觉地站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左派方面来了”。从此,他一贯坚定地抱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显然,他以10年之久刻苦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是由这种信念出发的。这工作不但无名可求、无利可图,而且必须准备冒许多风险。这种信念贯彻在他一生的全部理论研究工作中。他在回忆录中说:当1938年他确定不再翻译《资本论》后,他“没有片刻的颓唐或彷徨”,因为“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我能做的工作,有责任去做的工作还多呢”。可见他是把他的全部理论工作看成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没有妨碍外庐同志在学术研究上独立思考,提出独创的见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没有使他流于浮浅和教条主义。他说:“我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



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他是发扬了乾嘉学派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又批判地继承了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的。

这里我想说一下 40 年代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的一种可贵的作风。外庐同志对郭沫若同志是极为尊重的,他再三说到郭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他的启发。郭老也很重视外庐同志的研究成果。但是外庐同志并不因此而不对郭老发表不同意见。他曾在屈原的评价问题上同郭老辩论,在孔子的评价问题上也同郭老立异。这些都不妨碍他同郭老的友谊和他对郭老的尊重。大家又知道,外庐同志在古代史分期看法上同翦伯赞同志有分歧,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的。外庐同志在回忆录中深情地描写了伯赞同志。他这样说:“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我和伯赞的分歧一辈子都没有解决,不能说由此没有一点隔阂。但是可以说,他和我一辈子都是相互了解的。他了解我的论点的特点,了解我的为人和脾气,就如同我了解他的思想方法,了解他的品格和性格一样。我们确乎是真正认识对方价值的”。我在 1947 到 1948 年间,在香港同侯、翦二位过从甚密。我感到外庐同志对他们二人间的关系的描写是非常恰切的。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这样复杂的现象时,意见分歧是难免的。如果一下子大家都在任何问题上一致,反而是不正常的了。外庐同志回忆录中说:“重庆时期,就拿史学来说,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可能大相径庭,对具体疑难问题的歧见,更俯拾皆是,甚至文人中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相轻陋习,不利团结的闲言碎语……也都存在着,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



争。那时,即使对待旧学者,也大抵坚持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性的批判态度。我们这支队伍正是在这种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科学而深入的研究中成长起来的。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周恩来同志对学术界深入细致的、高水平的领导”。外庐同志把这种良好学风的形成归功于恩来同志的领导,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这几位老一辈学者的科学态度。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上起着拓荒者的作用。他们认真地进行研究,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除了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别人的见解之间的区别以外,决不企图用别的方法压倒异见。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态度。当然,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对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的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抹煞、贴标签、扣帽子,而是充分掌握材料,言必有据,结合社会史的发展而进行的分析研究。外庐同志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对于他们称为“异端”的思想家用力最勤,发掘了一些不为一般思想史、哲学史所论述,甚至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思想家。这方面的功绩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中国思想史出现了新貌。

外庐同志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许多独创的见解和他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已为学术界接受,也有一些论断在学术界中仍有争议。我没有能力在此具体地评论。我想说的是,后来的研究者,纵然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看法,但都不能不重视他的研究成果,从他和他的合作者的大量著作中吸取养料。

1988年11月29日在纪念侯外庐同志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和叶圣陶老人与《中学生》

《中学生》杂志创刊于 1930 年。那时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我对《中学生》的印象很深。它创刊时，我就是它的读者。50 多年前它的创刊号封面，我还记得。我很早就在《中学生》上投稿。那时《中学生》上有“读者之页”的栏目，我在那个栏目里投过稿，写的什么题目，用的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

《中学生》是我的老师。我从《中学生》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文化的知识，又有生活的知识。最近有位老同志写了一首诗给我，其中有两句“最难法国公园夜，织女牛郎共举杯”。他注释说：1937 年，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园里，我和他一起看天上的星座，我教他认识了牛郎星和织女星。我认识这两个星，就是在初中时候从《中学生》上学来的。那时《中学生》上每期有一篇教人认识星象的文章，记不起是哪位作者写的了。我和几个同学按这些文章的指点，认识了大熊星座、小熊星座、牛郎、织女星等等。

因为给《中学生》杂志投稿，我认识了叶圣老。1943 年叶圣老 50 岁时，我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祝圣老 50 寿辰的文章，讲到他教我写文章，给我改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学生》杂志从上海搬到内地，先后在桂林、重庆出版，也起了很大影响。我在上面写了一组讲历史的文章。1946 年，开明书店给我出版了一本书，叫《二千年间》，就是由这些文章编成的。最近，我读到叶圣老的《我与四川》这本书，书中有他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桂林时写的日记，那时我也在重庆、桂林。这使我回想起许多事情。圣老在重庆，曾由我陪同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和董老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抗战结束后，圣老到了上海，《中学生》又在上海出版。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同志安排上海的工作，他要我把出版界和杂志分成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三类。第一线像《文萃》那样的杂志，是很快就会被国民党查禁的。第二线是一些还可以维持一个时期，到了某种时期，也有被禁止的危险的一些杂志。《中学生》和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该尽可能存在下去。总理的这个安排，我和圣老谈过，请他尽力维持开明书店，维持《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越来越严酷的情况下，《中学生》多登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文章，还是可以在青年中起促使他们进步的作用。后来《中学生》一直维持到上海解放，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给了青年有益的教育。

1947到1948年，我去香港，仍然同在上海的圣老有联系。我写了一组谈思想方法的文章，陆续寄给圣老，他给发表在《中学生》上。后来出了单行本，叫《怎样搞通思想方法》。

回顾起来，我和《中学生》的关系可说很深，它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曾给我机会，让我为它做了些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时期都有很多青年学生受过《中学生》的教益，《中学生》给了他们许多着着实实的有益的知识。那时《中学生》虽然不是直接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是在促进青年思想进步，推动进步文化方面，确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叶圣老和其他几位先生为培植这个杂志花了很多心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庆贺俞平伯先生 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祝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俞平伯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积极参加进步的民主运动。此后，对党是一贯亲近和拥护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8 年和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起的 37 年中，在任何环境里孜孜不倦地从事对人民有益的学术活动和文艺活动，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早在 20 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 1954 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



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做出任何“裁决”。1954 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在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的时候,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俞平伯先生从 1953 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我们全院同志所尊重的一位老学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很好地吸收利用和发展俞平伯先生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敬祝俞平伯先生健康长寿,并且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1986 年 11 月 20 日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同志审阅过这篇讲话稿。



纪 念 唐 弢

我和唐弢同志相识虽早，但往来较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85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后。

抗日战争以前，即1937年以前，唐弢就因在《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杂文，风格极似鲁迅而闻名。那时我虽也在上海，但没有见过他。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在“孤岛”上海工作，而我主要是在大后方。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我才在上海认识他。那时，他和柯灵共同主编《周报》。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上海，至少有3个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压制民主、发动内战，把时局真相告诉群众，鼓舞群众在任何情况下坚信能够用人民的力量争取光明的未来的刊物。其中一个就是《周报》，另两个是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和黎澍等编的《文萃》。对后两个刊物我写的政论文章较多，但我也曾应《周报》约稿写过几篇。我到《周报》编辑部遇到的多半是柯灵，较少见到唐弢。这3个刊物都在1947年初相继被迫停刊了。

唐弢同志是在30年代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战士、学者。他一生在文化园地辛勤耕耘，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他的杂文、散文和其他文章，他对鲁迅的研究和对文学史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



们要学习他一贯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而战斗的精神，学习他的严谨的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1992年3月3日在唐弢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词。



《杨康华回忆录》序言

《杨康华回忆录》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康华同志是广东的一位老同志。他在30年代投身革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并向华北和全中国伸展它的侵略势力。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加紧镇压革命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共广东地下省委由于屡遭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1934年被迫停止组织活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时确实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20岁左右的康华同志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寻党的领导。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康华同志扛着大旗，走在广州爱国学生示威队伍的前列。不久，他找到了党组织，开始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历程，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东南特委宣传部长，香港市委书记，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做了不少工作。在香港为日军侵占后，康华同志奉命撤至东江地区，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总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尹林平、曾生、王作尧同志领导人民抗击日寇，为创建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与率部北撤山东解放区，并在两广纵队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他随军南下，协同兄弟部队解放广东。新中国成立后，康华同志相继任中共珠江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教



部长，曾两度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并兼暨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为广东的建设事业，尤其是为文教、科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卓著成绩。

康华同志献身革命事业 50 多年，始终矢志不移，坚持斗争。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1982 年，他从广东省副省长的职务退居二线后，任顾委副主任，还任省委党史领导小组顾问。他仍以一个老党员的崇高职责要求自己，力争为党和人民多出一分力，多发一分光。特别是对党史、老区建设、革命传统教育、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关心，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我和康华同志相识始于 1942 年春。那时东江游击队奉党中央之命，全力抢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 300 多人。我于此时由香港到达东江游击区，见到了游击队的领导人曾生、尹林平、王作尧、杨康华等同志和在此指导工作的张文彬同志，并在游击队中逗留了几个月。康华同志主持政治部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他工作的魄力、作风以及坦诚的品格，给我和当时路过东江游击区有机会和他结识的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 1966 年开始的那场浩劫中，东江游击队竟遭到毫无根据的诬蔑，甚至连我这曾路过的人似乎也因此犯了什么罪。在那场浩劫快终了时，我和康华同志在北京相见，分外感到亲切。以后十几年间，我们或在北京，或在广州又多次见面。康华同志曾对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看法。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当史学界中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中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似乎应该改变一下，对此，康华同志深表反对。在这问题上我同意他的看法，还曾为此给他写过一封信。1990 年康华同志参加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我们又一次相聚，可惜时间匆促，没有多谈，不料这一次分别竟成永诀。他于 1991 年 10



月 31 日去世,令我痛惜!

康华同志的回忆录是他近年所撰写的许多党史文章中最重要
的著述。它不仅记述了康华同志的革命经历,而且反映了那一个时
代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在那苦
难深重的漫漫长夜,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党的指引和领
导下探索前进的。他们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斗争,
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从单纯的爱国者锻炼成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
应该说,康华同志是大革命失败后在华南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
子中的一位代表。

这本回忆录还记述了中共广东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些重
大活动;描绘了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推翻
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的战斗历程;讴歌了廖承志、张文彬等无
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廖、张二人在
1942 年被捕,张死在狱中)。康华同志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我相信,广大的读者将会从这本书中得到教益和启迪,故为
序。

1993 年 1 月为《杨康华回忆录》作的序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吕振羽

今天能参加吉林大学举行的吕振羽同志纪念室揭幕和吕振羽史学研讨会,感到很高兴。正如刚才吉林大学校长所说的,吕振羽同志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为教育事业工作,特别是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很多贡献,永远值得纪念。

大家都知道,吕振羽同志参加过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来到北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国际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从30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继郭沫若同志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吕振羽同志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当时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时期,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吕振羽同志进行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和当时革命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的。现在看来,包括郭老、吕老以及其他史学家前辈翦老等,他们的古代史研究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革命失败时,马克思主义确实在中国已经生长起来了,但是要继续发展,那就必须中国化。教条式地理解不行。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的。郭老、吕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与解决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如何前进的问



题密切联系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问题上,社会上有着各种错误的议论。为了驳斥这些错误议论,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就要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当前社会性质,研究古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郭老、吕老的科学研究正是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紧密结合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要求理论与实际结合,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也就是要求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剖析中国历史,才能鉴往知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从郭沫若、吕振羽同志在中国古代史问题的研究上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确实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是他们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他们很注意吸取任何前人的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平地上产生发展的,它必须善于吸取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外的各种学派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当时郭老在古代社会研究中,很注意吸取有关的学者在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吕老在古代社会研究中,也尽量运用考古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在有人问,马克思主义算不算是一个学派?有的人说不算。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算是一个学派。但是,这个学派与其他一些学派不同,它不是一个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它尊重历史遗产,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善于吸收前人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三点,我还要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郭老、吕老以及稍晚一点的前辈翦老、侯老、范老,他们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研究,他们是开辟道路的前辈。他们几位史学前辈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过程中,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解释不尽一样。但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彼此尊重,互相探讨。他们的成就都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和内容。



总之,我今天的讲话有三个要点:第一,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就是要为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第二,我们要坚持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第三,我们要强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想这些是今后我们史学界需要继承和注意发扬的几个方面。

1993年8月30日在吕振羽纪念室揭幕暨
吕振羽史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胡乔木和党史工作

胡乔木同志在 1992 年 9 月 28 日逝世,到现在已经一周年了。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他在 30 年代初,即在他 20 岁左右的时候,就参加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党。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和成长起来许多杰出的人才。但是像胡乔木同志这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并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广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效地献给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这样的人至少是不多的,或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我在 1935 至 1936 年间已开始和胡乔木同志相识。那时,他在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我还不是党员,只在党的外围文化组织中工作,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他曾几次到我住的“亭子间”来长谈。这位我最早接触到的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除了政治问题以外,大部分内容竟是音韵学。虽然听他讲话的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但他专心致志地阐述自己的许多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记得我因他的督促而在金则人同志(那时在福州路一家小书店里主持编辑事务)主编的一个刊物(名称忘了)的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杂文,在这期刊物上也刊出



了以乔木署名的一首歌词。以后,在1945年他随毛主席从延安到重庆时,曾负责领导《新华日报》的言论工作。我那时为《新华日报》写的评论,每篇都经过他修改,有的被删改得体无完肤。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

对于胡乔木同志,值得追思和纪念的事情很多。我这次想只就他和党史工作,特别是和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谈一下。

胡乔木同志在1941年2月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后,曾协助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这几部书。这些书是为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弄清楚当时许多干部还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而需要读的历史文献书籍。以后,他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他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和许多高级干部的讨论,反复对这个决议稿进行修改,直至最后完成。显然,这些工作使胡乔木同志获得了对党史的认识的坚实基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年,胡乔木同志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书。上述他在延安的工作我并没有看到,而在北京我是看到他写这本书的。那时,他作为常务副部长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我也在部里参加工作。1951年五六月间,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他决定写一本简明的党史。于是他抛开一切其他工作,关起门来,用了若干天的时间(大概不过一个星期),没有任何助手,独立地写成了这本大约5万字的书。这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写这本书的时候,胡乔木同志才39岁,精力旺盛。他在延安已系统接触过党史材料,并且参与党史经验的总结;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的身



边工作。所以他才能似乎那么容易地就写出这样一本书。但是,仔细读这本书,仍可以看出作者的苦心经营,看出他善于驾驭史料和能够以概括的语言抓住历史的脉络的本领。这本书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但它是第一本完整地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是第一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党的历史的书。它在以后长时期中对于党史教育和党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是 40 年代到 50 年代初的事情。但我要跳跃到 70 年代末,也就是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时期。

这个时期对于许多老干部说来,是从多年的“左”倾思潮的压抑下,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压抑下解放出来,精神焕发的时期。胡乔木同志正是这样。这时,他充分运用自己一生在思想宣传战线上积累起来的经验,带着他多少年来反复思考得到的认识,立即投身于实践,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但在这里,我只想提到和本文题目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 1980 至 1981 年,胡乔木同志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党在 40 年间先后做了两个对于党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历史问题决议。胡乔木同志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后一个决议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前一个决议更大得多。他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精神,带领一些同志从最初设计,征求意见,到反复修改,直至定稿,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应该由始终参加这一工作的那些同志来叙述。我在当时只是极少地参加了部分工作。

第二件事是胡乔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关系。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几位领导同志(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同志)早就提出,在写出一部完整的比较详尽的中共党史以前,应该先写一本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0年下半年集中力量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准备把它作为党史简本,纪念即将到来的建党70周年。胡乔木同志很支持这个做法,还打算自己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为此他在1990年8月27日约了几位有关的同志讨论这事。但是,由于健康状况,他不可能按预定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

1991年1月起,我和龚育之、金冲及、沙健孙、郑惠等同志,后来又加上王梦奎同志,一起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的修改定稿工作。虽然已经有党史研究室的许多同志提供的初稿,但是逐章进行修改定稿的工作还是费了许多精力。本来应该在7月1日前出版的这本书,直到7月25日左右才在我们手里大致有了个定稿。我们只能自我安慰说,党的“一大”本来就是在7月23日举行的。这时我们面临着请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这部书稿的问题。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同志的认可,我们不能安心地出版这本书。

这时,胡乔木同志在北戴河休养。从北戴河得来的信息是,他现在精力很差。他要求我们考虑是否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这本书,并只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以便于征求意见,修改得完善一些再正式出版。于是我代表写作班子到北戴河和他商量这件事。

7月28日,我在北戴河和胡乔木同志会面。他的确神情疲惫,因为担心我们写的书达不到必要的水平,所以提出上述的要求。我建议他看一下第七、第八、第九章的稿子。这三章写的是1956年八大以后30多年的事。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他表示同意,但说按他的身体状况,很难说定用多少



时间才能看完这三章。我请他从容地看,不要妨碍他的健康。反正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已经过去了。

我在北戴河等待胡乔木同志审阅的结果,电话告诉北京的写作班子不要着急。使我吃惊的是,只在两天后,乔木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他已经看完第八章。8月2日中午,他派人送给我他看过的三章和结束语,并且要我第二天去看他。他只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部分20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

应该说,胡乔木同志对于别人的文字并不是要求得过于苛刻的,但是要得到他的赞许也并不很容易。从他对我们的稿子批注的意见中,当然可以看出他的总的倾向。我急忙阅读这些意见直至深夜。

8月3日,我应约去看胡乔木同志。他首先对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评价,要我转告北京的同志。他还说,他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同志,请他召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接着,我们还对他在书稿上提出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商酌。

批准出版这本书的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会议在8月8日举行。在会上,胡乔木同志还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他说:“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这篇题记在8月15日由他亲笔写成。文论家钱钟书同志读到这篇题记后曾同我谈起,他认为这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文章。的确,胡乔木同志一生写的文章不仅以思想缜密为特点,而且在词章上也是很考究的。在他逝世的13个月前所写的(也许是他一生最后亲笔写的)文章,虽然是一篇短小的题记,却也显示出一个大作家的功力。

在8月10日前后,胡乔木同志除了写这篇题记外,还陆续对



他读过的几章提出一些补充意见,有些是书面写给我们的。他又读过第六章,也提出了些意见。他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容许别人斟酌的,并不固执地认为非如此不可。我和写作班子的同志研讨他提出的意见,对书稿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直到将近8月20日,才全部结束了定稿工作。

1991年8月底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出版后得到的反应固然证明像胡乔木同志在题记中所说的,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仍有许多读者提出书中某些应该修订的地方。大量的读者,包括身经各个历史时期斗争的老同志,对这部书表示首肯,这证明胡乔木同志支持出版这本书是正确的。而如果没有这种支持,这本书的编写者是不敢把它出版的,至少不是用现在这种形式出版。

胡乔木同志还抱病出席当年10月8日在北京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举行的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他说,书出版后,他把全书看完了,因此现在可以比写《题记》时多说一点。他说:“这本书确实把党的70年的历史都简要地写出来了。在这70年里,党曾经进行过哪些斗争,取得过哪些成就,犯过哪些错误,书中可以说大致写得一目了然。……这使我看了很觉得高兴。”他在发言中还作了些具体的评论^①。

这里,我还必须讲一下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时亲笔作的修改和根据他的意见进行的修改。虽然这些修改的地方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举几个例子作代表,我以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修改不但使这本书增加光彩和减少疏漏,而且也反映出乔木同志对于党史的真知灼见。可以说,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

^① 这个发言记录见《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6期。



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先讲第七章。这章从“八大”写到发生“文化大革命”前。下述几个例子可以表明他是如何认真地进行修改的。

第一个例子是第二节倒数第二段中,评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书中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这句话中,“甚至无中生有的”这几个字是乔木同志加上去的。虽然只是加了几个字,却使这句话成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论断。与此相关的是,第八章第一节中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为题的一段中,最后一句话原稿是“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产生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和紧张气氛”。乔木同志对此批注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据此,这句话书中改为“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第二个例子是第三节中以《八大二次会议》为题的一段中,原稿有一句话评论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胡乔木同志显然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够。他在原稿校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后来他又重新考虑把这段话改写,告我们说:“宜用此稿,原修改作废”。乔木同志加写的这段话虽然很长,但我要在这里把它的大部分照抄出来。“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



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他所说的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第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胡乔木同志一向主张历史著作中要夹叙夹议,而议论又不可太多。他为这本书所加的议论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第六节中在以《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为题的一段末尾,提到周恩来和陈毅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原稿对此未作进一步的评论。胡乔木同志加了如下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这段话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也使人们看清了这个问题发展的前后脉络。

第四个例子是第八节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一段中,最后讲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胡乔木同志加上了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矛盾暂时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这句话也是具有画龙点睛之妙的例子。

在第八章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一章,胡乔木同志做了多处的修改和补充。其总的意思都是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革命”。例如第三节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时,原稿中说:由此而



揭露出来的“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胡乔木同志在这里接着加写了好几句话。他写道：“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这个例子也许足以表明，议论虽然不可以过多，但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有足够的鲜明性和彻底性。在第八章的末尾，原稿上说“‘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应该这样做的深刻教训”。乔木同志把这句话改成为“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

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的《曲折的经历》一节中，说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时，原稿中说：“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特殊地说，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胡乔木同志显然感到这里说得太简单，因此他在“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后，加写道：“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然后把“特殊地说”以下一句话改为“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内容丰



富得多、充实得多了。

在《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一节中，胡乔木同志批注道：“需要有一大段话说明中国现在仍是落后的，与发达国家差距不但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危险，以强调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三步曲的紧迫感”。原稿中本来只写“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就，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现在的书中，在这一句话后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加了一大段话，说明现在还落后，必须卧薪尝胆，急起直追，在世界形势严峻、科技迅猛发展的情形下，必须有这种紧迫感。这个补充显然是很必要的。

以上所举的虽然只是少数例子，但我想已足以说明胡乔木同志在审阅这本书稿时是多么认真负责，多么仔细。而他那时是在病中。这场病终于在一年后夺去了他的生命。现在重看他当时阅过的、满布他的字迹的几百页校样，重看他为尽可能求得这本书的完善而写给我们的一些字条，我不能不感到他是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这本书付出了一生最后的心血。

我这篇纪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用的是他和党史工作这样的题目，但并没有把有关这方面他所做的事说完。他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领导进行《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晚年继续协助邓小平同志审订《邓小平文选》等著作，并为编辑出版老一代革命家的各种著作集出了许多力。在1991年7月以前，他为纪念建党70周年写出《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篇属于党史范围的力作。这些都是他所做过的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工作。

原载1993年10月3日《人民日报》，报上发表时有一些删节。



纪念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敬爱的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我作为在 50 多年前就和他相识，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宣传战线上的一个学生讲几句话。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的领导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他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工作了 60 年。他有马克思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有对毛泽东思想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渊博的学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他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效地奉献给了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

胡乔木同志一生最多的精力用在新闻战线上。他为党的言论机关写过为数众多的评论，其中有些堪称典范作品。他曾在多年间主持和领导党中央和国家的报纸、通讯社。在他不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他还对党的新闻战线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工作，提出过许多好的指导性的意见。

胡乔木同志在 1977 年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原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属于中国科学院）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已经残破不堪。在各方面需要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机，胡乔木同志毅然挑起了在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院的



重任。这既表现了他对学部的学者们的信任，也反映了他一贯从党的立场重视社会科学。他对于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将能起重要作用抱有信心。在他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为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胡乔木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深刻的了解，对许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缘故。

胡乔木同志极为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在当代的发展。在这方面他具有丰富的知识。

胡乔木同志是个诗人。他所作的旧体诗和新体诗已编成集子。他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家，而且也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说出这些意见的。他从青年起就对语言学、音韵学深感兴趣，一贯钻研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卓有成效地领导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

总之，胡乔木同志是个革命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者，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他为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他决不是照本宣科。他是富于科学创造性的宣传家。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为党的宣传任务写的作品完全当得起是科学的著作。

接触过胡乔木同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勤于思考的人。他在深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他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对于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精神有深切的体会。他极其尊重毛泽东同志，但



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不能苟同时，仍保持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虽然为此而苦恼，但他决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胡乔木同志精神焕发，为党和国家继续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工作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从思想理论上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既纠正过去长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又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传统。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专家，这是胡乔木同志一生活中一个显著特色。他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尊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科学，他经常注意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也诚心诚意地尊重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专家。

胡乔木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弱点。他自己说过，他的思考所得有些并不周到。但是把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工作总起来看，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经作者自己审定的《胡乔木文集》，在他逝世前不久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也出版了。他本打算写一部回忆毛泽东同志在40和50年代的思想 and 活动的著作，邀了几位同志帮助他进行这项工作。根据他有关的谈话，参加工作的同志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稿子。可惜由于他过早地逝世，这些稿子没有能够经他审阅修定，但是由于是以他的谈话为根据，有几篇还经过他初步审阅，所以这本很有价值的书仍有可能出版。

我以为，胡乔木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也许他不认为他可以被称为是思想家，但至少他是一个缜密而内容丰富、多所创新的思想工作者。他所思考过的问题很广泛，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他写的著作中。他曾经在许多问题上和有关各方谈论自己的意见，有些谈话可能还存有记录；他还经常给



人写信、写便条，提出各种意见。这些材料我认为都值得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提供研究。

1993年10月5日在胡乔木同志逝世1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本论述毛泽东的信史

——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一年前，在纪念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我曾说过，乔木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久将会出版。现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已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们大家和广大读者久已期盼的著作，我热烈祝贺它的出版。

乔木同志在世时，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写本回忆毛泽东的著作，我也向他提过这样的建议。他跟毛泽东那么长时间的特殊关系，他在那个岗位上对毛泽东的特殊观察和了解，以及他个人在许多方面的深厚素养，使他对毛泽东的研究和回忆为任何人难以代替。

遗憾的是，乔木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已动手写的回忆录未能如愿完成。他去世后，怎么处理他遗留下来的未了工作？杨尚昆同志、薄一波同志、邓力群同志都很关心。我跟胡乔木同志相识达半个世纪，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无论于公、于私，我都不能不为之尽一份力。

我跟编写组的同志谈过，能否把他对你们关于写作这本书的多次谈话整理出来？这也许是读者感兴趣的。编写组的同志们研究后认为，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用乔木同志的口吻写稿，署乔木



同志的名来出书已不可能；但是无论乔木同志生前回忆毛泽东的多次谈话，还是在乔木同志指导下撰写的专题回忆文章，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有几篇文章还经乔木同志审改过，并且乔木同志在病重时曾表示，其他各篇若能都写成这个样子，他就放心了。基于这个情况，他们提出了将书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的方案：第一部分是乔木同志 20 多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即我们见到的这本书中《谈话录》一编；第二部分是编写组按照乔木同志生前拟定的题目，并根据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撰写的 19 篇文章，即现在的《初拟稿》这一编。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获得批准，这本书才以目前这样的形式出版。

我看了编写组写出的全部书稿，赞同这样的处理方法。《谈话录》整理的乔木同志 20 多次谈话，较好地体现了乔木同志谈话的韵味和风格，保持了谈话特有的生动性与鲜明性。过去在与乔木同志接触中，也听他谈过一些有关党史事件和毛泽东的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情节，但没有像《谈话录》这样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谈话录》从大角度宏观地回忆毛主席在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的许多重要历史活动，也记述了毛主席的一些活动的具体情节。例如，这里介绍了毛主席在皖南事变前写“佳电”的慎重思虑，苏德战争爆发后密切关注战争形势变化的紧张、沉重心情，以及在 1946 年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和在 1950 年抗美援朝这两个重大事件上难以下决心的情况。这些记述是乔木同志根据记忆中的深刻印象说出来的，所以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党的领袖的神情却跃然纸上。乔木同志对毛主席大量的正确观点和判断作了深刻的阐明和精彩的评论，也对现在在他看来毛主席的一些不合适的看法和做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认为毛主席对战后国际形势的估计也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即对当时人民的力量估计过高，对美国人民与美



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英法两国与美国的矛盾都估计过高)。对于这样的问题,尽管别人也有过一些思索,但只有乔木同志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并说得适度。《谈话录》还说明了一些重要历史活动的原委,澄清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疑问。如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对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关于财经问题争论的介绍,以及对我们党同苏联、同美国关系演变的叙述,乔木同志作为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这对于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初拟稿》部分,在去年的9、10月间我陆陆续续地看过,并把一些意见写在编写组送来的清样上,供他们修改参考。跟乔木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有一个感觉:他善于“画龙点睛”。读了这部书稿,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说《谈话录》是“点睛”,那么《初拟稿》则是“画龙”。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在我看来,《初拟稿》部分大体分为四组。每组文章都披露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

一是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这方面是过去党史中讲得分量不够的。《初拟稿》根据乔木同志的谈话,运用有关史料,说明了毛主席怎样重视并指导边区的政治经济建设,以及对边区有亲骨肉般感情的那种深切关系。这就使我们看到毛主席在革命时期已经注意积累建设的经验,并且使我们能体会毛主席为什么在1947年坚持留在陕北转战的深刻原因。

二是有关延安整风方面的文章,这里包括从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到党的七大。这一组文章着重写了党中央领导层开展整风斗争的情况,提供了不少人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文献材料。虽然有些地方似稍觉琐碎,但也无妨。因为这些材料太珍贵了。这组文章根据乔木同志对整风运动的评价,以大量史实在充分肯定毛主席领导



整风运动取得成功的同时,还分析了整风运动的某些缺点。可以说,这组文章是从总体上把对整风运动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三是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基本观点和重要活动。有的文章包含很重要的内容,把一些事件讲得比较清楚,弥补了目前党史界在这方面研究的某些不足。

四是关于党领导的军事斗争和革命战争方面的文章。有的文章写得很好,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一些历史过程的始末,而且还有一些评论和分析,有助于了解和研究毛主席的一些政策思想和理论观点的形成与变化。

去年10月看完《初拟稿》的全部文章后,我曾给编写组的同志写了个条子,认为“整个看来,这本书是有价值的。虽然有若干篇(或一篇中的大部分)读起来比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胜怕也不可能(这里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胜的)。再说,如能经过乔公自己的手,一定能多有增益,现在是没有办法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篇,本来有理由企望乔公说出些新的东西,现在这一篇似觉不能令人满足,但这也可能是永远的遗憾了”。后来编写组对有的文章作了些修改,情况有所改善。

总之,这本书在有关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年努力,整理成这个样子,实属不易。这是一部信史。今后,人们研究40至50年代党的活动和毛主席的活动,写党史,这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1994年12月22日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2月16日。



叶籁士和世界语

我在 1933 年到 1934 年间认识叶籁士，开始和他相熟是在 1935 年下半年。这样算来，我和叶籁士的友谊，已有 60 年的历史了。

我是通过世界语认识叶籁士的。我的中学时代主要在苏州度过。我的一位初中的同学名叫何增禧（笔名徐沫）在 1931 年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能继续求学，就考进了上海的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他经常从上海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就是从 he 那里我知道了世界语。

30 年代前期在世界语界中，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那时党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中的组织称为“左联”，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中的组织称为“社联”，在教育工作者中的组织称为“教联”，在世界语工作者中的组织称为“语联”。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左联。左联在 1936 年初解散，其他几个组织也同时解散了。我在 1935 年下半年离开学校后在上海工作时，语联还存在，因此参加了一段时间。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都处于十分尖锐的状态。1926 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说明当时世界的局面时说，世界上两大势力树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第三国际高举着的革命的大旗，一



面是国际联盟高举着的反革命的大旗。这种形势也表现到当时国际和中国国内的世界语运动中。不过,当时国际的世界语运动中,除了分别属于这两面大旗的国际组织外,还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它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中国,20年代世界语运动刚开始时,是和无政府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到了30年代,似乎已没有纯属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语组织。30年代,在中国也出现了分别属于上述两大势力的世界语运动。语言是工具,本身并没有政治倾向,任何倾向都可以利用它。但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创造它的人曾赋予它以特定的思想。以后推扩世界语的人们也往往把它和某种社会政治思想、某种政治倾向联系起来。在中国使世界语运动脱离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脱离那种以为靠统一的国际语就能创造世界和平的幻想,而且使世界语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联系起来,要归功于早期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世界语者,其中就有叶籁士。他是语联的主要主持人之一。

左联、社联等组织都曾在中国革命中起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配,有许多活动和做法是错误的。如这些组织曾热衷于动员他们的成员去做分散传单,举行“飞行集会”一类事,反而相对地轻视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他们的出版物与党的秘密刊物的调子一样,因此不可能公开发行以影响较多的读者。在左联内部,鲁迅和茅盾曾批评和反对这种“左”的倾向,党中央在文化战线上负责同志如瞿秋白、张闻天也曾表示反对这种“左”的倾向。到了大约1933年以后,由于党中央在上海的代表机关屡遭破坏,不能再保持下去,由于各种貌似激进而实际上只能损害自己的力量的“左”的做法在实践中越来越走不通,上海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不能不适应情况对自己的工作方法作必要的改进。到了1935年,党中央经过长征后,调整了党的政策,提出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样就给全党各方面的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所以到了1936年初,左联、社联等组织相继自动解散,其中当然也包括语联。

那么,语联是不是也有过“左”的错误呢?由于我参加语联较晚,不可能全面完整地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也可以根据我的印象,略说一点。

1932年到1934年间,我还不知道语联的存在,只知道有一个上海世界语者协会。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语联的一个公开机构。这个机构设在卡德路(现在的石门路)的一个弄堂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子里。这个机构依靠出售世界语的书报,办世界语的讲习班等等来维持自己。这个机构虽然受到巡捕房(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的注意,常有一些警务人员来查看,但也找不到什么岔子。这个机构出版的一个小刊物叫《世界》,其内容除了世界语外,也谈政治,但谈的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德国法西斯反动势力的危险性。当局不可能根据这样的内容给它戴上红帽子,但这些内容对于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的青年人则起了进步的导向作用。我在当时就是因读《世界》而感到世界语很亲切,并通过世界语进一步探寻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的青年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和它出版的《世界》吸引了一部分进步的青年,并且成为团结这些青年的一个中心。我以为,语联的这些做法的效果是好的。语联之所以这样做,我想也许是因为语联的人数很少,没有多大力量,不可能指望立刻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来。同时语联之所以能够较少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也由于机构的主持人比较踏实,不尚浮夸。叶籁士就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者。

我和叶籁士交往最密切的时候是在1935年到1937年上半年,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间。当时在上海大约化10块钱就可



以租到一间中等房子的亭子间。当时我们都是单身汉，除了一点行李和几本书以外，可说是身无长物。因此常常搬家。我记得我曾经和叶籁士及其他两个朋友在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一个裁缝铺子的楼上同住一个前楼，那里离“法国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很近。后来，我和叶籁士又在环龙路的金神父路（现在的瑞金路）口的环龙里内各自租了一间亭子间，比邻而居。那时我还是初入社会。叶籁士比我大好几岁，和他做朋友，感到他处处诚恳待人，在不知不觉间引导你，一点儿也不使人感到他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

叶籁士通过世界语获得了在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人中推行过的汉语拉丁化方案。

他把这套方案介绍到中国，并且成为宣传和推行拉丁化方案最积极的一个人。他对世界语和汉语拉丁化的热情使他关心和研究语文问题，在 1936 到 1937 年之间，他主编过一个叫《语文》的杂志。当时“新知”书店的朋友愿意出这份杂志，但“新知”是一个很穷的书店，所以没有编辑费和稿费。叶籁士就这样一个人单枪匹马，兴致勃勃地办起这份杂志来了。这正是他住在环龙路环龙里的时候。那里的一间不超过 6 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是他编辑《语文》的工作室。这大概是现在出版界的同志无法想象的。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这个杂志只出了不多几期，但它的内容和版式是很有特色的。另外应该补充说一下的是，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小刊物《世界》后来改由别的人负责编辑，但它的吸引读者的独特的风格是在它创刊时就确立起来的，而这应该归功于叶籁士创造性的才能和努力。

叶籁士在 1935 年时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正式入党是在 1938 年。1949 年革命胜利以前的 10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 40 年间，叶籁士都曾为党的需要做过编辑出版和其它许多工作，但他始终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文字改革和世界语上，党也需要



他在这些方面做工作。在这两个工作领域内，他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凡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的踏实的工作作风，诚恳的工作态度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

我和叶籁士同志做了 60 年的朋友，虽然有时来往不多，但是友谊的记录始终连续不断。1973 年夏，在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烟尘尚未散去的时候，我和叶籁士又在北京相聚，开怀交谈，无所顾忌。那种悲喜交集，劫后重逢的感觉，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是在那种环境下，表现在叶籁士身上的诚挚的同志友谊，使人感到实在是人间的至宝。

1995 年 6 月

原载《叶籁士文集》，世界语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楷模

陈云同志极重视学习哲学、学习思想方法。他常常教导周围的同志要注意这方面的学习。他在1957年向商业部的领导同志们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类似的话，在陈云同志的文集中可以多处看到。

陈云同志指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早在1942年陈云同志在延安养病的时候，曾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现在读陈云同志的著作，也会感到，他的著作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他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時候，总是把有关的各方面的事实弄清楚，并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他在1978年12月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关键时刻考虑经济问题时所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是要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矛盾，看出问题，而且要善于解决矛盾，解决问题。



党的政策就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问题的方针和方法。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当然关系重大。但陈云同志认为，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所以，他的著作中反复说明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里所说的弄清情况，包括调查和了解情况，也包括研究情况。陈云同志有时也说，“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并且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从这一观点出发，陈云同志认为，“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陈云同志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一定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有关的各种情况弄清楚，这才真正算是从实际出发。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说：“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这句话虽然说来平易，但确实是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痛苦经验而说出的。

陈云同志认为，为了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客观事物，是需要有些方法的。他提出交换、比较、反复这三种方法。所谓交换，是说一个人看问题，总是有局限性的，集体讨论，与从不同角度看事情，有不同见解的人交换意见，是达到全面认识的重要方法。因此，应该把凡是肯用脑筋想问题，发议论的同志，看作是很好的同志。因为无论他的意见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有助于达到较正确、较全面的结论。所谓比较，就是指对于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的时候，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要把考虑中的方案和其他各种方案比较，不但和现行的比较，和过去的比



较,还要和外国人的比较,这样才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所谓反复,就是说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有些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决定,过了一个时期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陈云同志反复提倡这些方法,而且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解决问题,提出和确定决策的过程中,的确是运用了这些方法的。我们的政策必须符合实际,才能有效地推动或者改造客观世界,而不至于导致盲目的行动,或事与愿违。但我们的认识又常常不是完全符合于实际,没有达到对事情的本质的认识。这是一个矛盾。必须承认这个矛盾,采取必要的方法,使片面的认识逐步发展为全面的认识,使肤浅的认识逐步发展为深刻的认识。陈云同志说的交换、比较、反复,就是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陈云同志常常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为别人题字的时候多次写这几个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思想认识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实际;检验其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从各方面来的意见,必须是符合于实际,经受了实践考验的,才应该受到尊重。一种意见,不是仅因为是从上面来的,就受到尊重。许多正确意见往往来自广大的群众,正确的领导意见常常是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才得到的。书本知识当然是要重视的,但是不能只依靠书本知识来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孔夫子的书、亚里士多德的书,都要读,但不能“唯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也不能采取“唯书”的态度。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为了学会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时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唯上、唯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唯实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因为客观现实既复杂,又多变,为求实就需进行艰苦的探索;还因为有些主观的原因,例如骄傲自满或考虑



个人得失，会妨碍唯实。陈云同志是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为此而冒政治风险，也坚持唯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云同志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关于实际工作的报告，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细。他在说明必须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的时候，举例说，“比如，要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和猪的增产问题，若不管饲料、猪仔的来源，不管价格高低，不管群众愿意不愿意饲养，而是临时乱抓办法，那就永远也做不好这一工作。”他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解决猪肉供应紧张办法的发言，就是论述了各方面的有关情况，然后提出来一系列可行的办法。他提出来的这类解决具体问题的文章，虽然到现在情况变了，不可能完全适用，但是，读了这些文章却令人深刻地感到，要解决问题而浮光掠影，粗枝大叶，挂一漏万，是何等误事。陈云同志在细致周密地观察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宏观，注意从全局把握现实。例如他说：“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这样从总体上认识历史实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陈云同志提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什么是当时的实事呢？他说，“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显然这是了解了多方面的情况以后得出来的本质的概括。因为陈云同志有很强的概括能力，所以他常能用新颖而精练的语言说出发人深省的思想，例如他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陈云同志确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既算大帐，又算小帐。算小帐时明察秋毫，算大帐时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陈云同志又十分重视情况的变化,他在客观情况有了变化的时候,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旧的认识上,而要根据实际得出新的认识,提出新的办法。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陈云同志反复强调,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过去的那套办法要加以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情况又有了巨大的变化。陈云同志在这时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982年,陈云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经济工作,总结性地说:“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的观点。”这是对新观点的来源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新观点不是来自脱离实际的冥思苦想,而是来自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然有了新情况、新问题,也就一定要有新观点。

总之,从陈云同志的文集中到处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着他极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从前有个诗人写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思是说,可以绣出美丽的鸳鸯拿给人看,但不要把绣鸳鸯的方法告诉人。陈云同志不是这样。他是既让人看到他所绣出的美丽的鸳鸯,也把金针度与人。

应该看到,没有金针是绣不出鸳鸯的,但有了金针并不一定能绣好鸳鸯。思想方法也是这样。知道怎样的思想方法对头,并不等于已经能掌握和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虽然知道不要从想当然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片面性,而要全面性,但是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仍然会陷在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错误中。陈云同志说过这样的话:“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



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像看电影那样简单。”当然，不能由此得出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不重要的结论。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还不算数，必须不断地运用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情况、解决问题，在极复杂的情况和极难解决的问题中经受锻炼，并且克服那些妨碍实事求是的主观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像陈云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并以陈云同志这样的老同志为榜样，认真地学习哲学，学习思想方法。

1995年6月13日在《陈云文选》（第一至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6月20日。



第 五 辑

短 文

(1982—1996)



在芝加哥国际学术 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会,我认为是开得很好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组织了这次特别国际学术讨论会,既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又有许多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这表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固然首先是中国学者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学者的注意。

对于辛亥革命,正如对其他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一样,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引据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并且在总体或在某些细节上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既不能只看到片段的事实材料就作出全面的结论,也不能满足于罗列一切个别的材料。如何从多方面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的事实材料中,看出哪些是最重要的,最足以表明历史真相的事实材料,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记载和说明,这是历史学家所要努力做的事。正因此,对辛亥革命这样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互相交流资料,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读到的论文中,既有相互接近的观点,又有可以互相补充的材料,也有见解不同而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这是很好的现象。

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他是辛亥革命的当之无



愧的领导者,而且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伟大革命家。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年,是中国发生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的30年。孙中山生活和战斗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具有复杂的内容,并且经历了改变和发展。如果只看到他一生的某一段落,他的思想的某一部分,是不足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的。例如的确如有的论文所指出,他发表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并不完全了解和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晚年又愿意并实行了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政党的合作。对此就需要有全面的认识。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很使人感到兴趣的论文,例如提到美国的19世纪末年所谓“进步主义”和孙中山思想的关系的论文,提供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思想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孙中山一生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则不能完全用这种影响来说明。“耕者有其田”的观点就是和亨利·乔治不相干的。如果就孙中山具有某些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一方面说,他同亨利·乔治和其他美国的“进步主义者”有相同处,那么他们之间的不同处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中,亨利·乔治等人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孙中山则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伟大人物。这就因为孙中山一生坚持革命,先是对清朝政府,然后是对袁世凯,对北洋军阀,同时又对站在这些本国的反动势力后面的帝国主义者。在考察孙中山一生的实践和思想时,据我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是一个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进步,跟着时代前进而进步的革命家。他的主导思想是符合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所十分珍视的历史遗产。



会时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台湾的学者参加,是两岸的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

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1988 年 3 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

一些青年朋友要我谈谈自学、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只好来一次漫谈。

正规教育与自学

既然是讲经验，不能不说到我的学习经历。我在1925年7岁半时开始上小学。由于在上学以前，曾读过师范学校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和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识字，并且教我们读了唐诗的一些绝句和《论语》，也教了一点新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所以我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初中时因为功课赶不上和生病，多读了1年。高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读满了3年。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在大学里只学了1年就离开了。所以我先后共受了10年正规学校的教育，这以后就靠自学了。在大学的一年中，我不满足于学校里的几门课程，用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时我已经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自动离开大学，是因为感到那时大学里上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想法含有幼稚的成分。旧社会的大学哲学系，教师讲的自然是唯心论，其实学点这类课程还是有用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在那一年我听了郑昕教授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要求使



用的概念必须前后一致,进行推理应当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好像繁琐,但对锻炼正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那时我也听了汤用彤教授讲的《哲学概论》,选修了张颐教授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使我多少懂得了唯心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对我后来进一步自学哲学有不少好处。总之,在从1925年到1935年的10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我学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学里的几位语文教员(那时叫国文教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教员,我现在还能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一位姓诸的教员充满感情地向孩子们讲《离骚》的情景。这段学校教育为我后来自学打下了基础。正规的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党要求干部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学好专业知识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等,把基础打好。

1935年,我离开北大到上海后,一边学写文章,以维持生活,一边自己继续学习。当时我主要是自学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学起,尽可能地把当时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译本都读一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从古希腊哲学读到17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我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我除自学哲学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小说是从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大概是《小五义》。10岁以前家里可看的书不多,《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到中学时可以从图书馆借书了,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逐渐地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19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一本《欧洲文艺思潮概论》使我知道了文学原来有这么多流派。漆树芬著、郭沫



若作序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也许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论书,这本书使我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读书

人们常说,专和博要结合,这话是对的。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阅读2亿字的书。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认为一个人要用5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要求。这就是说,每年读400万字,每天读1万多字。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应该努力在15年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可以做到的。2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包括可以使人增长见闻、丰富知识的人物传记、旅游记、记述历史史实的著作等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我认为,应该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理论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我认为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读,但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在2亿字的书中,四分之一的书要精读,四分之三的书可以浏览。那么,每天抽出两小时来读书,在15年到2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到苏州这个城市。1932年一二八变动的上海战争,对于苏州的学生更是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最早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华岗



的《中国大革命史》。这最后一本书是被严禁的书，一个旧书店老板悄悄地从书堆中取出来卖给我的。我也开始读当时已有译本的《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等。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这些马列著作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这时我已上了大学。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的《大众哲学》给我的印象较深，它使我从那些艰深的译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早期的译本往往很难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个别词句。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不从总体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好像到处是微言大义，恐怕也不是好办法。1940、1941年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几遍。但不是说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第二遍，而是说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在1956年左右，我把许多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重新读了一遍，收获很不一样。正像有人所说，年轻人也可以欣赏一句格言，但他对格言的理解和一个年纪大一点、有了一些经历的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所以，马列主义的一些著作必须反复学习，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反复阅读。

关于写文章

下面再谈一谈写文章。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写一些小文章。1935年以后，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我的一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经验是，写文章不要写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总要尽力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多一些，不过不能说我总是这样做的。我的第一本书是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那时还不到20岁，写这本书虽然超过了自己的力量，但我还是读了不少有关的书和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才着手写的。1944、1945年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在1946年出版了《二千年间》。这本书不是从横剖面按朝代写的，而是从纵剖面写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等。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我最初写的文章，可以说相当多的是带有批判性的。当时是批判旧社会，抓到一点就批判。1935年，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既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又要讲团结，那就不能对一些人物简单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坏透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在1936年写了篇《胡适论》，虽然简陋，但最近有机会重看了一遍，似乎也还是说得比较周全。文中说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但也承认他还有一定的功劳；在抗日问题上，说他有过错误的言论，但也不抹煞他当时有爱国的表现；并且指出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在抗日中同他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那时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对人和事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遵循这种方法，不能简单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鲁迅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这对我们一代



人起了很好的影响),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比如,我在1944年左右写文章批判历史学家钱穆的错误时,就没有光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这样,他会觉得可笑,因为他本来就宣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唯心论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人家本来就是唯心论者,你说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说服读者。所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文章,时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说道理,这种训练对我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外遇到从台湾去的几位学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被台湾当局赶出来过。他们说我去批判钱穆的文章写得好,他们在台湾时把它复制了送给朋友。我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个好处,那就是我没有摆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说理的方法,具体地指出钱穆历史观的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我虽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写批判性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放弃批判这个武器。当然,我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批判”,任意上纲上线,随便给别人戴帽子,丝毫不讲道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写批判性的文章,有的可以而且必须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但是我们不能光靠引用几句马列著作中的话就算把对方驳倒了,还是要认真地进行分析说理。

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现在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但如果把文章中的废话、可以删节的词句、不必要的形容词都省略掉,文章是可以缩短的。



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中学生作文时,首先学写叙事文,这是作文的基础。写历史要叙事,把一件事情用比较简练的话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有时候,我觉得叙事甚至比发议论还难。叙述一件复杂的事情,既要使人知道它的前后经过,又不能写得太囉嗦,令人看了讨厌。而且,还要说得生动、不枯燥,要突出重要的情节,这都要下功夫。

发议论当然也有难处。虽然说的是某一点意思,但牵涉到各个方面。有时会感到层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讲,用了许多“虽然”、“但是”、“这一方面”、“那一方面”,讲得很复杂,还是没有能够把道理说透。其实从很复杂的道理中总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简明的逻辑程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点,然后把其他必须说到的各点各得其所地安排好,这样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所发的议论也就比较充分了。当然,要找到这种逻辑程序不是很容易的事。说不清楚往往是因为还没有想清楚的缘故。

写文章要有重点。文章着重点的地方要认真地写一下,把次要的东西撇开。如果没有重点,平铺直叙,就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举《木兰辞》说一下。讲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诗的重点应摆在什么地方呢?花木兰从军应该是个重点吧?但诗中用“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句就把木兰从征打仗说完了。作者着力写什么呢?作者写道:“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于是木兰就决定从征了。然后就写:“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鞴,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作者写到这里还觉得不够,接着又写:“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样就把一个女孩儿从征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了。接着就是前边六句诗交代她10年从征的经过。然后作



者用一大段写木兰回来后的情景：她的爷娘和阿姊小弟如何迎接她，她如何脱去战袍，重着女儿妆，等等。这是首叙事诗，什么地方细致地写，什么地方简略地带过，安排得很恰当。议论和叙事也一样，都得有重点。重点突出了，才能吸引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

写理论文章也要形象化。理论文章虽然不是文学描写，不是讲究形象化的，但有时需要有形象化的描写。比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只用很概括的话叙述了我党自 1927 年革命失败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经过，但是这里面他用了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在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写得多么简明、生动！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概括地叙述多少年的历史时，写得非常简练、突出而又形象化，这种功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搞理论工作的人需要多读点文学的书，否则，文字的枯燥和八股气味就很难消灭。

关于继承和创新

最后讲一点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上讲的写作方面，有不少是涉及技巧的问题，而写作主要的还是思想观点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常讲理论上要有什么突破。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总要有新的突破，但我们应注意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



西。”^①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任意排斥,更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已有的一切成就。所以,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观点。随便做翻案文章,并不见得就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如果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一切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创造。学术界、理论界应该有创新的作品,但是,不把前人许多正确的东西好好总结,就随便发表一个自以为有突破的东西,这不能叫做创新。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是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对于通过历史的实践,通过前人刻苦地研究取得的正确的观点,联系今天的实际,作出一点新的、超过前人的发挥,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创造性。我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史界有人问我,你这本书有哪些新的突破。我说没有什么突破。我主要是把几十年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论点作了发挥。这些基本论点的正确性,不但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而且被这以后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不能脱离这些论点。但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论点的正确性,而是用比较细致的分析来充实这些论点,把这些概括的论点中所包含着的丰富内容,尽可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出来。当然,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青年人的潜力是很大的。充分发挥这些潜力,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工作上都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效。你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一句老话。我们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努力学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2页。



习,不要在可以做很多工作、读很多书、写很多东西的时候,把光阴错过。

1982年12月与青年干部的一次谈话。原载
《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1月13日出版。



关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内容是很宽广的。

回头看过去的历史,还是为了向前看,是为了现在,为了从现在到将来的发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指什么?当然是指今天的爱国主义——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爱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反对沙文主义、大国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我们反对复古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推动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动力。

在中国的大地上,中国各民族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仅以有文字可考的而言,绵延不断将近 4000 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在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发展了富有自己特色的灿烂的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珍爱中国的历史,无愧于中国历史的继承人,并且要用我们的行动,努力写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篇章,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无穷的苦难,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表现了坚强的生存能力、丰富的创造才能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是人民的聪明、才智、毅力和能力的代表。



在回顾中国自古以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并不讳言历史上的一切黑暗面。在阶级剥削社会中不可能没有黑暗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全部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它也受到旧时代遗留下来消极的、黑暗的东西的负累。科学地分析历史,会使我们看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扬光大中国的古老的文化,也才能最终消除一切消极的历史遗迹。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久,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当然不讳言落后,但是更要看到中国人民并不是只能悲叹于自己的落后,而是有能力战胜落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历史的考证明,中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打碎身上的镣铐,能够在似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开辟民族的新的出路,能够在战胜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不断地争取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35 年的历史,已经成为全部中国历史中的有机的一部分。这一段历史中有艰难、有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已经永远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历史的回顾应该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志气,更加发挥我们的智慧与能力,努力学会新的本领,使我们的伟大祖国朝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奋进。

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基础于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现在的青年朋友们很需要对本国历史的丰富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从学校教育中得到,但还需要有可供浏览和阅读的读物。现在已经有许多作者写了这样的书,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书出现。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史学界过去有“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等说法,并且争论究竟哪一种说法对。近来有的杂志又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谈这个问题时,有必要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别开来。不妨引用马克思说的一段话:“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作为历史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的说法看来是适当的。研究一个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有关的事实真相;从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所谓理论性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本质和规律性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它们隐藏在繁杂的历史现象之中。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把历史的表面现象描述出来,而且要对之有所议论。这种议论是否深刻,就在于是否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的、有价值的议论,当然不能凭空地产生,而只有在详细地、周密地考察和研究史料之后才能得出来。

^① 《资本论》第1卷,1873年第二版跋。



曾有人认为,如果强调“论从史出”,那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是说,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就不能是“论从史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从某种抽象的一般的原理出发,演绎地推论出对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提供我们以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如果虽然从史料出发,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那就可能只得出肤浅的、以至错误的认识。“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



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



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寓论于史”、“夹叙夹议”、“以论带史”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1月16日。



共同的理想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很好，既体现和继承了十二大的精神，总结了十二大以来的新鲜经验，也总结了建国后 30 多年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的确如《决议》所说，过去的错误是：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但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化思想工作，用主观设想的高标准来要求文化思想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在经济建设中也搞理想主义。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农村里初级社不行，马上搞高级社，而且要搞大社，搞人民公社，甚至集体所有制还不行，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城里也一样，一定要把小理发铺、小饭铺、小商店都挂上国营的牌子。已经国营了，再高怎么办？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做的效果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总之，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各种具体条件，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切从最高的理想出发，实际上是从书本上的条条出发。

在思想领域也搞理想主义。好像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应该要求人们都能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都变成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拿 1957 年反右斗争来说，那时刚刚进入社会主义，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不了解，不习惯，有怀疑，甚至有反感。这本来并不奇



怪。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很自然的。毛主席说,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话是对的。但要靠一个运动把右都消灭掉,使中都变成左,这是不可能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受打击的有许多并不真是右派,尽管有些人是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正确的想法。我不同意现在有些人说当时的“右派”是正确思想的代表,但是确有些人因为肯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有些人不想也不说,或者说假话,就没事了。这样不但没有解决任何思想问题,反而使一部分人得出了聪明人不说真话的经验。这样做当然也不可能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提出搞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国内外都有强烈反映呢?人们认为,讲改革、开放,就是“放”,讲精神文明就是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收”,“收”就是要整人。一些人发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有过去的经验做根据。因此,在《决议》中,如何提出任务,用什么理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现在《决议》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培养“四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个任务很重,要完成它很不容易。现在搞改革、开放,自然也会有各种不同意见。对任何一条措施,要求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是不可能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想法,会有怀疑,会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现动摇。我们承认全体人民在许多方面思想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于不同的利益关系,会产生各种矛盾,包括思想上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最大范围地把人民团结起来,要团结起来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决议》说:我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理想是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和海外侨胞都能承认



的,它不但反映了广大人民当前的共同要求,而且也是把过去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付诸实现。用这样的理想来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要做到《决议》中要求的广泛的团结,还要做出许多努力。对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那么高。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变成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要求提得很高,结果反而落空,走向反面,这是有过去的经验的。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的先进分子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把这个最高理想和当前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作用。

怎样看当前思想战线的形势?一种意见认为思想很活跃,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混乱。最近有的同志从《文艺报》上看到张贤亮写的一篇文章,对文中说“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很反感。对这篇文章怎么看呢?张贤亮是个很有才能的小说家。从这篇文章来看,他其实不太了解资本主义,也不太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他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粗糙的、幼稚的,也是荒谬地对待资本主义的看法当作立论的对象。按照这种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必须否定和排斥。其实这不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的看法。但是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是很不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顶峰,社会主义是可以从那里学一些东西的。但是,正如《决议》指出的,要屏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屏弃资本主义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张贤亮的文章忽略了这个方面。我们要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和政治运作、科学文化建设中有许多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当然不能照抄)。既然



唐太宗“贞观之治”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过去,我们有些宣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有片面性,把资本主义描绘得一团漆黑。有的人出国一看,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要给它“平反”。这就从反对一种极端走到了另一种极端。对待这样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决议》中所说的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来解决,而决不能打棍子、抓右派,用行政手段处理。在讨论和批评中,要认真考虑人家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讲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用行政手段容易,就是搞一个运动,也不过半年一年就行了,但解决不了任何思想问题,而且只会造成恶果。我们决不能重复这种错误。我认为,张贤亮的文章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有些可能是不完善的或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认真思考 and 研究的。用讨论和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比较难,是要有耐心,花苦功的。这就对我们,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同志提出了任务,而这个任务我们是还远没有做好的。

总之,《决议》提出的任务不是高不可攀,不能做到的,而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用很大努力才能做到。《决议》好就好的在这里。

1986年9月24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曾于1986年10月11日在《文艺报》以答本报记者问的形式发表,标题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经验》。张贤亮同志看后给作者写信,对文中说到他的那段表示赞同。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所应起的社会效果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社会效果。——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社会效果，也许可以分成两方面看。

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一个方面。中国这样一个 10 亿人口的大国，从水平很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起步，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可能还要六七十年，但作为历史时期来看是不长的），使自己发展成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同这个伟大的实践结合。脱离这个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研究实践中的经验，给以科学的总结；不断地根据实践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断地研究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中起作用，这是我所说的社会效果的另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的迅速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们的思想意识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又要能适应当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变化。



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也是人民自我教育的过程。正如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所说,“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很多工作。

从这两方面的要求来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现在,是做出了许多成绩的,但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就是说,社会效果还不够明显,不够充分。

我们应该自觉地为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所应有的社会效果而更好的努力。

原载 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 10 周年
专刊,6 月 6 日出版。



对社会科学出版工作的几点希望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什么书,出的书好不好,固然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能提供什么书稿,但是出版社也能起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积极作用。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出版社对每一本书的出版与否的决定,对于著作界、翻译界是有影响的。当然应该起好的影响。我们的出版社的方针和社会科学院的方针是一致的,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解放思想,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探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做好自己的工作。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繁重的,甚至是艰苦的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从许多书稿中选出可供出版的书稿,对一本值得出版的书,帮助作者、译者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饰,这都是编辑工作者的责任。校对工作、装帧工作,也是整个编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好书的出版都有编辑工作者的辛劳在内。我们要求著作界有严谨的学风,编辑工作也要有严谨的学风和作风。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不要轻视自己的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国现在书籍印刷设备水平很低,这造成使人无法忍受的出版周期过长的现象。书籍发行工作也做得很差。读者得不到新书



的信息,买不到所需要的书,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的许多学术著作如何发行到国外去,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我希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能在改进印刷和发行工作方面想些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 10 周年,我就写这几句,作为祝贺,也表示希望。

1987 年 6 月 8 日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 10 周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评论选辑》而作。



我们赞同推广世界语

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悠久的历史,都和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如果设想废除民族的语言文字,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在当代世界上,过去遭受奴役与压迫的殖民地、附属国相继得到了独立,它们使用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以利于发展它们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当代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大大增强。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是如此。任何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都不可能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相反的,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越来越密切地增强对外联系。各国为争取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争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共同利害关系日益增多,因此,在各国、各民族之间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文字,这种需要也就更加迫切了。用一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来“统一”世界,过去从来没有能实现,今后更不能实现。

世界语(Esperanto)虽然是一种人工的语言,但一百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活”的语言。它以许多民族语言为基础,综合了许多民族语言中的优点,汰除了自然生长的民族语言中的繁琐性和无规律性。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能够用世界语准确地翻译出来,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显著的证明。

创造世界语的柴门霍夫博士以为,通过世界共同语言,就能实



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这虽然带有空想的成分,但是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之外,有一种大家公认的共同语言,这对于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能够起积极作用,这是无疑的。

汉语、汉文是世界上被最多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之一,而中国又是学习和运用世界语的组织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是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根本目标。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开始形成并必将日益增强的趋势。中国一贯坚持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们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长期扩大和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我以为:推广世界语,努力促成它成为世界公认的共同语言,是完全符合于为中国人民所赞同和支持的这些基本方针的。

为纪念世界语诞生 100 周年而作。原载《世界》
1987 年第 6 期,6 月上旬出版。



祝贺时的感想

——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

罗尔纲同志开始发表他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著作是在30年代,但我在40年代才仔细读了他在那时的著作。

1948年我在香港时,读到《太平天国史丛考》和《太平天国史纲》。这两本书大概可以代表罗尔纲同志早期的研究。那时,我读得最有兴趣的是《朱九涛考》、《黄毓秀考》、《洪大泉考》等考证文章。作者详细地收集有关史料,进行缜密的思考和剖析,务求从迷雾中把史实的真相揭露出来。而有关这些人物的真相如何,确是值得弄清楚的。吴晗同志为《太平天国史丛考》作的序文中把作者的考证文章比喻为“剥笋”,说“他用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穷根究底,一直剥到笋心……”。对这个比喻,我有同感。

50年代初,我建议三联书店同罗尔纲同志商量,集印他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结果就出了七本《太平天国论文集》。作者如此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在编集的时候,不但补充了许多材料,而且有的文章如他所说,还“经过改写”。从这里可以看到罗尔纲同志从不自满、不断进取的那种可贵的精神。作为罗尔纲同志的亲密朋友,吴晗同志在50年前(1936年)写的序文中也说到作者的这种精神:“每一篇写成后,改而又改,往往费了好几倍的写作功夫,一



直改到他自己满意才肯甘休。可是再过一两个月后，他又在把已发表的经过多次删改的文章在涂改了。”

全国解放后，罗尔纲同志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使他的研究工作百尺竿头。他曾多次在文章中说到他过去只知使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不足之处。

我以为，如果把考据工作看成史学研究的全部，是不对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考据工作确是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史料的辨伪，史料、史迹的鉴定，依据已有的史料判明事实的真相，都需要考据。乾嘉学派的考据工作只限于古文献中的文字的校订和诠释，而我们的历史考据则着眼于事实的真相。马克思主义对考据工作的指导作用在于分别轻重，使考据工作不致漫无边际地进行，为考据而考据，甚至钻入牛角尖。至于在弄清楚一件件事实真相以后，把许多事实联系起来，阐明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那就不是只靠考据所能做到的了。但一切论断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的任意的猜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所要遵守的原则。

正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包括乾嘉学派在内的前人的有益的考据方法，也重视他们的考据成就，而且自己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必要的考据工作。我们并不建立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考据方法，但应该最无偏见地运用一切使我们能辨伪存真的方法。

罗尔纲同志 50 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太平天国的研究，他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可以说属于考据工作。他也在这些考证工作的基础上作了许多进一步的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我读过罗尔纲同志在 1982 年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作者在书的前言中说，他在 1931 年已在当时所能得到的《李秀成传》的本子上作注，到 1951 年出版了一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7 年又加以增订。1958 年他决定不再印这本书而要另作新



注,新注虽在 1964 年完成,但他又用 15 年的时间“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所以他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这样实实在在地下功夫是值得敬佩的。无论如何,他是为后来的学术研究作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

罗尔纲同志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着,他的太平天国全史的著作听说已经完成。我在罗尔纲同志从事学术工作 60 周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些感想,写出来作为对这一位毕生致力于太平天国研究的辛劳的学者的祝贺。

1987 年 6 月

原载 1987 年 7 月《太平天国学刊》第 5 辑(庆祝罗尔纲从事学术活动 60 周年专辑)。



以坚定的立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列宁是富于创造性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理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付诸实践,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与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背叛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后,又为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最初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列宁充满了信心,但他同时也如实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多次说,这“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一般地说,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是一个崭新的事业。如果过去这种和那种剥削制度社会的交替总是经历许多困难和曲折,例如在许多国家中,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复杂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更要艰难得多。特殊地说,由于俄国原来是欧洲的一个落后的国家,所以列宁认为:“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



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①

1920年,在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内战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摆在面前时,列宁说:“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谁害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谁被这些困难吓倒,谁见了这些困难就悲观失望或者张皇失措起来,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韧性,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修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②

1921年初,列宁开始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这年10月里,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些成就,虽然是不大的、局部的成就,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成就。我们就要从这门新‘学科’的预备班毕业了。只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下去,用实际经验来检验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经开始的工作一改再改,不怕纠正我们的错误,仔细领会这些错误的意义,我们就一定会升到更高的班级。我们一定会修完整个‘课程’,尽管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情况使这一课程的学习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困难要多得多。……我们决不气馁,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③

在引用了列宁如上这些话后,这里还要再引用他在1922年说的一段话:“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为了更有力地跃进),不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像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3—294页。

② 同上书,第38卷,第343—344页。

③ 同上书,第42卷,第177页。



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①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像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中，不在困难面前悲观绝望，不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惊慌失措，能够通过实际经验学习，不怕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品质，就是无产阶级坚定立场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一些善良的人的主观愿望。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这种空想成为科学，他们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入手，阐明了消灭阶级剥削的社会必然要代替作为阶级剥削社会的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科学地论证了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具体表现上当然会有极其复杂的现象。像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常常犯错误。”^②但是他们从未预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何时将崩溃。恩格斯在1891年说：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③。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工作是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对现实生活的科学分析推断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指出为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页。

② 同上书，第15卷，第2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6页。



现这种趋势人们所要做的努力。这种趋势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完全实现的。

在列宁的英勇果断的领导下,实现了在一个国家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充分估计到国内外敌人的力量,也充分估计到在开创新的历史事业中所难免的失利和错误。他说:让敌人“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在建设我们苏维埃制度中的失利和错误吧。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我们过去和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失利和错误。在缔造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这种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中,难道能没有失利和错误吗?我们一定要百折不挠地努力纠正这些失利和错误,改变我们对苏维埃原则的实际运用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状况。”^①很明显,没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开辟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

列宁去世已经将近70年。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失利和错误,比列宁所设想的还要多得多。当然不能要求前人事先知道后来发生的具体事情。应该说,正如列宁所预见的,全世界历史上新的事业,决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是不可能没有复杂的变化和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的革命过程中,经历过不止一次的严重挫折和失败。历史证明,它能够从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既有明显的成就,也有许多失误和错误。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抓住这些失误和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像列宁所说的“用数不清的诅咒、谩骂、嘲笑”来攻击我们,寄希望于我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2—173页。



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但是事实上，党在克服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以后，实行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登上了新的台阶，10年来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当然是极为艰难的，需要通过实际经验来反复进行学习。如果沿用上面提到过的列宁在1921年所用的比喻，可以说，我们已经是在“预备班”毕业而进入较高的班级了，但是还有许多新的课程要学习，还要排除许多障碍，克服许多困难，进行许多复杂的斗争。

近期来国际间发生的风波更充分证明，开辟历史新时代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曲折和挫折。对此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张皇失措，悲观绝望；另一种是认真研究这些曲折和挫折的经验，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后一种态度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品质，也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列宁的思想和事业，值得研究的遗产很多。我在这里只引用列宁的上述一些话来作为对这个伟大革命家的纪念。我们应当有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我们还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不管国际国内的敌人如何企图改变我们的航向，我们都能够坚持原则，保持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原载《光明日报》1990年4月30日。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科学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说法：因为有了核武器，有了核战争的可能，而核战争只能两败俱伤，解决不了任何政治问题，所以战争已不再是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手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一条原理已经过时。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家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或者更完整地说，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提出来的原理。列宁充分肯定这个原理，毛泽东同志也认为应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各种战争。如果认为这个原理在当代世界上已经失效，那实际上就是认为战争已不再可能发生了。这难道是事实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 45 年了，的确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是，这 45 年中，世界上没有一天不发生这样那样的战争。任何时候，人们发动战争都要考虑许多条件，有了核武器，人们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一点。但并不因为有了核武器，世界上就不发生战争。战争为什么发生？还是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是政治矛盾最尖锐表现的后果之一。海湾地区当前的危机，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克劳塞维茨的这个原理，仍然是站得住脚的。这个原理本来并不是说，任何政治矛盾延长下去一定要发生战争，那样认为是很



荒谬的。但只要发生战争,战争就一定是政治的继续。将来世界上可能会有一天,人们不再使用战争这个手段,战争会真正被消灭。那时候,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仍然存在,“政治”不再延长为战争。但是,我们现在离开那样一个时代还远得很。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太平的世界。世界上仍然可以由于政治矛盾的激化而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甚至无法排除在某一时候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们还得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战争。到了人类历史发展到无战争、无武器的时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就将变成纯粹的军事历史科学,但现在还不是。现在的军事科学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科学。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意思。

第二点,若干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军内外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研究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的成立,我相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研究将有长足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和军事科学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军事科学很重视。马克思著作中很多篇章都涉及军事科学,特别是恩格斯写了好多有关军事科学的论文。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理论家。人们不但把毛泽东的军事科学著作当作军事教科书来读,而且当作哲学教科书来读。为什么从他的军事论著中可以学到哲学?其缘故,我想可能是在战争的活动中,最突出地表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相互关系,表现了主观能动性,特别要求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军事理论涉及到军事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也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说明。所以,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包含两个意思:一方面,战争和军事的理论是要根据现代的军事条件、技术条件、武器装备条件、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等各方面的变化而发展的。毛泽



东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也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武器装备、技术条件、经济条件而得到新的发展。因此,我希望各方面的军事理论专家和军事科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来推进军事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军事科学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第三点,军事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领域。但是,军事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它和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各方面都有联系,当然也和自然科学、各种技术科学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专门的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但是也有对军事科学有兴趣的部门和研究人员。我们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研究专业,这些方面的研究和军事科学研究都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军事科学学会和我们社会科学院各个方面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大家一起来合作,来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发展。我就简单讲这么几点意见。

1991年1月13日在中国军事科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贺词。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1991年第22期,5月6日出版。



寄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颁奖大会，并向获奖的同志表示祝贺。通过这次评奖，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正在蓬勃地成长起来。这种情景在我们院是这样，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也是这样。这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对于现在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我们有一个说法，称之为跨世纪的一代人。像我这样生于本世纪第二个10年间的人，虽然也希望能看到下个世纪，但至多只能把头伸到21世纪大门里探望一下。新的21世纪，应该说是属于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担负着21世纪开辟航程的任务。20世纪的结束和21世纪的开始，有不平凡的意义。从国内来说，到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望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在全国各地得到强烈反应，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迅速增长。我们的战略目标完全能够达到。到21世纪开始后，我们将在四倍于1980年时的综合国力，人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要在21世纪的前期展现出它的完整面貌。当然，我们的面前并不是铺满鲜花的路，我们还会遇到风风雨雨，还会有许多困难要克服，还会有许多新问题要解决。新一代人，就是要在20世纪奠定的基础上，继续迎接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战胜新的困难，解决新的问题，夺取更高、更大的成就。从国际



上说,当前的世界局势错综复杂,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局势下,进一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条战线、各方面的努力,其中,社会科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说到社会科学,可能有人会提出社会科学到底有什么用,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为了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的同志说,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对这种说法我有些怀疑。社会科学领域很广泛,有些领域和科学技术有直接联系,但是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社会科学的确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来说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看要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来认识,要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由总结经验而得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举世公认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富有成效的经验。社会科学要深入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历史,联系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不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现在的总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并不是说要否定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作用,而是说一切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要建设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我们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上不去,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上去,即使上去了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各条战线,社会科学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社会科学不大被人重视。这种说法不一定恰当。客观上并不是不需要社会科学,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说需要理论,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许多人也是承认的。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对社会科学不够重视的现象。克服这种不重视的现象,我想重要的不是去宣传社会科学如何重要,而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要做成绩来,做出能受人重视的成绩,显示出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显示出它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中国的发展要求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这就需要许多人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付出辛勤的劳动。社会科学界应当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更好的产品。在社会科学战线上,需要年轻的一代科研人员不断成长起来。我希望年轻的同志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科学知识,吸收人类各方面的科研成果;希望同志们密切地结合实际,用科学态度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切问题;还希望同志们永远不自满,坚持不懈地在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上前进。

1992年9月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
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
学院《院内通讯》1992年第24期,9月30日出
版。



现代汉语词典工作者的任务

今天,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在这里隆重开幕。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为了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在1956年责成语言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两位先生,先后主持这部词典的编写和修改。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多年努力,终于编成问世。从开始编辑到出版,经过了16年。编辑这样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先例,这是创造性的工作。20年来,印数达2000多万册。其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为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所公认,可以说较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取得成功,成为国内外同类词书中比较杰出的一部,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运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而编写出来的。当它问世之后,又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这部词典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代汉语词汇的收集整理工作,词典的编纂工作,当然并不因出版一部比较成功的词典而结束。这样的工作永远也不会结束,因为语言的各方面,主要是在语汇方面,是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的。如果说语法相对稳定,较为凝固不变,那么词汇就是不断发生变化并发展的。

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内容极为丰富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语言中,首先明显地反映到词汇上。许多新的词语适应需要而产生,许多旧有词语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

《人民日报》最近有人提到“查词典的困惑”,说是有些新词汇查不到。如:“市场经济”、“关贸总协定”、“集团公司”、“信用卡”,等等。有些旧词义有歧义,如“当铺”一词,一般词典都解释为“旧社会专门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贷的店铺”。出现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奇怪的。因此可见,语言工作者整理现代汉语的词汇,编纂词典方面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一劳永逸。固然词典不能老出新的版本,但是为了出新的词典,词典工作者恐怕每月每天都有工作要做。他们必须经常进行工作,负起应尽的任务。这些任务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是,从社会中的语言事实出发,使符合于新的需要的词汇取得确定的形式,具有确定的含义,同时也按照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对词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必要的指导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并不是一切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词语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些只是一时被应用,并不能长期存在,有些会在和同样含义的词语的竞争中被淘汰。词语的兴起和死亡,竞争和淘汰,都是在实际生活中自发地进行的。所谓词语的规范化,一般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见得受科学研究的支配。但是我想,语言工作者如果掌握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善于观察语言实践的发展趋势,就能够用适当的方式,来保护那些应该存在的词语,促进一些不适合需要的词语的死亡和淘汰。那么,什么是适当的方式呢?当然词典的编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但词典已经是词语发展



变化的成果的记录。我认为,语言工作者在现代汉语方面应该经常地研究语言的实践,并且通过舆论给词汇的发展变化以一定的导向。这样做的目的是更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外来语的引用问题。汉语自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外来语以丰富自己,现代汉语中引用外来语更多。如“逻辑”、“咖啡”、“沙发”、“卡车”、“卡片”等等,已稳稳地成为现代汉语的词汇(这里说的外来语专指音译的而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有些外来语曾一度被使用,但后来被淘汰了。如“司的克”、“淡巴菰”、“德律风”,更不用说“巴力门”、“伯力玺天德”,还有什么“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它们在和同义的词,如“手杖”、“烟草”、“电话”等等的竞争中被淘汰了。根据现代汉语发展的已有的经验,似乎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多的:对一个外来的新事物,先有一个音译的称呼,但在有了适当的意译的词语后,音译词终于被淘汰。当然,这不能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有些新事物一开始就有意译的称呼,有些音译的称呼在现代汉语中站稳了。现在又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即音译排斥意译的情况。

在社会中,“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可以说已成定说,但现在似乎“巴士”、“的士”来势汹汹,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北京还有“面的”的说法,即以所谓“面包车”作为出租汽车。对此,语言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采取什么态度呢?也许应该再看一下,如果“巴士”、“的士”因其简练的优越性而取得胜利,恐怕我们只能承认它们。但是我想,“面的”这样的词恐怕不能予以承认。还有“恤衫”之称也从广东传到了北京,而且还有“T恤”之说。以汉语的规律来说,“T恤”应该是不可取的。还有“卡拉OK”,这个词语虽在部分人士中有异议,但已使用得极为普遍。如果我们承认它,可以收入



词典,如果不赞成,它不会因词典不收而死亡,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取消它。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想出一个代用的词语,加以推广,使之逐渐代替“卡拉OK”。这类事或许是汉语工作者、词典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总之,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不仅在于记录语言的事实,而且应该对推动现代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我们的词典工作是以语言的社会实践为依据,但这工作反过来又要对语言实践起指导作用。由此我想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其他学科,也都存在这样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问题。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社会科学就能实现它自身的价值,就能更好地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现代汉语词典》刊行 20 周年,开个学术讨论会,总结一下它的长处和不足,是十分必要的。我希望通过这个学术研讨会,我们的语言工作者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丰富和规范化而进行工作;也希望这个研讨会会有利于今后《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并编写新的大规模的《现代汉语大词典》。

1993 年 4 月 26 日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中国语文》1993 年第 4 期,7 月 10 日出版。



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祝词

我很高兴来参加吕叔湘先生 90 华诞学术讨论会开幕式。我谨在此向我所尊敬的吕老,对我说来应该是吕老师,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祝贺。

吕老是语言学界的大师,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的学者。他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受到应有的敬仰。吕老为学上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学风,细致的观察力和创造性的才能,不仅在语言学界堪为楷模,而且值得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学科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学习。

我对语言学基本上是外行,虽然对此也有兴趣,有时读一些有关的书,但毕竟所知有限,对吕老在语言学上的成就不敢妄加评论。我只想谈一点,吕老在语言学研究中有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和实际结合,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他非常注意,甚至可以说是随时随地地注意中国语言中的各种具体现象。他在通常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由小见大,由好像很平常的现象中看出重要的问题。他既注意古代汉语,又特别注意现代汉语。他从大量的历代的文献中间,发现语言方面的问题。他又从现在的各种报章杂志,以及口语中间发现问题。我曾经读到吕老文章中有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是在讲到语言学者,特别是在编词典时应注意生活中不断地出现新词、新义的时候讲这段话的。他说,编词典的人往往不注意口语中的新词新义,因为编词典的人是读书人,对书本里的东



西感兴趣,而对生活里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不是从书斋,而是从市场、车间和田野来的词汇不那么敏感,因此就不大理会一般的报纸刊物,更不理睬什么手册、传单、广告等等。吕老的确是按照他所说的那样身体力行的。吕老的著作既有高度的科学性、学术性,但读起来很有生活气息。他还常写普及性的语言学著作,好像说得很浅显,但又非常有深度,也就是所谓深入浅出。这是大学者所不大容易做到的。我希望社会科学的学者们都能这样做。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是吕老 60 年前的学生。1931 年到 1933 年我在苏州中学读书,叔湘先生是我的老师。那时候他才 30 岁,但已经和他的几个同事合编了一部《高中英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教科书当时相当流行。我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部教科书。但我不是吕老的好学生。那时,叔湘先生除了上课以外,还担任我们中学的图书馆馆长。我记得他主持的图书馆很有特点,有一个开架的阅览室,提供许多新书,让学生随意阅览,用意大概是让我们扩大眼界。我的确从那个图书馆得到很多益处。当时我是十几岁的孩子,和一些同学一起,有些幼稚的想法和幻想,叔湘先生知道了,表示同情和理解,并给以教导。这些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吕老在旧中国一直支持以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为目的的革命事业;在新中国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支持近 15 年来进行的改革和开放。吕老以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是偶然的。

我在此敬祝吕叔湘老师健康长寿,并且相信吕老将继续为学术界作出新的贡献。

1993 年 10 月 20 日在“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继承文化传统,反对复古主义

《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已有 40 年。创办《历史研究》的前辈有几位已经过世。《历史研究》本身也成为一段历史。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开始时《历史研究》停刊了。后来据说是毛主席说这个杂志应该再出,所以复刊了。但给“四人帮”手下的人占了几年。可能因为稿源很困难,他们也不大有兴趣办。1975 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我看是个机会,就跟当时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联系文教工作的刘西尧同志商量,是不是能由学部接过来?刘西尧同志同意,所以学部就拿过来了。谁来办呢?黎澍同志慨然表示:“我来办!”他把“四人帮”的人调走,使杂志面目一新。但他接手不久就碰上“反击右倾翻案风”,黎澍和其他参加编辑的同志在这期间吃了一些苦头。黎澍同志已经过世。他当时敢于顶风头办《历史研究》,精神是极可钦佩的。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篇最近读到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历史学界也有关系,是 1994 年第 6 期《哲学研究》发表的《国粹·复古·文化》,作者署名“罗卜”,是社科院哲学所的同志。我是从《新华文摘》第 8 期中才看到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讲了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它针对现在流行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区别的一种说法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认为,西方文化是“主客



二分”，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西方由于主客二分，所以科技发展，但又因此造成现代的文化危机。而中国讲天人合一，十分和谐美妙，虽然造成科技落后的缺点，但可以弥补现代西方文化之不足，西方的文化危机要靠东方的“天人合一”来拯救。罗卜的文章认为，所谓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中国文化是“主客混沌”或“天人合一”的说法是一种任意的虚构。他的论证不见得周密完全，但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他认为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屏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他的话可能有过分之处、不妥之处，但总的论点我赞成。我以为这是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今天都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前，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的确很重要。罗卜同志的文章说，以往曾有过打着“马列”旗号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对民族精神文化造成难以平复的创伤。我以为，应当以仔细的分析和鉴别来代替全盘否定，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民族进步的方向继承和发扬以往的传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在明显是精华与明显是糟粕（这些都只是极少数）的两端之间，有以不同程度掺杂着精华与糟粕的大量的事物。用现代人的眼光，科学地进行分析、鉴别、采择、消化……是我们的任务。全盘否定和囫圇吞枣，都为我们所不取。

一方面，我们今天要向世界开放，充分地大胆地吸取西方有用



的东西,但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不能忘记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另一方面,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很好地利用文化传统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开拓中国新文化;但决不能把腐朽的东西当作神奇,决不要把糟粕当作应当继承发扬的国粹,以为凭藉这些东西就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前途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世界文化的前途问题。

罗卜同志的文章有一个副标题,叫《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来势多大,我不敢说,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是要通过历史传统来发扬爱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我们决不能搞复古主义。

1994年10月22日在《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4年第14期。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华文史资料文库》问世了，这是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一项盛举。

当我们热烈庆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时，不能不想起文史资料事业的倡导者周恩来同志。1959年4月29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同志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殷切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得到了委员们的热烈响应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30多年来，不但全国政协，而且地方各级政协都坚持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编辑工作，至今累计发表的总数共达10亿字之多。从这10亿字的资料中取精集萃而编成的这一套《文库》，应该说是由于36年前周恩来同志的倡议而得到的丰硕果实。

在这部内容丰富的《文库》中展现的历史，起于1898年戊戌变法，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深重苦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是中国人民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1949年的彻底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然而是我们应该回顾，而且值得我



们回顾的。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昨天的中国演变发展而来的。相对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是昨天。不知道昨天的历史,今天的许多事情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不明白昨天的中国,就不知道人民共和国是怎样来的。今日中国的面貌,有许多是要联系中国昨天那种状况才能得到解释。当前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坚持斗争的精神,是前一时代的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的命运而进行的奋斗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建设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有许多是和前一时代的遗留物有关的。从昨天的历史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到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史事极为繁复,其中许多是能够引起我们兴趣、需要我们了解的。这部《文库》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学、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诸方面。当然远不是应有尽有,但确是包罗很广。有些方面的重要历史资料,如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资料,这部文库中涉及不多,读者可以求助于其他有关的资料书。这部《文库》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文献作了重要的补充,提供了一大批极为难得的材料。文章的作者多半是各个重要史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有些作者是在史事中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如关于解放战争的文章大多为国民党将领所撰写。他们从战争的对方转变立场到人民方面来,回顾他们所亲历的战役,以特殊的视角提供了别人无法提供的资料。《文库》中的文章的很多撰稿人已经逝去,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留下的资料使我们倍感珍贵。



史学研究必须以全面的、可靠的材料为依据。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是透过纷繁的历史事实,认清足以表明历史发展本质的现象,探寻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通过对以往历史的科学认识更好地认清当前的现实,以至在一定程度上预知将来。我相信,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学者和一切有兴趣于近代历史研究的人,一切要求联系历史而更好地了解现实的人,都会重视这一部《文库》。

这部《文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旧中国的这段历史,既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遭遇的无穷苦难和中国人民受到的重重压迫,又使我们看到任何苦难不能阻止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任何压迫不能使中国人民停止为求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段历史中的人物既有一时窃据国家统治地位的专制贪婪、腐败无能而终被扫到历史垃圾堆里的军阀官僚,已为人民所唾弃;又有众多的为拯救国家危亡,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舍身取义、自我牺牲的革命烈士和在恶劣的环境下致力于提高民族文化、振兴民族经济的仁人志士,他们的一切成就正在当前现实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所以这些都能在广大人民中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剂。我相信,《文库》的出版和其中许多内容的传播不但有助于提高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代代相传,有助于加强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并不因这部《文库》的出版而中止,还应当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年代已成为又一段时期的历史。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创业,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业绩,经历的曲折,尝到的甘苦,也应文史资料的形式记录下来。因此,我以为这部《文库》的出版,既是过



去 30 年文史资料工作成果的检阅，又是今后文史资料工作的新起点。

1995 年 4 月

原载《人民日报》1995 年 11 月 11 日。



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问题

我很高兴能来参加苏南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次讨论会是专为讨论苏南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经验而举办的。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太仓市委共同组成课题组,对苏南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专题调查。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这个招标课题已经完成,《苏南精神文明建设模式》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表明江苏省的同志们、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对中央发出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是积极响应的,是从实际出发积极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的。我相信,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将提出许多好的见解和意见,这次会议将能起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作用。我在这里就对苏南经验的初步认识谈几点看法。

一、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非常明确的。但为什么“一手硬,一手软”,也就是放松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容易出现;为什么有人认为在物质文明比较迅速地发展的情况下,精神文明就似乎难免滑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确实很迫切,很艰巨。经济搞不上去,什么事情都不好办。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本身是一个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方针。就是要以这个中心来带动其他各方面,以其他各方面来保证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针,在此前提下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承认,在实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过去并没有这种经验,因此需要创造新的经验,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新的探索。

在不少国家的现代史上,曾经有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换取工业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物质利益的畸形地、片面地发展的情形,那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引为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常常有些思想家欣赏和赞美据说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存在过的所谓淳朴的古风,那实际上是指生活资料极其匮乏和贫穷的情况下的风气,这种风气即使可以说是好的,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苏南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苏南经验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就是协调发展。十几年来,苏南经济发展很快,所属各县市都进入了全国百强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苏南不但人心未散,风气未败,而且高扬了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形成了比较公正、比较和谐的社会风气。其根本经验是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发展观。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从当前看,重点应该放在道德建设上。现在大家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



济,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市场经济也需要有道德基础。绝不是要搞市场经济,人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赚钱发财,党员就可以不讲党性,公民也无需讲道德、义务和责任。如果那样,是搞不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些年,大家都很关注党风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秩序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强调道德自律,要讲信誉、讲公德、讲自我约束、讲社会规范。离开了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其他方面的工作恐怕很难取得持久的、稳固的效果。

这些年,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文化建设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是最为欠缺的是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道德约束松弛,道德标准混乱,道德滑坡严重的一些现象使人们担心。在道德建设这个重要问题上,苏南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当然,不是说苏南已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完整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而是说苏南在抓道德建设方面比较自觉,比较主动,采取了许多生动活泼的、行之有效的形式。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三、精神文明研究,要注重总结经验,注重典型调研

一般地说,精神文明建设比物质文明建设还要复杂,它涉及人们思想深处的问题、观念形态的问题。由于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精神文明是完全新的事情,所以必须注意研究实际经验,并且注意各个地区由于各种客观、主观条件的差异而可能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同模式。虽然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原则,但具体形式可能各式各样、异彩纷呈。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要关注其普遍本质,更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体察社情民情,研究那些各具特色的实践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太仓市委联合课题组深入苏南地区,特别是太仓市的企业和农村,总结其经验,做比较深入细致的典型调研,这种研究方法,



看来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参与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省社会科学院、中共苏州市委、中共太仓市委和苏南各市县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预祝这次讨论会圆满成功!谢谢。

1996年6月7日在江苏省太仓市举行的“苏南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6月17日摘要发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全书 第三卷/胡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

ISBN 7-01-002529-0

I. 胡…

Ⅱ. 胡…

Ⅲ. 胡绳-文集

IV. C52

胡 绳 全 书

HU SHENG QUAN SHU

第 三 卷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6.25

字数:600 千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2529-0/K · 546 定价(上下):46.00 元